林彪浮沉录

[荷]雅普·冯·吉内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Jaap van Ginneken

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PIAO

Penguin Books Ltd. 1976

根据美国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封面设计：二 瓜

林彪浮沉录

〔荷〕雅普·冯·吉内肯 著

曾胡 张宁 廖康 项龙 译　　张宁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25　字数：201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196—X/K·33　定价：3.10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这是一部外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政治人物断代传记，记述林彪自 *1959* 年出任国防部长至 *1971* 年九·一三事件机毁身亡这一浮沉过程。书中除了有大量关于林彪政治生涯及其反党集团内幕的材料外，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重大事件及外交活动也有一定披露。作者不仅广泛参阅我国及世界上有关报道，而且援引当时流传海外以及台湾情报机构掌握的一些材料。

作者雅普·冯·吉内肯，系荷兰学者。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问题。他多次访问过中国、越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本书有如实记述，也有作者的独立见解。

当然，限于作者的立场，书中不少观点、用语是我们不能赞同接受的。并且，“文革”时期历史情况非常复杂，本书又撰成较早，作者掌握的材料也不尽翔实准确。但本书对有关人员了解林彪其人及有关历史，了解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颇具参考价值。

1988 年 10 月

目　录

第　一　章

危机：1971年9月

一、宣传工具的混乱状态

1971年9月11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危机到了极为紧要的关头，这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天。从外表看，毫无紧张的迹象。在首都的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擎着彩色纸花的学生正在排练人民共和国国庆22周年的游行队列活动。两个半星期以后就是国庆节了。来来往往的卡车载着年轻人从各个地区往这里集中。按军队编制的学生队伍更增加了节日气氛。大喇叭里播放着军乐和组织游行队列彩排的指令。

夜幕降临时，广场才安静下来。广场的一侧是人民大会堂，所有大型而重要的政治集会都在那里举行。突然，从各个方向驶向人大会堂的黑色高级轿车打破了这里的沉静。一位碰巧过路的外国人估计这些轿车约有50辆。要是欢迎几名来访的贵宾，不会有这么多汽车，但要是召集一次党的领导层的紧急会议，开来这么多汽车倒也差不多。在北京的某处，一个日本代表团正在徒劳地等候：他们本来是要在那一天会见周恩来总理的，但周总理却在最后一刻撤消了这次会见，把它推迟到了一个多星期以后。这一推迟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但眼下党的最高领导层所担心的是军队的指挥中心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会使用武力。

周恩来已经觉察到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迹象，而且无疑他将把这些迹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次夜间会议上予以披

露，毛泽东也出席了。他突然从上海返回是引人注目的，但与此同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更加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既定的接班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林彪的缺席，是最引人注目的。

在前几个月中，自文革开始时便潜伏着的许多矛盾突然变得极为突出了。在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和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领导层发生了分裂。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充分支持周恩来的观点，而林彪则对目前采取的路线疑虑重重。在国内事务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新闻界使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倘若仔细读报刊，显然会发现一场宣传战也在进行着。5月份，《红旗》杂志打破了在封面上只登毛泽东肖像的习惯作法；第5期，第7、8期合刊和第9期的封面上来了一个大花样，刊出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而第6期的内容则完全是与1966年5月7日的一封信有关的文章，这封信把林彪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亲林彪的新闻界现在反复宣称，只有林彪才能保证和捍卫文化革命的过激成果。在北京，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才了解去年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哪些分歧。甚至连一些中央委员都不知道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更别说中低层干部了。冲突尚未公开显露出来，这对林彪及其支持者是有利的。

原定于7月1日党的50周年纪念日出版的毛泽东摄影画册的命运，是新闻界动向的一个突出的、也许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出版的日期一再推迟，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此时此刻出版这部画册是否合适有怀疑，对这部画册给予林彪的突出地位是否合适也有怀疑。然而，某个认为时间浪费已过多的人突然做出了决定。在人大会堂参加夜间会议的人拿起9

月12日的《人民日报》时，一定是非常惊讶地看到报上关于出版这部画册的报道。这篇报道还写道：

> 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那些在人大会堂读这张报的人一定格外感到吃惊：即使在一年前，这些赞扬林彪的话似乎也是很夸张的，而现在他们肯定要对他做出大不相同的结论了。

推测与结论

那么，在人大会堂开会的人对林彪的行动感到不安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是对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就军事政变这一题目所发表的那次引起争议的讲话感到不安。林说政变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宣传工具，即报纸、广播和出版物，这些都与意识形态工作有关，搞颠覆活动，为了在人民的意识中制造混乱，需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另一个是控制武装力量的军事工作。

越是把这些看法与目前的局势联系在一起，这种担忧似乎就越有道理。

1966年毛泽东已经指出，林彪的讲话太教条，它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政治见解的深刻分歧会升级为武力冲突。

倘若林彪当时在涉及别人时持有这种看法，那么，现在涉及周恩来，他难道不会持同样看法吗？倘若林彪和他的部队在文革中认为宣传攻势和他们的军事控制的扩张是正确的，说这是为了防止“保守”的地方指挥官夺权，那么，在眼下的局面中，他们难道不会采用同样的战术吗？

有迹象表明，林彪集团正在忙于控制上面提到的作为政变先决条件的两个领域。他的支持者所控制的宣传媒介显然在动员舆论；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的新的集团及其“文化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开始制造怀疑。

来自军事情报部门（这个部门现在由公安部控制，不再由国防部领导了）的报告加深了人们对林彪的怀疑。军队中的许多政治活动团体开始显得更象突击队了，它们从一度是“极左”的红卫兵组织的积极分子中大批招募年轻干部。现在，它们正在搞特殊的军事训练，也搞意识形态建设。

也许其他的情报来源表明，林彪试图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派别。据报道，他和他最亲密的支持者曾在8月底和9月初进行过紧张的磋商，看看如何扭转事情的发展进程。

显而易见，这些报告并没有提出“阴谋”的确凿证据，是把怀疑当成了确切的事实。

谋杀毛泽东的企图

这一情报也许是来自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特别安全部门的首脑汪东兴，他对毛泽东的人身安全负有直接责任。这个部门与军队的其他部门和任何政治实体都没有关系。在主席旅行时（通常是保密的），或在上海和北京有重重保卫

的寓所中居住时，这个部门拥有保护主席的全部权力。

来自汪东兴的情报与导致主席返回北京的背景有关，这一情报本身就足以使所有目前在首都的党的领导人赶来参加这次紧急会议了。有关这些事情的消息零零星星地传到了外界，而且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在9月8日和10日之间，毛泽东曾遭到一系列未遂的袭击。几星期后，香港的《明报》报道，几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对毛泽东在上海的住所进行过一次袭击。主席逃脱了，没有受伤，但他的几名贴身警卫却遇难或受伤。然而，这一说法也许是根据一些受到曲解的不完整的传闻。

很久以后，有些传闻认为毛泽东并非一路平安地回到北京的，其中有毛泽东乘的火车曾遭到空袭的说法。据后来参与其事的人说，那架飞机的飞行与福建省发出的一次假警报恰好一致，因此，这件事应当怪台湾政权。另一些报道则声称，曾派过飞机去南京北面轰炸火车，但负责行动的军官临机犹豫，通过他的妻子向当局报告了这次行动。另据说，毛泽东到达首都后，一个自称是信使的人来到了主席的住所，坚持要把一封急信亲自递交主席；但是,此人在被捕后供认，他企图谋害主席。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中央指挥的军队内有一个牵涉面很大的阴谋计划，如牵涉空军和控制着铁路的后勤部门。此外，协调甚佳的计划和准确地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都说明在最高层里有同谋者。

眼下，谁是毛泽东失踪的受益者？不论怎样说，最可能的答案是林彪。林彪将会成为党的主席和全部武装力量的司令；此外，宣布紧急状态，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对手消灭。即使林彪集团没有卷入这些谋杀活动，这个阴谋显然对他也是有利的。无论如何，林彪及其团伙亲自卷入这一阴谋的可能

性甚大，不容忽视。

林彪在哪里？

正当参加会议的那些人按着上述的线索进行推测时，林彪的女儿林豆豆（生于1941年，是林彪第一个妻子所生，据说她父亲有嚼炸豆子的习惯，故名）送来了一个奇怪的情报，她告诉周恩来,她的父母正在准备做一次夜间飞行，而党的领导对此一无所知。周恩来给林彪在北戴河的乡间住所打了个电话，这个住所在离北京几百公里外的海边上。他和林彪的妻子叶群通了话，她告诉他，林彪听音乐会去了，除此之外她不了解林的行踪。这次通话后，她立即设法让林彪离开了那个音乐会。不久，一列车队驶向了机场方向。据说，一名对执行命令犹豫不决的司机被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枪毙，并从飞驶的汽车里被推了出来。在飞机场，起初，一切交通根据党的领导的命令均被禁止，只有周恩来、林彪和另一名领导三人共同准许才能破例飞行。然而，林彪设法唬住了指挥塔，说这个命令一定是被误解了，只要有一位领导的签字就可以了。立刻，一架飞机便做好了准备，并加了油。但是，正当飞机向跑道滑去时，警报响了——也许是因为发现了林彪那个受了重伤的司机。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飞机升空了。某些报道说：这架飞机（英制三叉戟飞机，原先是民用，现已拨归林彪专用）曾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着陆过，林立果是那里的副司令。不过，其他的报道则声称，那架飞机起飞不久便在中国领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无所适从的九周

中央委员会的行动

中央委员会现在已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可以采取行动了。在北戴河发生那些事以后，事件的某些情报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林彪的喷气机起飞后不久，一架载着三名阴谋参加者的直升飞机也起飞了。据报道，飞行员拒绝执行命令，被击毙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反正这架飞机又被迫着陆。两名阴谋家据说自杀了，尽管还有一人活着，但飞机上极其重要的文件未来得及销毁。在随后的逮捕与审讯中，阴谋的其他部分被揭露。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被拘捕，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他的副手吴法宪和李作鹏——他们分掌空军和海军。9月11日后，他们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也被逮捕了。

在随后的几天中，二十几名高级军官在试图逃往香港时被逮捕，而最后一批人在另一次试图出逃时也被逮捕了。所发现的重要证据当然是令人焦灼不安的，但最后的分析表明，要想说清阴谋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是不可能的。现在还会出什么事？

林彪到底在哪里?

9月13日凌晨，党的领导与两三名最高级的军官一起审度了目前的局势。谁都不知道林彪去哪儿了。可能性有几种，但这些可能性都意味着严重的危险。第一个可能性是最有可能的：林彪飞到了另一个党政机关都对他友好的省份，在那里，他可能准备宣布脱离中央或准备打内战。第二个可能性是，他试图离开这个国家。倘若这样，最明显的路线便是经蒙古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这意味着在大规模入侵、颠覆迫在眉睫的时刻，全部中国的国家机密将一下子落在敌人的手里。根据这一思路，还有一个可能性：林彪的飞机已被蒙古或苏联的防空火器击落。这样一次事件将被苏方视为挑衅，成为实行期待已久的"内电战"的借口。最后一个可能性是，林彪的飞机已坠毁，尽管眼下不需要马上考虑这一可能(除非中国的战斗机驾驶员声称他们击落了林彪的飞机)。已发布的大量政令表明，领导层认为局势已构成了紧急状态。虽然在北京除了一个很小的圈子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香港的外国观察家、台北或东京也一无所知，然而，在随后的几周中，北京出现了非常局势，已经是明显的了。

局外人看到的迹象

首先，出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军事调动。几乎所有中央军事指挥官都似乎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有几天，中国完全

禁止民用和军用的航行；根据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约翰·麦凯恩的说法，至少过了整整五个星期才恢复正常航行。在日本，一位政府发言人宣称，根据截获的无线电信号清楚地表明，所有的部队都取消了休假，这项命令立即生效；所有的军事人员都被召回了他们的单位，“因为出现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必须防止混乱发生。”

随后，在中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出现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动向。原定于9月11日与周恩来会谈的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仅提前两小时得到通知，会谈推迟五天。北京打给一个驻外使馆的外交电报被截获，在这封电报中提到，与尼克松进行公开对话在国内引起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原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罗马尼亚高级军事代表团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他们的旅行，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

最后，采取了许多有趣的政治措施。据报道，林彪负责起草的或与他的地位有关的许多重要政治文件将接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这些文件包括某些九大的报告，许多与九届二中全会有关的文件，如起草一部新宪法的计划及其他林彪的文章。然而最重要的措施是，定于10月1日举行的群众游行的准备活动于9月20日取消。

尤其是最后一项决定，引起国内外所有观察家的注意，使他们对紫禁城和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产生了兴趣。官方对这项决定的解释是，要使庆祝活动搞得更简朴。人们对此几乎无话可说，因为7月1日庆祝建党50周年的活动就搞得极为克制。《时代》周刊的理查德·哈里斯说得简明扼要：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台上真正必不可少的只有两个人，即毛泽东和林彪；倘若两人中有一人不露面，那么就说明不是毛泽东去世，就是林彪被清洗了。

10月1日的庆祝活动

9月就要结束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尽管党的领导人一年一度与成千上万激动的人群的会面被取消，人们还是庆祝了人民共和国22周年的纪念日。中心广场的游行不搞了，但庆祝活动却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展开。文化宣传队在公园里组织了几百台演出：演奏音乐，表演体育，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团体表演了民族舞。虽然全体政治局委员没有一起出现在紫禁城的城门上，但分别举行了五个招待会，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在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9月30日晚，在人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外交招待会，招待外国的700多名代表。主人有两位：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部长陈毅两个月后便去世了）和王新亭——他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副手，黄和另外三位副手很可能已被逮捕。其他的主人均是副手：董必武（共和国副主席）、李先念（政府副总理）和阿沛·阿旺晋美（人大副委员长）。最高层的领导没有出席。

同一天，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举行了另一个招待会，招待“各国马列主义兄弟党和组织的同志，以及外国友人”。这个招待会的主人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一位最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政治局的第五位成员康生，过去他总是出席这类招待会的；他大概病了。然而，年轻的理论家姚文元却出席了招待会，现在，他似乎正在向更有权力的位置上升。出席的还有许多中央委员。

第二天，借着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特

别安排的一次乘船旅行之机，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集会。许多人惊讶地看到，周恩来亲自出面当主人，陪同出席的有副总理李先念、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为这一天庆祝活动所拍摄的宣传影片给了这次招待会以头等地位。在这次招待会上，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显得轻松，富于魅力，兴致勃勃，可以看见他和客人们开玩笑。

在晚上的另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再次露面，这次招待会是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举办的。700余位外国客人的主人是王国权和吴德，他们代表这两个组织。其他的出席者有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文革小组中来自上海的成员张春桥。最后，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另一次招待会招待了港澳同胞的代表。

总而言之，国庆节时还是举行了许多活动。但政治局本身尚未公开露面，大部分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就看不到。首先，几乎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强有力的军事领导人缺席。几乎所有主要省军区的司令都没有露面，特别是华东和战略边境地区的司令员。但是，人们心头都压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在9月30日的重要招待会上露面，而仅在第二天较次要的招待会上露面？为什么毛泽东和林彪根本未露面？现在不如前几年那样经常提到他们了。一些观察家指出，这个城市中的毛泽东肖像变少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没有在头版刊登毛泽东（或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尽管在里页刊登了毛泽东的一首诗；这一点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按照传统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指导性文章没有出现。难道头版内容在最后一刻被改变了？提到林彪的次数显著减少。在首都，由中央制作的标语牌上几乎没怎么提到他，而由地方党委制作的标语上提到他的次数

要多些。在各省，提到林彪姓名的频率各不相同。在中部省份，几乎没有提到林彪的名字，但在边远的相对偏僻地区，显然对目前的事态知之不详。内蒙、宁夏、青海和云南的电台广播甚至没提到在北京举行的广泛庆祝活动——显然，这些省份认为所有的庆祝活动都停止了。西北边远的甘肃和青海的电台广播呼吁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东南江西省的电台在9月30日时使用了同样的公式，但第二天就变了，呼吁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周围"。显然，所发生的事情正在传遍这个国家的所有地区。

三、飞机事件

林彪的飞机似乎已坠毁

9月30日和10月1日之间发生了什么足以改变局势的事情（尽管它并不起眼，但后来却变得非同寻常）？重要的是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小事，比如，周恩来没有参加在传统上是最重要的9月30日的招待会，但却出席了翌日举行的较次要的招待会。不仅周恩来出现了反常的举指，其他重要人物如江青、叶剑英亦复如是。事隔一天，局势确实发生了变化：9月3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它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却强烈地亲莫斯科）首都乌兰巴托的官方日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报道。它简要地记录了一项政府公告，大意是：17天以前，一架英制的中国喷气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地点为东经111°15′，北纬47°42′，该机是在凌晨1点55分进入蒙古领空的，飞行了几百英里后坠毁。

同日，莫斯科的塔斯社播发了类似的报道，党的报纸《真理报》和政府的报纸《消息报》在里页不引人注目地也刊登了这条消息：

此次空难的原因尚不清。现场发现了九具烧焦的尸

体、武器、文件和装备，它们表明这架飞机是属于中国空军的。

进一步的细节没有披露。乌兰巴托以愤慨的语气要求北京做出解释。这次事件发生时，两国关系刚刚趋于正常化，新的中国大使许文益到达蒙古才两个星期。

外交事件

消息终于在9月30日与10月1日相交的那个夜晚传到北京，它使人一方面喜，一方面惧。倘若报道是真的，来自林彪的危险便不存在了，这令人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仍然有谨慎从事的理由：蒙古和苏联会不会把这次事件视为军事挑衅，并考虑报复，尚没有保证。在飞机上发现的文件也令人心焦如焚。北京做出了决定，暂不做任何评论。10月3日，做出了官方答复：该机是民用飞机，并非军用飞机，因迷航才进入蒙古的。莫斯科也发表了类似的解释，消息终于传到了西方。但蒙古当局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他们指出，该机坠毁的地点离中国最近的民用机场太远，因此，迷航的解释是狡辩。另一方面，事件发生的地点离一个非常重要的火箭基地太近了。蒙古方面要求中国做出更全面的解释，并暂不接受新任驻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的国书。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两国的外交关系将全面破裂。蒙古人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中国大使与蒙古外交部长进行了接触，试图发现他了解多少情况或有什么怀疑。由于双方互不信任，谈话进行得极为不快：北京不知道林彪是否和莫斯科、

和乌兰巴托有过接触；乌兰巴托则不知道这架飞机是否执行一项秘密的军事使命，北京是否想借此教训他们一下。11月、12月、1月和2月，连续进行了会面，但大使的国书仍未被接受。

与此同时，由来已久的宣传战又开始了：攻击中国人的反苏主义、“反动的毛主义”和“毛泽东民族主义的超级大国意识形态”。另一方也同样，只是换了名称，指责蒙古和苏联的“阴谋”。直到1972年春，一项解决方案才似乎在望了：许文益被允许去察看飞机的残骸；此时，乌兰巴托也从其他消息来源（如窃取中共的文件）搞清了北京对这一事件的真意。这就意味着，这一事件可能会被封闭起来。

不管后果如何，这件事发展成了一次真正的外交事件，现在，它已经不容忽视了。中国政策研究者或苏联政策研究者，报纸或新闻机构，无不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由于北京一言不发，只是在7月底对此事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遂给各种各样的推测创造了条件。关于飞机坠毁的直接或间接报道皆非来自中国，致使疑云大起，引起了外国观察家们的兴趣。然而，若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本书对这事件进行的描述大体无误，要做出其他解释是不可能的。

苏联与这一事件

还有一个事实应加以考虑：北京政府的三个主要敌人大体赞同这一事件的流行看法。首先，台湾政权的情报部门声称，在1971年底和1972年初在大陆得到了几份中共中央的文件，基本证实了上述的看法，甚至在这些文件正式发表

后，他们对此事的基本情况也没有提出争议。其次，日本的情报机关，以及美国、英国在东京和香港的情报机关，亦承认中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解释中的差异可忽略不计。最后一点（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莫斯科比任何人都可能掌握有关证据，证明北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他们并没有反驳中国人，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许多苏联刊物总是试图从这一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倘若俄国人发现的东西真的与中国人的说法相矛盾，就不难提出明确的证据。

让我们回到 9 月 13 日的那一时刻吧。飞机在凌晨坠毁。由于中苏边境地区局势很紧张，一架飞机的存在长时间被蒙古的成千上万苏联军事顾问所忽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事情发生的当天，一个特别调查组就赶到失事现场了。后来宣称发现了一些文件，毋庸置疑，这些文件中有关于乘客身份和他们飞行理由的重要线索。鉴定那些最重要的人物的身份大概并非难事：林彪在二次大战初期曾在苏联生活过若干年，接受特殊的治疗。虽然尸体被烧焦（这说明飞机残骸曾起火），但要想认出哪具尸体是林彪的，肯定有足够的痕迹可供查寻。譬如，在某个牙医那里存有他牙齿的医学资料。总之，专家们用不了几天便可做出各种推测。此外，苏联的情报部门显然也对过去几年中国领导层中所发生的严重冲突了如指掌。因此，对这次事件的实质做出结论殆非难事。但莫斯科和乌兰巴托都保持着沉默。并没有随之而来的外交冲突和宣传攻势，在随后的几周中，什么事也没发生。这种沉默是何道理，令中国问题观察家颇感疑惑，新闻记者颇感兴趣。某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事实与事后的说法有出入。然而，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另

外一些观察家则认为，这说明双方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上都有几分吃不准。这一看法似乎有道理，但并不能向我们提供一种解释。

法国人吉勒斯·马蒂内特和扬·戈维洛在《新观察家》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种最为似是而非的说法。作者谈到了事件发生后双方唇枪舌剑的交锋。9月22日，北京向外界宣布，10月1日的游行取消了。尽管暗示了苏联发动战争的威胁，但没有公布取消游行的理由。随后，莫斯科决定反驳任何有关发动战争的设想。9月24日，对西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上的推测以及中国人认为受到了战争威胁的暗示，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进行了冷嘲热讽的评论。法国人的那篇文章继续写道："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若干重要的外交事件正在强烈地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局势。"该文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中国人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旨在尽可能使发生的事情保持秘密状态。"该文接着写道：

> 紧张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果俄国人得到了活的林彪，他们肯定会感到自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然而，他们只得到了一具尸体。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政治局的其他成员现在进入了棋局。但事情还没有简单到只需向前挪动卒子；对手的反应还是要考虑的。要是苏联当局宣布，林彪就在那架于9月13日坠毁的飞机中，那他们肯定会在宣传中获得成功。但这会造成什么结果？中国人随后便会宣称，林彪的飞机是被苏联战斗机击落的，苏联正在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这将自动地使中国共产党恢复团结。反正林彪不会起死回生，谁都没法把他说成是苏联的朋友。因此，宣布林彪就在9月13日

失事的飞机中，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

苏联人后来决定在恰当的时刻发表一些含含糊糊的报道，并且在中国人做出最终的反应后又做了进一步的报道，其理由盖在于此。这一时刻选定在9月30日，尽管中国已取消了大部分国庆庆祝活动，苏联的报道还是可能产生可观的冲击力。事实上，其影响与预料大相径庭。由于提到了“烧焦的尸体”和“文件”（根据暗示，它们并未烧毁），这种含糊其辞反倒使中国人反应谨慎了；实际上，北京的政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这篇报道对其内部关系几乎没发生什么影响。这一切使后来者对围绕着这次飞机坠毁事件所发生的一切及其环境（现在人们对本文所叙述的标准看法已经接受）进行了种种推测，这种推测成了一种折磨人的游戏。

但是，即使人们承认林彪就在那架失事的飞机中，也仍然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林彪试图飞往苏联？他真的有反毛阴谋，还是别人企图利用他？为什么意见分歧会导致1971年国内外政策如此急剧转变？这些分歧的根源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终于爬到第二号位置的过程。

第二章

根　源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所以值得我们注意……

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一次讲话

四、林彪和陈伯达的崛起；军队革命化

毛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日益加深的对抗

1958 年到 1959 年所发生的事，集中在几次政治会议上。

1958 年 5 月 23 日：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大跃进的计划已决定；农村将根据人民公社的原则组织起来；决定搞一个农业 12 年计划（这个计划证明过于雄心勃勃，被修改了两次）。制定规划的关键人物之一是陈伯达，他是毛泽东的前秘书之一。在意识形态上他似乎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模式办事，因此，作为农业政策方面的极端思想的主要代言人，他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955 年，他成为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1956 年，他与林彪一起被选人政治局。

1958 年 5 月 25 日：八届五中全会。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又被任命为党的新理论喉舌《红旗》杂志的主编。林彪成了副主席和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之一。从 30 年代初开始，林彪就是共产党内的搞游击战和正规战的人物之一。1938 年到 1942 年，他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治疗和军事教育。解放后，由于健康不佳，他一直默默无闻。从 1954 年起，他就是中苏友协的会长，而陈伯达则在这个协会中起过重要

的作用。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毛主义者著称的林彪元帅是军队领导的“修正主义”政策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在陈伯达的《红旗》中，修正主义也受到了批判，首先批判了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来的困境构成了主要的问题。毛泽东宣布，“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理论工作”，他将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尽管保留了党的主席）。此后不久，刘少奇就接替了他的主席位置。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七中全会，接着举行了第二届人大（即议会）第一次会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也被提到了会议日程上。由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主义者在上层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林彪获得了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相同的地位了。彭德怀在东欧之行以后，于6月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称是那些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问题中新政治错误者的代言人。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开始做出了类似的批评。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八中全会。党的领导人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又转而反对那些宣称发展计划彻底失败的国内外批评者。毛泽东对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进行了激烈的反击。此后不久，那二人便分别被林彪和罗瑞卿取代了。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新的军队领导人从这场冲突中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林彪出任新的副主席（仅次于毛泽东），并尖锐地批评了他的前任彭德怀。根据林彪的说法，彭德怀的修正主义政治立场是修正主义军事领导方

法的继续。他宣称，这种情况将来不会再出现了。

1959年军队的形势

从1927年建军之时起，中国红军就占据了一片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连续苦斗了10年；它一直同时担任着军事、民事、意识形态和生产任务；由于享有各种特权，它几乎完全是自力更生的，在实际活动中，党和军队倾向于一起行动。解放后以及朝鲜战争后，军队的地位和角色才发生了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影响，苏联在军队现代化和职业化方面帮助了中国。这给军队的整个结构带来了问题——既有横向的问题（把全国分成若干军区），也有纵向的问题（军队的下级组织结构）。只有稍微探讨一下这种转变，才能正确地理解林彪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对军队的使用。

由于1949年已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合一的单位以及各不统属的"部队"，人民共和国划分成了六个军事和政治区，即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和东北。首都对区域政府的控制太有限，以致无法在发生冲突时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一点很快就表现出来了。这在东北表现得特别突出。东北在前20年有很大的发展，使它与这个国家其他地方颇不一样——首先是日本的占领，后来是苏联对这一地区的强大影响。它是唯一一个党的第一书记职能和军事司令官职能集于高岗一人之身的地区；高岗被怀疑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王国"（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术语）。1953年，紧张的关系导致冲突，并于1954年5月以有利于北京的方式解决

了。除了高岗外，华东的强人饶漱石也被迫放弃了他的职务。废除这些军事区域，使地方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们被11到13个第一类或第二类区划替代，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些大军区又被划分为23到26个军区，下辖军分区和警备区。大批的军事大区的领导人被提升到首都。

六个政治区域后来亦被取消，它们的许多权力转入了省党委手中，其中有民族自治区域和几个直接由中央政府领导的大城市。后来，在文革期间，中央政府的控制放松了，尽管进行了重新组合，但地区问题显然并没有解决。

就军队本身而言，除了已放弃一半人力的地方部队外，还有许多直属中央的部分——36个“军”。1953年以后，军队开始了发展与现代化工作，特别是在这些部队中。陆军中建立了技术部门，海军和空军也建立了。武器和技术主要来自苏联，随后又带来了军事思想的影响。当林彪站到最前面开始攻击修正主义时，这些中央控制的部队保证了他的地位；但是，在这些部队中，领导层受到的直接控制和遭到的指控也最厉害。其结果——对未来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政治左派的灌输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搞得最深，即在中央领导的、现代化的、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中搞得最深。

这时，作为一个军事和政治人物，林彪开始真正对下述问题着了迷。

主要是：在军队现代化的阶段，政治挂帅仍然重要吗？质言之，政治思想工作处于什么位置？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群众运动，武装力量的成员应持什么态度？

林彪在他的文章中得出的结论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理论上的回答，在1960至1961年间进行的一系列运动，用实践回

答了这些问题。在典型的中国式术语中，这些运动被命名为："三八作风"运动（旨在为人民献身）、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旨在完善战士个人和连队的行为）和"四个第一"运动。特别是后一个运动很重要。它是以一个优先体系为基础的：人优先于武器；政治思想优先于军事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新优先于政治惯例；实际运用优先于枯燥的书本知识。

除了这些政治运动外，在组织上也有了变化，这一点在文革中显示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总政治部恢复了。虽然这个军内的党组织正式隶属于党的首脑（中央军委）和军队司令，但在几年中，总政治部事实上扩张为一个独立机构了。从第一个运动到军队党组织的扩大和加强（在 60 年代中期），在 6 到 12 个月的时间里，其权力稳步增长（1961 年 3 月至 1964 年 1 月）。

解放军领导机关的实质从专断和等级森严变为民主和集体性，这一转变重新确定了解放军的性质。这一发展是随着 1961 年公布《人民解放军自治工作管理条例》而开始的，它涉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战士与军官的作用问题。军衔和等级制度（它是解放后按照苏联的榜样建立的）被放弃，1965 年废除了征募士兵的方法——这正好发生在彭德怀引进上述制度的 10 年之后。

与此同时，在军内进行了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细致的运动；这次运动也是毛主义在平民中扩大和普及的起点。于是，恰好在林彪的文章发表一年之际，"盼望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献给了人民。随后的几年中，也是出于林彪的鼓动，"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起来。这本书是从 1964 年起在军队中流行的，军外的流行从 1966 年底开始（是由于林彪的介绍），它出版了好几亿册。

在林彪的前同事肖华的领导下，军队中的党组织在1964年间得到了加强。最后一幕就这样开始了：从今以后，除了地方党组织外，军队也将对社会发生政治影响了。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下，组织起了一次全民运动。各省的党委书记被号召象省军区的政委那样行动。于是，在文革前夕，18个大军区中的11个，23个省军区中的18个，通过总政治部的人事部门，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在一起了。1966年一次全国会议之后，肖华直截了当地宣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军队指挥部和地方党委构成的双重领导体系必须得到加强。换言之，倘若在即将到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党的官僚机构达不到要求的话，军队的总政治部将接管其工作。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人民战争

1965年美国在越南的逐步升级，进一步促使对军队性质和责任作新的解释。所谓“北部湾事件”使美国找到借口轰炸北越，并加强在南方的军事存在。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对这场针对一个弱小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升级，如何做出反应？

苏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要想完全避免卷人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怀疑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遭到了中国人十分激烈的批评。苏联也是唯一一个在军事上被认为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苏联的政策却倾向于与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与中国人有限的联合行动似乎是这一困境的理想解脱方法。

林彪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庆祝纳粹德国投降20周年的活动给了他机会，他分析了统一战线及其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对比了当代事件。他的这篇文章必定会引起毛派分子的反对。四个月后，在庆祝日本投降的纪念日（9月3日），林彪的一篇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成了他的"理论著作"，即《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林彪断言，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苏联的联合行动是不值一谈的。

> 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
>
>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1]
>
> 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重复着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所做的事情。掌握和运用人民战争这个武器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人民的迫切需要。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正在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扑灭人民战争的革命烈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象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人民战争，诬蔑人民战争。

接下去的章节进一步讨论了"矛盾的原则"[2]、"正确执行

1. 中略。——译者
2.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原文此节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路线"。——译者

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下一节是论"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的国际意义"。这一理论最重要的概念如下：

> 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1]
>
>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

接着有两节，一节是号召军队"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另一节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人民战争的叛徒"。

信息是清楚的：凡是鼓吹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人就是准备向修正主义妥协。

秋天，罗瑞卿和林彪的冲突变得十分尖锐了。1965 年 12 月，在一次常委会上，林彪向罗瑞卿提出了许多指控。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将调查这些指控。在下一个月中，当总政召开一次全国会议时，罗瑞卿的名字就不再被提起了。几个月后，当工作组提交了他们的报告

① 中略。——译者

时，他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他的总参谋长职务后来一度由黄永胜担任。新总长黄永胜是林彪在八路军115师时的战友。他们是军队在政治中应扮演积极角色的有力的鼓吹者，在文化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似乎是毛泽东忠实的盟友。然而，他们后来都增大了授予他们的权力，终于因"左倾"而垮台。

五、江青与陈伯达；文化的革命化

毛泽东转为进攻；江青的崛起

在1962年9月于北京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设法阻止了从大跃进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上后退。后退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时，从这场运动的规划中发现了严重的缺陷。在随后的两年中，天灾引起的严重歉收加速了从这次运动的目标上退却，进一步削弱了这一计划的可信性。当时，毛泽东的处境无法使党的领导层相信他的观点的正确性。这些后退导致了某些对毛泽东的有克制的批评，某种暗中存在的压力要求给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批评者彭德怀恢复名誉。

然而，经济刚刚有起色，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击。他没有局限在仅仅加强已有的措施，他发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呼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2年9月底，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1957年就提出的发动一场新运动的建议被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在社会制度的基础革命化以后，这次运动打算完成上层建筑的革命化，以解决大跃进的困境所带来的问题。农村人口政治教育的不完善，给行政人员犯错误造成了机会，而他们治下的人民无法纠正他们的错误。根据毛派分子的说法，群众与行政领导阶层的这种

不平等在苏联导致了斯大林主义。

除了农村长期以来革命进程迟缓的倾向外，在大城市人口中也存在着“革命道德的严重削弱”（他们虽然在总人口中占少数，但数量也有1亿），这进一步放慢了进步的过程。在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等重要的集团中，情况尤其是这样。他们的思想削弱了新一代的道德，因此，从全局的观点来看，便危及了持续而深人的革命。1959至1962年间，知识界的颠覆思想极为流行。然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接受修正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起来了，它得到了半心半意的党组织和积极性日益高涨的军队的合作。与此同时，在1963年间，毛泽东准备向“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发动反击。那年12月12日，他写道：

>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
>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两个星期后，华东地区戏曲汇演在上海举行。这次汇演持续了四个星期，其间，几出新的“社会主义戏剧”将出台。这次活动的发起者是江青，30年代初，她曾在同一城市成功地从事过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生涯。1937年，她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在那里，尽管有某些人反对，她还是嫁给了毛泽东。根据某些报道，这是毛泽东入党后的第三次婚姻。据迄今为止的了解，她第一次以正式身份露面是在1962年9

月，当时，苏加诺总统访华，她是正式的女主人。同月，在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出了搞一次文化革命的第一批建议。翌年，江青开始愈来愈多地公开露面了。她的第一次露面是体面地以党主席的夫人出现的，但有理由相信，她在文化、政治和文化政策领域里开始扮演一个越发独立的角色。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一次发表了激烈的讲话，反对党内在文化方面那些“自以为一贯绝对正确的人”，说他们：

>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选择这个时机进行攻击不是偶然的。同年夏天，江青的先锋戏剧集团通过京剧现代戏汇演，占领了首都最富传统的舞台；同时，艺术和文学的整风运动、京剧的改革正式开始。帝王将相的主要角色地位被工农兵代替。革命、解放战争和民族奋斗将成为新的主题。这当然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并不是最后胜利。现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子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那些人已经受过谴责，尤其是企图利用大跃进中所遇到的困难而怀疑整个运动的人。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现代作家吴晗一部作品的遭遇，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极好实例。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位16世纪开明的官员，

挺身而出，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对抗专制的皇帝，并因此丢了官职。这部作品于1961年出版，其口号是"向海瑞学习"。这部作品的出版经过了两年的讨论。这位历史上的英雄与彭德怀惊人地相似；彭德怀在激烈地批评了农业集体化和毛主席之后，于1959年被罢免了国防部长职务。

批评吴晗的文章准备了七八个月，在此期间，江青和她的两位合作者把这篇文章改写了好几次。这两位合作者中，年长的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张春桥，年轻的是上海两大日报之一《文汇报》的记者姚文元。江青和这两个人的连续合作，可能是从她在上海发动戏剧革命时开始的。

尽管批判吴晗的文章是集体的手笔，但决定以最不见经传的作家姚文元的名义发表。因此，宣传机器的反应是"无偏见的"，所有发表的见解都没有断然下结论。吴晗毕竟不是个无名的人物，这一点在10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这篇批判文章后表现得很明显——该文遭到了冷遇。虽然这篇文章的语调非同寻常地尖锐，其内容的重要性也足以引起全国的注意，但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新闻媒介对它却不加评论。

北京的新闻媒介是由以市长彭真为首的市委负责的。吴晗以及另外两位受到了类似批判的作家邓拓和廖沫沙都是彭真最密切的合作者。彭真也是一个在全国的党组织中有实力的人物，对中宣部有相当的影响。全国的新闻媒介由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陆定一负责。彭真和陆定一都是文革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当时在最高层组成的。

在不断发展的局势中，康生是这五人中唯一一个被指定扮演"进步"角色的人。象党的书记处一样，"五人小组"在很大程度上受保守派和温和派影响，彭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局势。

因此，吴晗的批评者们被追寻找其他途径来宣传其批判。哪个地区的新闻媒介不受彭真和陆定一的直接控制？

一、上海集团可以通过有关的地方行政机关转向其他的地方行政当局（张春桥仍然是地方党委的第三书记）。地方当局在宣传中的确控制着某些领域，在这方面它们不必和国家的行政当局磋商。

二、可以通过同情者与新闻媒介的特殊部门负责人接触。这类人中明显的一位似乎是陈伯达，他是江青的熟人，他取代陆定一成了《红旗》杂志的总编。陈伯达在知识界中的突出地位使陈成为与新闻媒介某些部门进行接触的理想人物。

三、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条途径，是与党的宣传机构对立的军队宣传机构。张春桥作为南京军区的政委，其地位使其在那里有良好的关系，也使其顺理成章地与总政治部有关系。

第一条路是通过批判者们自己在地方组织中的关系。这篇文章被送了出去，也许是从党的华东局送出去的，送到了各省的新闻媒介手中，引起了相当的注意。随后，它便以小册子的形式流传开来（这本小册子是地方出版社出版的），并电传至全国的公共机构。在半年内，流传的小册子已达到50余万册。1965年12月初，《文汇报》对发展到此时的争论发表了一篇述评，把局部的攻击扩展到了对基础文化的批判。

第二条路是试图影响国家宣传机构的一个部门，他们设法与陈伯达接近，多亏了陈的影响，这篇文章才得以在12

月底《人民日报》的特别学术增刊发表。1月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本月刊上也刊登了攻击文章，作者是一个叫关锋的人，他和陈伯达的其他几位支持者王力、戚本禹、林杰一起，在陈伯达周围形成了一个激进的评论家集团，与姚文元和张春桥在上海支持江青的方式差不多（张、姚两位意识形态的急先锋后来加入了这股势力，并形成了文革小组——即“五人小组”的继承者）。

第三条路旨在智胜党的宣传机构。11月底，姚文元最早写的那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总政治部开始了一场强有力的文化批判运动。1966年2月初，林彪为江青身边的这个团体在军内提供了一个“自由天地”，这样，便使这个团体逃脱了北京的党的书记处的直接控制。这个团体得到了全权委托，在军队内部进行他们的活动。受林彪的委托，江青组织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得到了进行这个工作的设备和人员。总政治部的高级成员到上海开了几个星期的会，值此之际，林彪宣称：

>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彭真对批判吴晗的反应

现在的局势已不容彭真周围的人再保持沉默了。彭真的策略是争取主动，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向上去。文革中，保守派为了保护他们的地位，总是采用这些战术。

11 月中，北京市委直接控制的《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笔名的文章，也向吴晗发动了攻击。然而，它的笔锋所向仅涉及这出有争议的戏的学术和历史方面的问题，没有理会其真正的政治含义。后来证明，这篇文章是邓拓的手笔；在北京党的高层领导中，邓拓是吴晗的同事，并且和吴晗一起在 1959 至 1962 年间共同写了一些其他有争议的文章。几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整个讨论的情况概要，但它并不是一篇对于以往各种事件的报道，而是暗示事情并没有了结。北京党的高级官员关起门来组织了一次批判吴晗的会议，从而使这种印象进一步加强了。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吴晗于 11 月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评，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上海的《文汇报》称这篇检讨是不充分的，并在北京的批判家们支持下发起了猛攻。随后，北京党的高级官员又组织了一次批判吴晗的会议，而作者又发表了一篇新的更全面的检讨。但北京和上海的文化批判者们还是不依不饶。彭真此时决定反击了。2 月初，《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姚文元的“闲话”，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利于关锋的“控告”材料。这时，为了决定下一步文化批判的行动方针，彭真召集了一次“五人小组”的会议。他坚持认为，这种批判应局限在学术和历史讨论的范围内，应当掌握

在“合格的”意识形态当局手中，而不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搞政治攻击。他在“五人小组”中成功地赢得了多数，他的建议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对便被通过了。在随后举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生了类似事，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是由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主持的。到2月中旬，彭真的建议得到了批准，并在党内进行了传达。接着，北京市委邀请北京大学对海瑞这个人物进行“专业研究”；国家宣传工具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必须避免与彭德怀的事进行“煽动性的比较”。现在党中央的官僚成功地把这场毛派分子的文化批判导入了死胡同。“笔杆子”们——江青和陈伯达似乎搞了一次最糟糕的交易。“枪杆子”——林彪终于被迫出来营救了。

彭真的垮台；“五人小组”的解散

3月中旬，召集了另一次常委会，政治局委员们被召来了。这一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的。这次会议的召开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杭州——这个城市在华东局控制的地区，离毛派分子的权力基地上海很近。第一项重要的议题，是根据外交部长陈毅的提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邀请。现在看来，在越南问题上的中苏联合行动比以前更不可能了。若结合林彪和他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争执的背景来看，这就意味着罗瑞卿的地位被进一步削弱，而林彪的地位则必然得到了加强。这也表现了毛派分子在党的领导人中一次可观的胜利，使他们坚信，他们现在有足够的力量考虑与保守的党内官僚进行对抗了。这导致这次会议做出第二项重要决定。

现在，毛泽东出面为姚文元对吴晗的批判承担了责任，并对反对这一批判的人发出了更为尖锐的指责，大意是：吴晗和翦伯赞是党员，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反动分子)；在这些领域中，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们应当有我们自己的年轻人，不要怕这些人触犯所谓的"王法"，这些人的文章不能压制。

于是，对吴晗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其含义更加广泛了。彭真被迫退却，而允许彭真的建议在2月份获得通过的刘少奇则不得不与这些建议划清界线。然而，在书记处的一个"核心小组"的帮助下，刘少奇使彭真的地位暂时没有受到影响。政治局内部的关系依然是混乱的。但是，在1966年3月的这次会议之后，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3月底，据报道，毛泽东曾对他的一位合作者说过一番话，大意是说，吴晗发表了那么多文章，用不着任何人批准，但轮到姚文元时却要批准了，这是为什么？左派的文章受压制，学术界的大学阀却受到保护。宣传部成了闫王殿，但现在必须解放小鬼。他说他一直要求，如果中央那些掌权的人工作做不好，地方可以造他们的反。地方上需要多些造反精神，能大闹天宫。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要对保护坏人负责任。中宣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必须解散。

但是，毛派分子团体仍然没有把握把整个事情提到议程上去。还要进行迂回，但这次迂回使林彪军队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两天，林彪便把2月份讨论江青一伙人的会议纪要提交给了中央军委。1965年12月罗瑞卿垮台以后，中央军委便几乎完全处于毛派分子的控制之下了。3月底，中央军委决定把林彪的报告提交给书记处和政治局。

这一出人意料的行动打破了党的领导层的僵局。彭真和他的支持者现在与军委的权力发生冲突了。

到4月中旬，这场运动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中来势凶猛，使吴晗和他的保护者们垮了下来。邓拓（随后是廖沫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检讨之后，便从他的职位上垮了下来，但他的批评者们还是反对他，说他的检讨不充分。这时，彭真试图与市委中那些名誉扫地的合作者划清界线。陈伯达在康生的支持下，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中对彭真发动了进攻，并宣布重组“五人小组”。在4月的下半月和5月的上半月，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又在杭州和上海开会，冲突似乎终于以对“左派”有利的方式解决了。

然而，在5月1日，党的领导层（包括彭真）仍然以团结一致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事实上，政治事件已经到了不能回头的地步。同时在新闻界搞起的运动中，林彪的《解放军报》不断地发表一系列指导性的文章，从中可以窥出端倪。4月18日，在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刚刚召开的时候，其头版标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5月4日时，大标题变得更富于战斗性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在1962年发出的呼吁）。5月8日，党领导内部的冲突到了决定性的关头，大标题高呼：《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他极左派的喉舌也开始大喊大叫起来。陈伯达的《红旗》投入了这场战斗，与此同时，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比以往更激烈、范围更广泛的批判文章。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1959至1962年间文化和政治反动行为的幕后“首脑”；说是在支持者的帮助下，彭于1961年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中央关于大跃进的所有文件。文化批

判方面的指控扩展成了对更严重的组织宗派集团行为的指控。这些指控不仅把吴晗与彭真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把彭真与“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了。“五人小组”实际上已解体，而且没有象宣布的那样重组。

根据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报道，在4至6月的关键时刻，突击部队处于紧急状态，预先防止反对派可能采取的任何造反行动。据南通社的报道，4月的那次党领导人的决定性会议开过以后，北京的党的书记处处于军事控制之下；4月17日，彭真由两名警卫陪伴离开了，另外10名军官在他的办公室外布了岗哨。在这些事件以后，在重组北京卫戍区和军区以前，据说林彪把一些中央指挥的部队从外省调进了首都，以防止任何可能的“兵变”。大约在5月中旬，毛泽东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返回首都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安全在那里得不到充分的保证。只是到了7月中旬，由于紧张的政治局势，据说毛泽东才回到了北京，这时，他的新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北京增加了军队的数量。南通社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争议，但发生了这一事件后，“左右两派”在文革开始时陈兵示威，恫吓对手，以防止任何敌对行动的发生，看来的确是有可能的。倘若没有中央指挥的部队支持毛派分子，那么，反对派与党中央官僚的冲突是否能如此迅速地以有利于毛派分子的方式解决，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66年文革刚一开始，军队就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尽管毛泽东在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对军队在事件中总是扮演主角愈来愈反感（“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在1966年5月的上半月，毛泽东却借助野心勃勃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军人林彪的支持。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三个月后，8月7日，这封信的内容

被林彪用来号召全国人民（就象以前他号召全军那样）组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起初，它被用来证明军队——其实际上填补了党内官僚的僵化所导致的政治空白——对中国其他部分的影响以及军队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正当的。文革开始后，这封信似乎成了搞半军事化行政管理和后来搞过了头的个人崇拜运动的依据。

六、犹豫不决的毛泽东：三个文件

1966年5月16日中央委员会的通知

1966年5月16日，在文化革命的第一个回合中，终于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政治局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它给了吴晗和彭真以最后的回答。这个通知是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

>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接着，通知列举了彭的10个最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搞清吴晗的海瑞戏要害是罢官（由罢官使人想到了彭德怀）；讨论的基本政治性质（又提起了反对大跃进的事）被“学术性”和“理论性”掩盖了；彭的建议包含着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如“表达思想的自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的鉴定”、“积极的批评”、“学术自由”，没有正确地注意阶级的问题；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多余地强调需要“指导”，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应该是充分动员群众。通知断言：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林彪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

1966年5月18日，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开会。毛泽东没有出席，第一个发言的是林彪。在权力平衡的突然变化中，林彪开始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他从这一机会中得到了好处，做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讲话——这是他的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

讲话。听听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有助于理解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在事态的发展中已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对彭真的指控同样适用于“五人小组”的另外两位成员：陆定一和杨尚昆。他又一次提到了总参谋长罗瑞卿；他与罗瑞卿在国防政策上意见分歧甚大，从12月以来，罗已经不在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了。现在，他的指控已经超出了深刻的政治分歧范围，他进一步指控罗瑞卿准备搞一次“反革命政变”，用武力威胁政权的安全。尽管这种谴责的升级并不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但某些指控的率直还是令人大吃一惊。接着，林彪进一步发挥他的主题，全面地论述了政变和某个特殊时刻中国发生暴动的可能性。他又谈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伟大作用，及如何传播这一思想。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又一次把问题简单化了，不是论述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是开始吹捧毛泽东特殊的天才；他认为毛泽东的天才胜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简言之，中国的“革命经验”永远不会被别的国家超过。他总结说，他决定发行《毛主席语录》作为军队意识形态的教材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下去。

在未来的几年中，他在这里讲的那些半真半假的东西和显然夸张的东西，都逐渐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在当时，毛派阵营中的人都没有公开讲过反对这些东西的话。人们承认，简单化的宣传在发动舆论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与党内官僚对抗时，中央指挥的部队的威力和总政治部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也许还在想，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严厉的方法将让位于较为灵活的方法。但是，1970至1971年间，情况变得很清楚了：上述的变化是不会出现的，林彪还是林彪——一个宁愿把深刻的政治分歧变成正面军事对抗的人。到了1971年，林彪的处境是这样的：他在1966年5月

加于他的对手的几乎所有指控，都可以一字不差地用来指控他自己，而且这种指控更加理直气壮。他那时说道：

>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
>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次毛主席召开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了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好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我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
>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
>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①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来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镇压。社会

① 中略，下同。——译者

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们所了解的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〇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五十六次。

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作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夺取了政权十六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上我们没有去

占领……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以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民的大国就会乱起来。……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吴晗、邓拓、廖沫沙等等都是如此，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后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讽，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象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样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象毛主席那样长期的，那样复杂的，那样激烈的，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看得远，观察得多些、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

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道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但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林彪的思想遇到了某些抵制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抵制不仅来自已经蒙受羞辱的“右冀分子”（从罗瑞卿到彭真）和“保守派”的中心（刘少奇和邓小平），而且来自“较温和的左翼”分子（如周恩来）。任何尚未蒙受羞辱的人都不想落到那种地步，他们在这微妙的时刻提起嗓门反对林彪的思想就更不足为奇了。毛泽东也持十分保留的态度，但此时此刻，除了身边的人外，是否向其他人表达他的看法，他尚在犹豫。当北京的局势发展到新阶段时，他却退居乡间思考形势去了。在隔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从那里给他在上海的妻子江青去了一封密信，在这封信里，他表达了他的保留。即使在文革时期，显然还是有一小群人熟悉党的

主席在那封信中所表达的看法的。但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在1972年介绍林彪情况的运动中，这封信才在党内传开。据说，毛泽东是在1966年7月8日写这封信的。信中写道：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

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①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① 中略。——译者

第　三　章

文化革命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毛泽东

七、从上层冲突到基层动员：学生运动

北京的学生造反

毛泽东自从在1962年9月宣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来，除了思索文化批判问题以外，还思索了其他问题——青年的问题。1964年，当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的运动开始有成果的时候，由于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不和，毛泽东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帝国主义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训练和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同年，罗伯特·吉尔伦指出：

> 据说，毛泽东曾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是有关中国青年的……在这份文件中，主席分析了青年的本质和作用；他指出了一些赢得青年相信社会主义的方法，并做了详细的指令，要求给青年以进行革命斗争的、更为彻底的教育。

毛泽东向党的领导层所做的陈述渐渐传到了下面的党组织。1964到1965年间，有了两个发展。党的青年计划有了相当大的扩展，青年运动多少有点儿不加区别地接纳

了800万成员，从这一点便可略见一斑。各级都开展了对现存教育形式的讨论，尽管在可能进行的选择方面似乎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学生中开始第一次出现了骚动，尤其是在大学里。学校当局的反应表现在许多方面，从强制性的纪律措施（强迫到农村进行"生产"劳动），到成立由党的官员组成的所谓工作组（其任务是"指导"运动）。高等院校的气氛已经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地步。尤其是1965年出现了文化批判后，上面那句形容局势的话显得十分贴切了，学生中又出现了反对学校当局的气氛。

2月初，北大哲学系反对学校当局（它与彭真的市委关系密切）的一项动议——即对吴晗戏中人物海瑞的历史原型进行一次广泛的研究，说是这将会把一次重要的政治讨论转变为一次纯学术争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冲突逐渐深化。学校当局不得不向党的领导让步，他们对造反分子变得越来越不妥协了。5月25日，冲突公开爆发。

那天下午两点钟，北大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在食堂门口贴了一份大字报，向学校当局提出了挑战，并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1天前，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前夕，学校当局曾明确表示禁止这种行动。这份大字报唤起了复杂的感情。三五成群来吃午饭的学生默默地读着这份大字报，并小声议论着。大字报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

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在这个关键问题之后，是对5月14日学校当局为文革运动所设下的条条框框的评述，学校当局强调有必要"正确引导"和不能"无限制地发动群众"。大字报也是被禁止的，只允许贴小字报。没有群众大会，只有聚会和仨一群俩一伙的人，因此，文化批判再一次被降低到理论争论的水平。这份大字报由副教授聂元梓领头签名，另有七名造反分子。自从出现了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不利反应以来，她一直是学校当局的批评者。1961至1962年，她击败了官方的候选人，当选为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和学校当局发生冲突。

看来，她很可能知道，激进的"笔杆子"和"枪杆子"在与党内官僚的对抗中已经得手。她得知这一情况，可能通过若干渠道：通过工作关系，她与陈伯达的学部有联系；作为一名中层党的书记，她可能已经知道了《五·一六通知》。于是，她冒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把她的名字签在了大字报上。

然而，正如预料的那样，对大字报的反应是强烈的。就在同晚，学校当局发动了一次青年人的反示威。这份大字报被覆盖，并且受到了另一份大字报的批判。造反分子在当晚召集的会议被"保皇派"冲了，大字报的作者们被要求说明他们的立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到农村去进行"生产"劳动（其他6000人已被送到农村去了）。但这次造反分

子们知道，他们不会沉默很久的，他们向毛泽东和党领导中的极左派发出了呼吁，因此，他们把事情捅到了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北京城。根据某些消息来源的说法，大字报的内容被交给了地方新闻媒介发表，但在当时，也许新闻界中谁都不敢向学校当局和市委挑战。但是，根据其他报道，地方报纸、出版社和电台已处在林彪指挥的军队的控制下，以防止新闻媒介的进一步抵制。与此同时，据说毛泽东通过康生下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这篇大字报的内容作为造反分子首创精神的样板已经广为流传了。这份大字报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人民日报》于6月1日发表了一篇对北大发生的事表示赞扬的评论，它写道：

> 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在其他方面，粉碎僵化的北京党内官僚的行动也开始了：改组华北局清楚地表明，这是对北京市委进行紧急清洗的开始，也是为了使北大当局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学生革命已经开始有理由了。在北京市和学校当局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其见解的同时，造反小团体的革命热情控制了整个哲学系、整个北大以及与其毗邻而比其大得多的技术大学——清华大学，也控制了附属于它的中学，控制了北京其他及外省的大学、中学。新闻媒介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动了一场反对党内官僚的狂热宣传，学生中和学校里的破坏性行动終于导致

了停课。

在毛泽东退居乡间对下一步的局势进行思考时，首都的造反派又采取了反对"右派"的进一步行动。中央的"右派人士"开始组织又一条防线，以制止"野蛮行动"的进一步扩展。这些人在党的书记处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是刘在保护北大的学校当局。6月初，他们往造了反的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指导"文化革命，试图再次控制住运动。6月7日工作组的进驻，标志着学生们一周的狂欢的结束；在那一周中，那些被放逐到农村的人凯旋而归，批判学校当局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了出来。起初，人们把党的官员召来，作为支援力量，但很快便证明，他们还是想要控制这种自发的造反，就象学校当局早先做的那样。对学校当局的批判被消于无形，而批判聂元梓的运动却在继续。困境的范围在清华大学更大，500名党的官员组成的工作组于6月19日进驻，领导那里的4万名学生，使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工作组的到来使对立不必要地普遍化了，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学校当局与造反分子之间，而且存在于工作组和学校当局之间。6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确认了对彭真领导的北京官僚集团彻底清洗之后，上述对立情绪的逐步升级更激烈了。这次会议给了北大和清华的造反分子以新的希望，他们把学校当局的重要成员架到群众大会上去搞批判和自我批判。他们从毛泽东那里为这种作法找理由，引证他早年著作中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然而，工作组声称，形势和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同了，并对"反社会主义"的捣乱分子进行了反击。这种局

面发展成了团结在工作组组长叶林周围的"保皇派"学生与聚集在蒯大富身边的学生之间的直接冲突。蒯大富是清华大学6月1日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6月23日，局势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蒯大富用一篇冷嘲热讽的大字报向工作组发起了直接的进攻，当头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他们的发言人是中国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女儿——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在激烈的争论中，她脱口说道:"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群众叫喊着:"你母亲在哪儿?""这儿是大学!""让她自己来!"于是，后台便有了一次电话交谈。刘少奇的夫人（她也起着若干作用）真的来了。她确认了她女儿的话，并宣称这是她本人的看法。这种个人的介入当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参加大会的多数人出现了犹豫不决的迹象。但造反分子们比以往更加坚定，决心与"保皇派"的保护伞斗到底。随后的几周里，他们的抵抗更加坚决。与此同时，王光美的工作组的清规戒律也更加严厉了。其结果是局势恶化了（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绝食了），蒯大富的一些朋友又试着向党领导层中的极左派发出呼吁。6月底，陈伯达和他的两个最亲密支持者——年轻的关锋和王力去了清华大学，了解那里的局势。他们的结论是工作组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蒯大富则被他最后的支持者们接了出来；陈伯达把书记处的阴谋告诉了毛泽东。通过某些消息来源得知，刘少奇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了，他试图趁毛泽东不在（据说毛病了，甚至动了手术），在北京召集一次紧急的中央会议；许多非毛派的地方委员会成员正好在北京参加一次声援越南的大会。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行政干预，林彪在军队中也采取了类似行动，阻止了这次中央

会议的提前召开。

毛泽东返回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演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性的一幕，这将成为局势的转折点。他在武汉附近的长江上参加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考虑到他已73岁）游泳马拉松。这件事传遍了全国。这次示威的含义是绝对清楚的：党的主席仍然充满活力，根本没病，肯定不会脱离政界的。第二天，在长期外出之后，他回到了首都。有的报道声称，林彪把外省的特种部队召进北京，以防止毛泽东的对手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他的同事杨成武（他将在两周后替代罗瑞卿总参谋长的职位）负责毛泽东的个人安全。

党主席的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的行动，尤其是他们组织工作组反对学生造反的行动。他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无疑是陈伯达和他的支持者；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毛泽东本人也与各大学有直接的接触。

几天后，负责文化革命的新小组的三位核心成员康生、陈伯达和江青来到了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从7月22日到26日，他们对那些已证明自己的行动"正确"的造反分子进行了一次调查，那些造反分子被召集在一起搞一次范围更大的运动；工作组被解散了。江青亲自领导了对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的攻击，王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学生道歉。据报道，王光美在随后的几天里不得不表现一下，去食堂干"下等活儿"；后来，她由于在打饭的时候

照顾自己的朋友而受到指责。

当周恩来总理于7月30日从调查中得出他的结论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后，这种状态就结束了；最后与刘少奇一群人算总账的行动在另一个层次开始了。

红 卫 兵 现 象

此刻，学生的造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种造反变成了范围更为广阔的反官僚运动的催化剂。几个月前，当文化批判第一次变得激烈起来的时候，学生中便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团体。其中有些组织是半官方的，例如共青团在党内官僚的教唆下纷纷组成了较小的团体。起初，这些组织仅仅是由"无产阶级"和有党背景的人的子女组成的。按照打算，这些团体应成为范围更广的青年运动的先锋。其他的组织几乎全是带有非法性质的，这些组织是由造反的学生组成的，它们被迫与一些因反对工作组而形成的地下秘密团体结成了联盟。

随着工作组的撤出，出现了一种呼吁：学生们要变得更加独立，要成立较大规模的青年政治团体。这一相对自发的动员，致使在全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独立团体，它们根据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各种各样的革命名称，为自己命名；不过，至少就中学生和大学生而言，它们的总称是"红卫兵"。关于红卫兵的组织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发起者"是怎样给他们的组织命名的，已经有过连篇累牍的报道。然而，事实上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并不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当时存在的联合组织通常是地方性的、暂时的、也

许还受到一些全国性机构的影响，虽然并不直接受它们的控制。

这样的全国性机构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共青团—党内官僚—工会组织的传统复合体；中央的军队机构，尤其是总政治部；文化革命小组。

在文革开始时，传统的利益集团——党的组织及其外延机构千方百计把新群众运动转变为由上边指导的传统运动。这一倾向虽然在中央很快被制止了，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却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地方，在那里，传统的党组织依然保持着影响力，保持着对批判的相对的免疫力。

经过林彪的若干年准备，中央的军队机构和总政治部，在一旦发生社会的复兴革命化运动时已能够接替党的指挥角色了。这一时机现在来到了，军队在运输、服装和庇护方面提供物质的支持，同时，政委们则用意识形态教育提供道德支持。

然而，对红卫兵及后来的革命工人造反派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却是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及其下属机构和组织。这个小组取代了“五人小组”，现在直接隶属中央常委。

直到 1966 年 7 月，这个小组的面貌才变得清晰起来。旧的“五人小组”中只有一名成员留在了新的文革小组内，此人便是康生，他在 1959 年曾谴责过彭德怀，1966 年谴责过彭真，不过，他的作用比较小。文革小组中最重要的成员是副组长江青，她从上海带来的盟友张春桥和姚文元，此外还有得到北京同事们支持的组长陈伯达。几个月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也加入了。在整个 6 月和 7 月上旬（即所谓工作组的“五十天”），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风口浪尖上几乎没有现出他们的身影，尽管他们谨

慎地与造反学生保持着接触。但是，他们通过组织造反学生动员群众，对局势了如指掌。因此，工作组一撤消，他们对局势的了解便大有用武之地了。文革小组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和各大学的革命联络中心保持接触。后来，这些联络中心发展成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右派、温和派和左派）。

十六条；第一次纠正

1966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39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篇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5月7日给林彪写的一封“私人”信件。据报道，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呼吁军队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日，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是四年中的第一次全会。一些丧失了名誉的中央委员没有出席。会堂里里外外有相当数量的军事人员，也有由北京各大学的“革命师生”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这次全会召开期间，恰逢毛泽东贴了一张大字报，把学生的行动当作其他与会者的榜样。这份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这题目使人想起了内战时期，那时，如果司令官想和敌人妥协的话，游击队员们就会以兵变相威胁。这份大字报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由于毛泽东这次攻击的影响，在党的领导层中终于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中央委员会同意将文化革命扩大为一次更广泛的反官僚运动。

林彪也做了一次发言，这个发言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赞扬毛泽东，尽可能把自己说得极谦卑："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另一方面，他把十分复杂的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倾向的斗争尽可能地简化为寥寥数条：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

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此时，林彪虽然成了极左派的强有力的人物，但他的意识形态分析得到的评价并不高。成为运动发展推动力的，是受毛泽东系统阐述影响而制定的一套更精妙的方法。8月8日，中央委员会采纳了一种宪章，它为文化革命的未来制定了一整套计划。这个决议案被通称为《十六条》，它的概要如下：

1.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选定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但是反对者总是试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3.然而，人们不必担忧，必须放手发动群众；

4.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千万不要在任何事上与群众背道而驰，群众在这次运动中会自己教育自己；

5.与此同时，必须坚定地运用党的阶级路线，反革命的右派必须完全被孤立，左派必须发展并取得核心地位，因此，这场运动将会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和干部的大多数；

6.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别对抗性的矛盾（与阶级敌人之间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歧必须通过辩论而不是通过武斗解决，少数人常常是正确的，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必须让他们保留表达意见的权利——每个人都必须确认这一权利；

7.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8.在处理干部问题时，必须把他们分为四种——好

的、比较好的、可以改造的、不可救药的，前两种是大多数；

9.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必须加以鼓励；

10.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对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一次激进的改革；

11.在报刊上点名必须由同级的党委决定；

12.必须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员逐步在政治上改造自己；

13.必须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带动已存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得妨碍发展生产；

15.部队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根据中央军委和总政的指示进行；

16.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党的领导层中意识形态的一边倒，也反映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移到了突出地位，开始更积极地发挥主席的作用。此时，林彪的作用已远远不仅是国防部长了，他是以毛泽东的副手和可能的接班人面貌出现的。前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退到后面去了，只有周恩来大体上保住了原有的地位。他是第一个宣布跟毛泽东走的人，现在，他的任务是解决由文革的发展所带来的数不清的行政问题。

学生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局限在北京，现在，它已经发展到省会去了。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交流革命经验"并接受将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指示"的学生们，做了第一次讲话。8月18

日，他也是天安门上的发言者之一，这是随后在这里召开的许多次外地红卫兵群众大会中的第一次。其他的发言人是林彪和周恩来。毛主席也出席了，并允许一位年轻的听众把一个红卫兵袖章套在他的胳臂上。同日，北京爆发了一次反传统事物的行动，并很快扩展到了其他城市。不够革命的街道和建筑的名称被改换了。拿着鼓、红旗和标语的学生队伍穿过城市，警告"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要老老实实。到处都用油漆写上了标语口号，大字报贴了出来，小册子四处散发，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不久，巨大的动员便扩展到了年轻工人那里，从北京扩展到外省的城镇，又从那里扩展到了农村。随着行动变得更加激烈，第一批暴行开始出现了。这也是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群众大会上的发言造成的后果，他在那里说道：

> 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抄"资产阶级分子"的家的行动被组织了起来，抄出来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外币或国民党的文件，在大型的展览会上向愤怒的群众展出。破坏古董的行动被制止了，因为这些东西不但代表剥削阶级的财产，也是贫穷的艺术家们技艺的成果。8 月底，林彪发现有必要反复向某些红卫兵提醒一下《十六条》里的限制性条文，并提出军队要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战时期军队曾遵守过这些条

文，并在60年代初将它们恢复起来。

9月初，对局势加以调整变得更加迫切了。宣布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尤其是强调表达见解的自由，与此同时，又对“无政府主义”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这时，从外省涌向首都的年轻人和从首都涌向外省的年轻人愈来愈多。旅行已宣布是免费的，北京组织了大批的接待站。天安门广场几乎每星期都举行群众大会，年轻人希望能看一眼毛泽东，或听陈伯达、林彪或周恩来的讲话。夏天结束前，大约有1000万或1100万年轻人访问了首都。这些年轻人被寄希望与遍布全国的北京学生一起返回老家去，冲破地方党组织对消息的垄断，在各地的人民中把运动搞起来。这也导致某些过火行为的发生。对于许多在封闭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新的自由无异于一种出乎意料的奢侈，许多人在极端革命原则的名义下利用这种局势捞取好处。千百万留在首都或全国旅行的年轻人对可利用的物资提出了频繁的要求。戈登·本尼特和罗纳德·A·蒙塔博托写过一本有关一位后来逃到香港去的红卫兵的书，里面提到过在这种局势下发生的一个例子：

> 革命歌曲震天响。一个伙伴狂喜地说：“就是做梦我也想不到能一个子儿不花到北京去！”另一个伙伴充满希望地说：“咱们一到北京，就能看见雪啦！”……有几个人甚至一个心眼儿地盼着尝一尝北京烤鸭……我想不起有谁提议我们到首都去交流革命经验。

书中又写到了另一场景：

在入口处，我们看见十来个红卫兵面对着两名工作人员：

“混蛋！把党委书记叫出来！”

“我们今天要是拿不到钱，你们这些老爷就甭想走！”

“你们知道，不支持红卫兵的行动，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一个工作人员嗫嚅着：“不是我不支持，我们在财务上有困难；我说过借你们每人一块钱，可你们不干。”

“我们当然不干！我想要五块！”

“我想要十块……”

起初，除了和蔼地劝说，并答应春天串联可能会重新开始外，制止这种事情发生的企图收效甚微。进一步控制局面的方法是把留在首都所需费用的供给减到最低程度，只有返回的车票是免费的。这时，第一次发出了威胁：凡是不打算准时报到的学生，将会被教育当局开除。但是，有大批的人却不打算理会这些威胁，要接着自由自在地逛四方。在文革的后几个阶段，在形成极端革命团体时，这种现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然而，运动的重心却慢慢地从北京向别的城市移动；造反行动在扩展。

八、从先锋到主力军；工人运动

上海的"一月风暴"

正当外省城市的红卫兵去北京的时候，北京学生的先锋却到农村去了。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联络中心建到哪里；青年政治团体象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最大的城市上海。这个城市大约有1000万人口，有第一流的港口，是个繁荣的工业中心。1966年8月31日，市府领导拒绝会见北京和上海本市的红卫兵，红卫兵便包围了市府大楼。市长称这些红卫兵是反革命，并把工会领导下的工人团体动员了起来。经过几天严重的冲突后，工人们给市府解了围。作为回答，造反分子们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区进行煽动，并从北京召来了增援力量。这场革命初起时的两位有名人物亲自率领增援力量来了，这两位人物就是聂元梓（北大的教师）和蒯大富（清华的学生领袖）。

10月份，运动在全国铺开；除了大学里有100多个红卫兵组织外，红卫兵还与持同情态度的年轻工人建立了联系。11月，成立了一个协调造反派的司令部，并在上海的数百家工厂中建立了分部。

然而，市政府本身也同时组织了有革命名称的群众团体，它们暗中得到旧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支持。当第二次会见市府领导的要求被拒绝后，造反派便派出了一个大型的代表团到北京，向文化革命的领导集团汇报形势去

了。但他们坐的火车却在离城市几英里的地方拐进了一个叉道，被铁路工人甩在那里了。造反派的反应是强烈的，由此而导致的混乱状态已不容忽视了。11月中旬，在造反派的要求下，张春桥到了上海，他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和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他设法从市长那里得到的许诺，在他一离开上海便被忘到九霄云外了。于是，造反派便试图通过新闻界动员舆论，以加强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地位。他们希望在较大型的报纸上为自己开辟专栏，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一场抗议示威引来了保守分子组织的反示威。这一冲突使武斗又爆发了，导致几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报纸的办公室和印刷厂被造反派接管。很清楚，北京会再次干涉，把两派隔离开。

张春桥在12月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能够向他的追随者们表态了，因为北京已经发出了信号，文化革命要从学校扩展到工厂，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农村去。造反派希望在一份大型报纸上开辟专栏的要求得到了批准；12月24日，市长公开做了检讨。

张春桥在局势再次恶化时并没有退缩。现在，保守派们认识到，这是一次性命交关的斗争，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行动。许多工人被允许走上街头，进行反示威。一个大型团体得到了钱，购买去北京的车票，这样，他们就能进行一次群众抗议了。火车停开，还有断电、断水的威胁，在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罢工。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双方的力量几乎相等，每一派都拥有50万到100万左右的成员。

新年伊始，上海市的危机似乎到了要爆发内战的地步。上海的“一月风暴”（这一事件将成为举国皆知的事

件）在1967年第一个星期使这个城市的公共生活陷于瘫痪，流血冲突不断发生。北京被迫进行了第三次干预，但这一次，斗争不得不最后见分晓了。

1月初，张春桥第三次回到了上海。造反派的总部之间建立了联系，另外10个组织接管了上海两家最大的报纸，他们得到了"左派"记者的支持（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就曾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告人民书发表了，它要求人们回去工作，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十六条》精神，把革命与生产结合在一起。1月9日，造反派与其他21个组织联合在一起，第二天，向所有的人发出了《紧急通告》，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提出了10条倡议。1月11日，造反派接管了所有的关键设施，使一切都再次动了起来。中央委员会、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即政府）在一封公开信中对这种首创精神表示了赞扬。事实上，这封信对这场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月14日，规模不断扩大的造反派联盟终于接管了市政府。

在随后的几周里，这个新行政机构的权力逐渐得到了巩固。许多实际问题都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但同时最大的注意力不得不放在如何巩固毛派分子利益这个理论问题上。除了有必要在行政机构中换人马之外，谁都不认为应当把旧的党组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个系统也已无法正常运转了，因此，便开展了一场公开的讨论。于是，便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寻找一种能保证效率和恰当行政管理的楷模。这并不是一种新奇的现象，这场文化革命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强烈的历史感。

上海公社

1966年3月，大约在上海革命和彭真垮台前一年，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95周年。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现在，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科学家、记者一起，正埋头研究历史上在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9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然而，维护公社原则的问题，在巩固权力的阶段却不再提了。1967年2月3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另一篇

赞扬公社原则的文章。过了两天，上海的革命组织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之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公社"便声称其代表 100 万人了。但是，它也象它巴黎的前辈一样，是短命的。

九、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军队介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与此同时，在其他省份发生了一系列“革命”。从1月中旬到2月中旬，29个行政区中，至少有14个出现了夺权的企图。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派分子的分歧太多，过于软弱，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太没经验，以致无法战胜既成的官僚机构。上海公社的激进榜样似乎不易被其他地方借鉴。倘若运动想在全国范围站住脚，就得寻找一个适当的模式。在另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东北的黑龙江省，第一次出现了机会。在上海夺权后几天，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的红色造反派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接管了当地的党报、电台和公安局。省委第一书记（不久前他刚做过公开检讨）和军区司令几乎立即与他们接了头，讨论成立一个新的、联合的、临时性的政权机构。这项计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武斗了几周后，终于由军队加以干预，结束了武斗，“革命委员会”也终于在1月31日成立了。在这个框架中，造反派和旧的党干部一起工作，军事当局是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环节。常委会由一名造反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军代表组成，另一名军代表是主任。黑龙江的夺权模式（即所谓的“三结合”），比上海的模式多几条优点。事情似乎不易失去控制，出现意外

的危险也要小得多。与此同时，军队能够防止运动陷于停滞状态。于是，军队既扮演着促进的角色，也扮演着保护的角色。它可以防止对立的革命团体间发生流血冲突，保证经济合理地运转——在前几个月中，经济已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关键的生产单位（如大工厂）、运输单位（水运、空运和铁路）以及分配单位（如商店）处于公安部（即警方）和地方军队的控制之下。它们协调行动。从1966年底以来对红卫兵进行的军事和政治指导中，可以看出军队对运动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军队已经使地方的新闻媒介（报纸的印刷厂、电台）牢牢地掌握在"左派"手中了。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一项提议，文化革命的领导班子在1月底指示军队公开地、积极地支持"左派"。军队不得不支持造反派，但同时又要做造反派和现存的党政机关中"好"干部之间的桥梁。因此，人们希望军队能使政权的接管容易一些，并促使运动的这一阶段结束。

文革结束了吗？

2月的最后几周中，运动组织工作的下一步格局已经看得更清楚了。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将成为遍及全国的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在成立革委会的过程中，造反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军队暂时负起了大部分责任，而只有部分党的老干部被罢官。

就连上海也要按着这种全国的模式办事，以免成为例外。第一个学习上海榜样的山西省现在也按黑龙江模式办了。当2月26日和27日上海市又闹起分裂时，让这个城

市的组织形式与全国各地一致起来的机会到了。工人代表激烈地批评了某些学生和学校代表所使用的方法。从2月28日起，成立革委会的讨论开始了，革委会将由9名造反派、8名党的老干部和6名军队代表组成。公社偃旗息鼓了。

在曾发生过夺权事件的14个行政单位中，只有少数单位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文化革命领导层认为它们够得上左派标准，可以保留在革委会中。3月中旬之前，现有的29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5个成立了革委会——除了黑龙江、山西和上海之外，还有山东和贵州。到4月中旬，北京就可以使这个名单加长了。在运动进一步发展之前，相当一批省军区的司令员已开始加强他们对运动的控制。在直辖市天津和靠近苏联、印度、印度支那、香港和台湾这样的战略地区，情况尤其是这样。由于造反派和党的干部总是合不来，春天时，权力开始渐渐转移到了军代表手中。面对这种局势，文化革命领导层试图通过两种方法使运动继续发展。它不断向军事当局呼吁，要策略地对待对手，不要剥夺人民的自由，不要使用武力。从2月中旬起，毛泽东发出了几项指示，意图是使造反派中的"极端分子"和党干部中的"不可救药的人"信誉扫地，并建立一种团结感，使普通公民，无论老少，都团结在一起。

从3月初起，为了加速恢复正常秩序，采取了几项措施。月初的几天里，小学生和中学生被要求返校复课。第一周结束时，要求农民抓紧春耕，以便不使收成受到威胁。到3月中旬，要求工厂的工人把停转的机器开动起来，恢复生产。凡是有必要的地方，都派去了军人帮助恢复生产，把耽搁的时间补回来。一切都使人感到，文化大

革命的冲突阶段行将结束，社会生活回到了常轨。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十、清除右的和左的反对派

“左派”方面的问题

1967年3月中旬，文革运动的中央领导层召集了一次重要会议。当时，这一领导层由四类人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代表，其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为副主席（林在这批人中所起的作用比他在下一批人中要小得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主席为毛泽东，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占有重要地位；国务院的代表，包括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一批副总理；中央文革的代表，组长为陈伯达，副组长江青。

这次会议最终促成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胜利似乎已经在望：北京的那些“冥顽不化的修正主义分子”已差不多被彻底击垮，汹涌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其他省市的“修正主义头目”了。在军队最高领导层中，要求恢复林彪的前任——彭德怀的名誉的呼声已经平息，而林彪的冤家对头——总参谋长罗瑞卿已被杨成武顶替。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已解散，作为毛泽东主义领导核心的新文革小组已工作了半年多。另外，中央政府中的文化部门已基本清除了“保皇派”（如陆定一部长），整整一代年轻的新“左派”占据了要职。

在党和政府部门（两者密切相关）中，被罢官的不止彭真等人，还包括最高领导层中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左派"在较低一级的领导层中也节节取胜。群众运动从学生发展到工人和农民，而在一些地区，革命已经以"左派"成功地接管权力而告成功。由于军队已坚决地转向"左派"，一切似乎大局已定。全国江山一片红已指日可待——除非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情况仍然很复杂，而且，这种复杂性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与人们所预料的不同，问题并非出自"右派"势力的复活。实际上，正是"左派"内部的严重问题使局势有利于"右派"，使文革运动未能圆满结束。

从运动一开始，这些问题就有某种自相矛盾的性质。被一大批新近提拔上来的人占据了要职的宣传机构倾向于把错宗复杂的事情化为简单醒目的口号。他们发现，过分热情的学生是自己的忠实听众。当时，工人和农民这支主力军正在加入文革运动，而这些学生并不心甘情愿地做的是：把文革运动的先锋队这一激动人心的位置让给别人。

这种宣传导致了分裂。陶铸在六个月前接替陆定一掌管宣传。他本人的情形代表了一种奇怪的榜样。过去，他并不非常"革命"；他曾在中南地区领导一块"独立王国"，是一位典型的党的官僚。是邓小平把他调到了北京。在1967年中，陶铸成了"使右派大为得利的极左派"这种自相矛盾的代表。其后，当"极左派"遭到彻底批判时，极左分子姚文元评论说他——

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

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①

到新的一年开始之时，正是陶铸的讲话，使很多“革命行动”徒劳无功。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种观点，会逃过这派或那派极端分子的批判，就是毛派左翼和毛泽东本人也未幸免。看来，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是，文革运动会全然迷失方向，从而使“右派”能在新左派面目的“伪装”下发起全面进攻。不加选择地攻击所有东西和每一个人，使公众和党的干部对运动产生敌视情绪，从而使结合与最终接管政权更加困难。各派组织越来越分化，数量越来越多，以致常常因为力量太弱而不能在推动革命中起什么重大作用，反而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各派的争斗上，派系武斗和粗暴的突然袭击（如绑架和“公审”重要领导人）导致了不断的流血事件。

1967年1月，陶铸被解职，随后，第一次开始呼吁运动要有节制。一些组织因而受到镇压，其他组织的活动也受到限制。一批老干部受到公安部门的保护，同时，只有在与文革领导层磋商后才能举行群众批判大会。

2月里，领导层中某些人显然是想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为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名誉。但是，在3月举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极左分子”陶铸受到了批判，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他的行为所引起的“右倾回潮”——其重要代表为谭震林（掌管农业）和薄一波（负

① 中略。——译者

责工业），他们被指控只是表面上在批判一些过分之举——象彭德怀在大跃进中所作的那样，实际是想否定整个运动。

1967年3月的全国形势

权力结构中的新人驾驭这场变革的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在文革领导小组中，较老的领导人（陈伯达，江青，康生）由于大量“无产阶级新鲜血液”（多为文人学者）的输入而得到加强。这其中有上海派（张春桥——其人已不太年轻——和姚文元），还有北京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前两者与江青关系密切，而后三者与陈伯达和《红旗》的关系更为紧密，如同林杰和穆欣——这两人不如他们有名，却是最先与极左派发生广泛联系的人物。事实上，领导小组中后面这五个人对北京的所有最重要宣传机构和新闻报纸施加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从这时起，另一个起了更加重大作用的结合体是军队。军队自1966年7、8月份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已经历了相当的变化。同运动的整体发展趋势一样，军队领导层中权力的平衡已倾向于“左派”。当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于10月与毛泽东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除了林彪和其最亲密的同事外，还有肖华（总政主任）和杨成武（总参谋长）。位于其后的是来自其他军事机构的两位人物：叶剑英（监察）和谢富治（公安）。这两个机构仍有相当的独立性并与政府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1966年10月4日中央军委新发布的命令中，总政的刘志坚独自加进了一段话，声

称军队应避免介入非军事问题，而那时正是军队自身开始投入文革运动的时候。刘志坚此举使自己丧失了威信。到1966年底，刘志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对罗瑞卿的折磨迫害看来也从未中止。12月底，罗瑞卿被数所军事院校的学生突然绑走，并遭到拷问和折磨。直到次年1月和2月初对方才采取限制措施以防这类事件重演。

与此同时，允许军队参与文化革命的决议通过，军队本身也在进行相当程度的重新组合。最初的军队文革小组因受保守势力的影响太大而被解散。现在，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将直接取决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所起的作用将更为重要（恰在一年前，江青受林彪之托组织了文艺在军队中的作用的讨论会）。同样，军队和党的宣传机构中一些年轻极左分子的作用也加强了。实际上，总政治部和林彪自己的军委包揽了宣传领域的大部分权力。同时，形式上独立的公安部这一全国警察机构被废除，其各个部门被并入军队。

然而，军队的介入存在着很多自身问题。这一新任务主要落在了地方部队身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央部队要时刻警惕美国（和缓慢发展的苏联）的战争威胁；其次，各军区、地方和卫戍部队在“平时”介入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这也意味着地方部队早已与旧有的党领导和衷共济了。这样，不久之后情形便变得很明显了：很多省市中的军队领导在支持“守旧的”党领导并与造反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军队的中央领导发布的命令未能扭转这种情形，而到了3月底4月初，很多省区中的形势显然是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央于4月6日发布了数条命令，撤换了一大批地方部队的领导。但

是，这对缓和各省军队中保守的高级干部与红卫兵极端分子之间的紧张冲突未起任何作用。这种情形酿就了 1967 年“炎热漫长的夏天”之后的一场冲突，而其中一次事件险些使国家卷入全面内战。

第四章

革命中的革命

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

毛泽东，1957年2月，引自《毛主席语录》

十一、继续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与此同时，首都的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大中学生的政治团体组合成了三个联络中心，其联络站遍布全国。这就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红卫兵司令部，它们分别代表三种主要政治倾向——最早的“保皇派”，从“保皇派”以及造反派中分离出来的一派，最初的造反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具有极左倾向的人从左翼和右翼分离出来，这既是因为他们对右翼的妥协深感不满，也是由于他们造反的劲头过于高涨。在中央文革呼吁联合之后，三个司令部重新合并为一个组织。“第三司令部”（造反派）在这次联合中起了带头作用，不过，新组织中很快便又形成了左翼和右翼。

当有人在 1966 年至 1967 年冬季开始鼓吹“怀疑一切事、一切人”的观点时，激进派和极左派的情况显得相当混乱。人们对这一观点的反应各不相同：右翼的“联动”适时地采取了一些“最革命”的行动，如冲击公安部；学部的左翼红卫兵（与中央文革中的少壮派有联系）趁机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材料中搜集可以用来指控主要领导人的东西；左翼的“三司”（以蒯大富的“井冈山”造反团为首）忙于对真正或想象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新的批斗运动。

截至 12 月底，中央领导人中几乎无一能够幸免。周恩

来、林彪、江青和陈伯达都成了批判对象。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极左分子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最易招致批判的部长遭到绑架并被押至群众大会的人民法庭受审。在这之中，一些"被告"受到了严刑拷打，甚至就此永无音讯。在这种情形下，于1月底介入的军队也未能防止2月份的右翼反攻。不过，一些领导人在3月里被清除的事件又一次使激进派和极左分子颇受鼓舞。分裂情绪严重的团体和独立的联络站遭到镇压，大批判的对象被局限于那些已知犯过严重错误的领导人身上。但是，这种批判的方式完全可以使攻击的对象间接地转向他人。例如，对副总理们的全面批判具有很明确的目的，即为了使周恩来进退维谷。反对他的匿名大字报越来越多。

周恩来与激进派和极左分子的对立由来已久。他在年初阻止了仿照上海的"北京公社"的成立。国务院所发布的一项通知实质上是说，首都新政权的建立牵涉到各种国家利益，所以这项工作不能托付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周恩来亲自负责组织了各代表大会，它们和政府一起，为后来在北京建立稳定的行政机构奠定了基础。1月和2月里，周恩来成功地使分裂的学生组织合并到一起。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代表推举了他们的代言人，其中有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和蒯大富。其他各代表大会于3月底召开，它们包括2500名来自13个郊区县的农民、矿工和产业工人。最后，也是最难召开的是中小学生代表大会。由这些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终于4月底成立。革委会主任是负责公安的谢富治。聂元梓被选为副主任。

党决定继续进行文化革命

近数个月中观念的混乱使人们对形势的起伏反复莫衷一是。一般说来，右派和极左派思潮仍被视为同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体现，因而对革命有害。然而，以这种方法批判某一个人，如陶铸，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批判文革的全体“新左派”就难了。有人担忧这很可能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1966 年 8 至 9 月间的极左行为可以说多出于真诚无知，但 12 月至来年 1 月间的过激风潮却更加严重。在此之后，官方进行了纠偏。毛泽东所写的有利于这种纠偏的文章，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年)，被用来作为反对极左的理论依据。

但是，这种理论上划清界线的实际效果很有限。只有那些明显具有右翼思想根源的极左派组织才被解散，而那些本质上是造反的组织仍保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虽然，据说就连陈伯达也不得不在 1966 年底做了自我批评)。“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由党的干部子女组成）这类组织的被取缔，为纠正“错误思想”奠定了基础，从此开始了对下列错误思潮的批判：自由主义和过于民主（只要它反对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它反对 2 月份成立的“上海公社”)；自发性和主观性（指 1 月份北京发生的暴力行为)；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先验论（1967 年 4 月 24 日的《人民日报》说：“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和阶级分析，而不是宁‘左’勿右。”)；纪律涣散，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陈伯达在 1967 年 2 月 5 日说：“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在

中学里很严重。有些学校里每个人自成一派，三个人就可以自己联合。")；宗派主义，分裂和派系斗争（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认为：很多党的领导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搞宗派主义"），党的领导人如此，造反派更是如此；一般性的左倾，它把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当作与敌人的对抗性矛盾（在革命委员会中，造反派拒绝与"改造好的"原党干部共事就是一例）。

这一历时长久的批判运动清楚地显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4月间，中央决定不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结束文化革命，这一时机显然还未成熟。在革命的发展中，利用混乱局面获取非分影响的右翼和极左派组织比比皆是。全国范围内新的行政机构建立之前，人民大众首先不得不自己辨别良莠。这样，各省革命委员会不断宣告成立之风终于在4月底停了下来，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重新开始，而且变得谨慎起来。

文革领导层看来一致同意使运动延续下去的决定，尽管这种一致性多半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林彪和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在这段时期可以应付裕如，趁机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周恩来和其支持者担心，硬要结束这种局面只能导致行政机能更加紊乱。江青、陈伯达二人视此为重组他们四分五裂的随从的一次机会。此外，王、关、戚三人帮以及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年轻成员认为已经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应该重组，希望借此时机讨论这一问题。

这样，局势仍然混沌不清：在领导层表面一致之下，激进派象极左派一样忙于打倒被他们视为右翼的中间派。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与"极左"思想划清了界线，实际仍在抓紧一切时机强化他们的宣传，同时又使人看起来并不违背

现行政策。他们在北京的"天然"追随者正在重新组合，这也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种组合是在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之后开始的。同时，领导层中激进派的影响正在加强。这样，在各报纪念劳动节时，文革小组中的北京派在党的领导层中位置比以前升高了。当中间派的工人游行反对左翼挑起的内部暴力行动、《人民日报》也再次呼吁采用非暴力手段时，激进派则在纪念文革初期的革命事件，进一步批判国内外已被批倒的"修正主义分子"，通过与此相关的"发人深省"的问题来动员人民大众。1967年5月18日——林彪发表"左"的讲话的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最初的目的是推动运动发展，现在发表也是为同一目的)。极左派的愤怒继续发泄在刘少奇身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于1939年，鼓励党员实行孔夫子式的自我修养) 内有整整一章抨击了左倾教条主义，其中的一些字句使他成为显而易见的批判目标。

在这一年中，文化革命从反对一个集团 (彭真集团) 进一步发展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刘少奇被指控为搞资本主义复辟)"。

清除彭真及其同事的运动持续了四个月，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其追随者的斗争同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走上"正轨"。

其实，刘少奇在社教运动和文革前期已经受到了批评，不过，只是在1966年7月解散工作组时，他的命运之星才真正开始陨落。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降职。10月份，中央委员会内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10月23日，他做了第一次检讨。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各种极左分

了紧紧抓住此事不放。蒯大富要求刘少奇到清华大学"群众中"做自我解释。他在刘少奇和王光美居住的中南海门口组织了静坐示威。1966年12月25日，刘少奇做了比第一次更加深刻的检讨，但仍被认为不彻底。蒯大富重提他的要求，而周恩来提出，只有遵守明确的条件才能准许这一要求。这时，蒯大富利用刘少奇的女儿（那时正在与她以前扮演的保皇派领导的角色划清界线），让女儿把母亲引出了中南海，随后绑架到清华大学。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蒯大富保证国家主席夫人不会受到虐待。但是，其后举行的群众大会组织得非常糟糕，计划中的会上批判和检讨收效甚微。

在"一月风暴"之后一片骚乱的两个月中，刘少奇的问题多少被搁置在一旁了。但是，到了春天，批判刘少奇的运动再次势如潮涌。4月初，清华召开了20万人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大有改善，但没有象温和派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使气氛缓和下来，反而成为运动中一连串新的过激行动的前奏。促成这种倾向的还有文革小组中北京派的一些年轻激进派，他们现在对此事大为关切。《红旗》杂志上也展开了这方面的辩论，而《人民日报》则刊出越来越多的煽动性文章，使事态更加混乱。5月里，公众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愤怒愈加强烈，致使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大胆地要求把刘少奇交出来。在蒯大富的造反派和"三司"内外数百个组织的支持下，刘少奇的住所外又举行了一次新的静坐示威。这次，静坐者最终得到了文革小组中北京派的鼓励。一些示威者举行绝食来使抗议更加严厉。越来越动乱不安的示威最后发展成为某种活动中心，而刘少奇的两份新的书面检讨又未通过。武汉发生

的反对北京的激进代表的叛乱，使情绪变得更加激昂（见下文）。8月1日，报纸登出了林彪宣扬人民战争威力无穷的文章。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市中心集会庆祝建军节时，静坐示威者们断定：发布一道最后通牒的时机到了。他们勒令刘少奇于8月5日（这天是他被降职和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的周年纪念日）前出来见他们，否则将采取行动。蒯大富与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和林杰举行了紧张的秘密会谈。8月4日晚，成千上万人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文革的领导人发现，同意示威者的要求肯定会有发生私刑拷打事件的危险，而拒绝示威者的要求也同样无法做到。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结果是，8月5日中午在中南海举行了又一次批斗与检讨大会。只有经过限定的一批人被准许实地参加批判会，其他的示威者从大喇叭里收听大会实况。除此之外，周恩来、江青和陈伯达也在高高的讲台上就座，以此作为某种形式的保证而使鼓动者们在会后平静散去。同时，一支人数众多的保卫部队在现场警戒——后来的材料证实，这一措施并非多余。威廉·亨顿描述了这一特别的集会：

> 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从不知道，一小批极左的造反派已准备好，如果周恩来在会上露面，便借这次前所未有的示威活动把他抓住扣押起来。这些人的推断是，如果示威的规模足够大，大会的时间拖得足够长，周恩来就不得不出来平息气氛，这时，武装的红卫兵战斗队便可抓住他。在其后的混乱局势中，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多半是指陈伯达——就可以接管更多的权力。

如此说来，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中，矛盾也绝不是非对抗性的……

十三、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政府中的修正主义分子

批判陈毅

一段时期内，对主要领导人（特别是负责财政、经济和技术的部长们）的攻击有所缓和，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除了重复对刘少奇的批判之外找不到什么其他事可干。但是，有一个领域是左翼可以不受阻挠地继续采取行动的战场，这就是外交领域。任何人都不能对反对修正主义、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异议。归根结蒂，文革的主要对象不正是这些人吗？斗争对象的转移也使激进派反对中间温和派的力量有所增强。

外交部内的问题在文革早期就一直颇为棘手。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最初就犯了一个"错误"：他按照刘少奇的方式，在开始造反的各部门中派去了工作组。虽然他确曾在1966年8月的中央会议上承认了"错误"，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反对陈毅的政策的人于1966年秋季重又集结起来。此外，陈毅本人也是一个大批判的绝好目标。然而，尽管陈毅的历史问题很易招致攻击，这个坚定的不妥协派仍敢不断地取笑批判他的人中的狂热分子，甚至在他的批判大会上还敢这样做。有一次，他问外交部的造反派，为什么

“他们不去越南”闹革命——这句话在一般人看来问得别有用心，这可真把造反派惹火了。陈毅对他的反对者热衷于组织宗派的倾向尤为不满，他认为：

> 外语学院分裂为两派。最初有 21 个组织，一个星期之后超过了 50 个，再过一个星期便超过了 70 个。70 多个组织中的 4000 多人又组成了 70 多个派别。大海浩瀚无边——这可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最后，他向造反派提出了这样的挑战：“我今年快 66 岁了，我也不怕艰难困苦。别忘了，想下小本赚大钱的人是要倒霉的。”但是，不把批判他的人当回事的态度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不光应该做一番解释——文革中每个人都这样做了，而且在运动中还犯了“严重错误”。文革的领导除了同意开他的批判会之外，别无他法。1967 年 1 月 24 日，文化宫召开了万人大会。陈毅在他的上级、朋友周恩来以及陈伯达、江青、王力面前，宣读了检讨提纲。领导的意图是，这以后只在小规模的批判会上讨论陈毅的检讨就行了，但后来却未能如愿。不过，自 1 月底以来，陈毅完全有机会证明他的革命性。在列宁墓发生的一次事件之后，一批中国学生被苏联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激起了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前举行的一次狂暴的示威活动。柯西金召回了苏联大使馆中的妇女和儿童，并对反对“毛泽东专制政权”的人表示同情。这时，陈毅表面似乎与陈伯达的观点一致。陈伯达在不久前说，苏联的修正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十月革命后没有搞文化革命（尽管列宁和斯大林曾计划这样搞——陈伯达补充道）。然而，陈毅在 2 月份又一次

犯了“严重错误”。他宣称支持刘少奇，而他与刘少奇之间现在已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关系（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由于他们曾数次一同出访）。正因为如此，3月份再次兴起的革命运动也搞到了陈毅头上。4月1日，戚本禹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开始批判刘少奇。这篇文章数次赞扬了义和团运动，由此也详细讨论了外交政策，从而也迎合了红卫兵中的仇外情绪（作者后来否认他有这种意思）。这样，注意力再次集中到陈毅身上。陈毅的直接领导是周恩来，但4月中旬重新开始的对外交部长的批判却是陈伯达点头允许的。然而，造反派马上就抓住了这一让步，要求罢陈毅的官。这一要求超出了陈伯达明确限定的批判范围。对陈毅的批判还扩大到一些重要的副部长，如姬鹏飞（后暂时接替陈毅）和乔冠华（后接替姬鹏飞）。

最新发生的一次外交事件一时使造反派多了一条说明现行外交政策失败的证据，并使他们在反对这一政策的斗争中有了一位领头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印尼1965年9月的“流产政变”和其后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发生后早已破裂。这一关系在4月底恶化到了极点。印尼驱逐了中国代办和总领事。二人在回国时被当作真正的英雄而受到欢迎。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及一大批群众到机场迎接。第二天，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他们。后来，有人借此对陈毅的外交政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指责陈毅对印尼共产党和华侨受到血腥迫害一事袖手旁观。在其后的几个月中，造反派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他们攻占外交部大楼的一部分，这一事件就是一例（这次事件使国家机密公之于众。据说攻占大楼的一个造反派说：“机密有什么了不起，去它的吧！”）。唯一能凭自己的地位对这些最新事

件施加影响、进行调解的人是周恩来，但他那时正被指责搞“保护主义”，并未出面。

8月7日，冲突看来发展到了最后阶段。王力——他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表示，应公开地从陈毅手中夺权，并暗示说，周恩来也没什么可怕的，即使是周也不是打不倒的。这时，陈毅的斗志看来仍未消沉。社会上流行着很多关于他的传闻。琼·鲁宾逊写道：

> 陈毅坐在台子上面，戴着高帽接受批判。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表说，对不起，我得去机场迎接几内亚总统了。要不，他就翻开毛主席语录，用大家常用的方式拖长调子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虽然如此，陈毅是在孤军奋战，很快便开始抵挡不住了。8月11日举行了另一次万人群众大会。陈毅在周恩来的监护下，面对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做了检讨。周恩来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说陈毅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对这些错误的批判必须公正客观。然而，现在的形势已经与六个月前大不相同了，参加大会的极左派人数众多，对胜利的渴望使他们热血沸腾。在陈毅被叫到台前讲话后不久，会场内便发生了打斗，后来召来了军队进行干预。在这场骚乱中，一个强壮的年轻人跳到主席台上，打了陈毅一个重重的耳光。在保卫人员抓住他的时候，陈毅被带下了主席台。周恩来愤怒地走到话筒前对与会的人指责这种行径。过了一段时间，动乱平息下去，大会得以继续进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造反派将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火烧英国代办处；

周恩来出面干预

由于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自6月以后越来越坏。北京的外交工作受到破坏。所有的大使都被召回接受“再教育”（除了驻开罗大使，多半是“六月战争”的缘故）。外交人员的生活和思想作风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有一部分是属实的。现在，造反派开始把很多驻外使馆当作宣传站（这是针对陈毅的一句话，陈毅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确实是中国的产物，我们不应该把它们拿到外国去。”），在政治上扶植、鼓励友好团体和华侨，并把外国驻华使馆当作游行示威的打击对象。这些行为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外交地位不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王力仍坚持在外交领域实行强硬路线。斗争了反动派（印尼的军政府）后，又轮到了修正主义分子。苏联大使馆前的示威在8月17日导致严重事件的发生。帝国主义者也未能逃脱。英国在香港对文革的同情者采取行动，关闭一批亲北京的报馆，这事惹怒了造反派。王力向英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必须于20日前停止这些行动，否则……。这种威胁当然使周恩来和陈毅焦虑不安：发出最后通牒就要准备执行，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21日和22日过去了。王力开始通过新闻界动员公众舆论，并开始召集示威者到英国代办处举行抗议。

到了23日晚上9点，还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件。起

初，这次示威看来只不过是前几次示威的重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外国使馆（如缅甸使馆）常被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连续围困达数天之久。周恩来对形势很担心，便和江青前去告诫示威者，提醒他们：外国使馆的领地权一定要受到尊重。周恩来的干预无济于事。一位红卫兵回忆道：

实际上，那些想要推翻总理的人早就计划好要冲进去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头目拿着扩音器高声喊叫着冲上去。前面的一些人跳起来向大楼的墙上和窗户上投掷墨水瓶。这是一次佯攻。当正门这边墨水横飞的时候，一些人从后面进到了楼内。他们开始从窗户向外扔椅子和沙发。我们身后的高音喇叭催着我们向前拥。我们向解放军的防卫线挤去，一边喊着："往后！让我们进去！那边的人已经进去了！"解放军站了八排人墙。一些年轻人想从他们头上越过去，但被拖了下来。士兵的人墙最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从那儿冲进去，开始翻墙。一些人被解放军拉了下来，但其他人翻过去了。

11点时我们看到起火了。先是车库的油桶着了，随后大门被打开。汽车开始烧起来。三辆使馆的小汽车被烧。救火车开来了，可是消防队员被武装的群众挡住了，只好回去。火越烧越大，救火车又回来了，来了好多辆。消防队员从人堆里挤向小楼。大约在起火的时候，周恩来和江青给我们所有人送来了一道命令，让我们停止冲击，可是命令没有广播。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知道以后我们马上就撤离了这个地方，可是已经太晚了，我们都觉得很不好。

当解放军的防线被冲开时，英国人跑进地下室锁上了门。但是，人们冲进去把他们拉了出来。警察上来干预，并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可是就这样，我们中的一些人在他们过马路时还要扒他们的衣服。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周恩来再也不能犹豫了。他开始直接领导外交部的工作。王力不久便被免职并被逮捕。周恩来这样做冒了相当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支持了他。毛泽东说："王力近 40 天中犯的错误比陈毅 40 年犯的错误还严重。"不过，对外交部的批判继续象往常一样进行。8 月 27 日召开了另一次批判大会。周恩来没有到会，而让陈伯达代替他出席。此外，康生明确表示，批判陈毅的外交政策就等于批判中央委员会——政策确实是它制定的。这样，虽然外交部内的论争一直持续到 1968 年，但陈毅自 1967 年 10 月 1 日起便再次象以往一样被称为外交部长了。

尽管如此，陈毅个人在这段时期所受的折磨却比他在解放前还要大。他的体重减轻了许多，身体状况非常差，以致毛泽东后来申斥造反派说："他这种样子使我没法带他接见外宾！"陈毅的精神状态也很消沉，只有毛泽东才能劝动他参加九大。主席对他开玩笑说："你怎么也得参加，你可以作为右派的代表嘛！"不过，健康状况已使陈毅无法象以前一样工作了。他只再活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他死前得以目睹左派极端分子自食其恶果，他也亲眼见到中国打破外交孤立的开端——他与周恩来自万隆会议以来为了这个目标奋斗至今。他于 1972 年 1 月死于癌症——通告中

明确了这一点。

十三、斗争军内修正主义分子

"武 汉 兵 变"

"新左派"在北京的煽动和蛊惑，迅速加剧了上层领导与基层组织的分歧，而外省市形势的发展却最终使国家在1967年炎热漫长的夏天面临内战的威胁。在各省中，军队介入的工作落到了地方部队身上，比起中央直属的军队，它们远不适于扮演这一角色。"真正的"造反派在夺权的斗争中，这些部队不与之合作，而常常与"表面上的左派、实际上的右派"官僚达成妥协。根据"三结合"的原则联合各派的作法在很多地方都失败了，并导致各派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

自4月底开始，中央停止了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通过领导机构的一些变动来加强对有相当程度独立性的大军区领导人的控制。同时，特别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军队介入的必要性愈发明显。必须捍卫国家的基本利益。1967年春季和夏初军委发布的一系列命令表明，整个局势变得极为混乱；到了7月，形势已经一触即发了。在陶铸以前的"独立王国"——中南地区，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军队与党的老干部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这一地区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主要包括广东（省会广州）、湖南（省会长沙）和湖北（省会武汉）。动乱的中心首先集

中在广州和武汉这两个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的城市。广州与香港澳门相邻，武汉是东西航运（长江）和南北交通干线（长江中游的唯一一座桥梁在武汉）的枢纽。此外，武汉还是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之一，特别是钢铁工业。

武汉的派系斗争发展得越来越激烈。5月和6月的冲突中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上千人被捕。在长江大桥那里发生的武斗一度中断铁路和公路交通达数日之久，北京再也不能容忍事态这样过久地发展下去了。7月，北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调查事态。代表团由北航红卫兵，空军政治部主任余立金，陈伯达的代表王力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组成。调查组的主要任务是辨明两个敌对群众组织联盟即“百万雄师”和人数较少一些的“三司”，谁是“真正的左派”。前者受到王任重的前党的领导机构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支持，后者与已被军区司令解散的造反派司令部“工人总部”有联系。调查组与所有有关各派进行了会谈，但是，后来的报道说，激进派不久便开始倾向于“三司”，从而导致更加激烈的示威游行和更多的死伤。在调查组宣布结论时，事态并没有平息下去。托马斯·鲁宾逊概述了下面的经过：

> 到了19日，谢富治和王力的所见所闻显然已足以使他们做出某些结论了。看来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报告并授权他们向两派当众宣读这一裁决。在与造反派组织碰头后，调查组晚上在军区司令部召开了这一地区所有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报告的主要精神基本与周恩来早些时候所做的四点声明一样：军区犯了错误，“百万雄师”确是保守组织，“工总”案件必须平反，

"三司"应被当作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这时，*8201*部队司令牛怀龙被激怒了。他跳起来反对四点声明，一边喊着"我准备好牺牲生命"一边愤然退场。牛怀龙与陈再道及中共武汉东湖区委一起组织他的部队和一大批"百万雄师"，前往谢富治和王力返回的东湖宾馆，并不顾一排忠于中央的*8199*部队士兵的守卫，从晚上9点开始，围困宾馆大楼。到了20日清晨（大约*1*点），整个地区已被封锁，*8201*部队在街上巡逻并在房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这时，陈再道到了宾馆，对谢富治和王力说他自己已控制不了这些工人，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了，他们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这之后，谢富治和王力看来是要和工人们理论一番，但工人们和牛怀龙的部队一起冲进了宾馆，撞开这两个人住的房间（制服了北航的保镖，并据说把谢富治的私人秘书刺死），将谢富治和王力分隔开，并开始对王力拳打脚踢。

在市内，"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们撤换了军区司令部的原警卫部队，封锁了街区，中断了长江和汉水河上的交通（使武汉三镇的反对派彼此隔绝），占领了火车站、电台和机场，并在全城构筑了据点。工人组织进而四处袭击红卫兵，放火烧学校，打死和伤害那些敢于反对他们的人。

20日清晨，"武汉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总参谋长杨成武命令陈再道保证北京代表团的人身安全，并要他亲自陪同他们返京。林彪亲自飞往武汉，向作为调查组一员而已在武汉的余立金和空军副司令刘丰下达命令。周恩来也

飞往武汉，但由于机场被围困而未能降落。

随后，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伞兵部队空投到城里，增援红卫兵并控制长江大桥；同时，野战军开进城，控制战略要地。他们在控制了当地的报纸电台后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向“反叛者”占据的地区散发了大批传单。中央领导告诉“反叛者”：你们受了反毛泽东主义分子的蒙蔽。王力看来说服了卫兵，让他得以逃走。他和谢富治在机场得到保护，并从那里开始组织反击。

几天之后，城市的局势再次得到控制（只有领导人被拘留，追随者则被要求从蒙蔽中觉醒过来），不过，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武汉才恢复了正常生活。

“揪一小撮”运动

同时，在江青的陪同下，王力和谢富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成百万人的欢迎。林彪也参加了集会。王力马上努力利用刚获得的政治资本，把它变成“左派”宣传运动的讲台。他手下的宣传人员把他“光荣凯旋”拍成了电影。电影中，王力成了“领袖人物”。对各省的造反派来说，电影是在表示“北京支持你”。中央领导中的激进派，尤其是掌握了绝大部分舆论工具的文革小组北京派，也把武汉事件作为起点，开始发动一场支持反对大军区领导人的斗争，并要“全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左翼支持这一斗争。王力告诉蒯大富说：“眼下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揪出篡夺了军权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蒯大富马上便动员了他的全国联络站来进行这场揪一

小撮的运动。各省中的通讯员一段时间内不断报告造反派与地方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这时，北京的激进派建立了一个军事情报站，为此派出了2000名学生并散发了200本《搜集军事情报手册》，建立了50个联络站。各种情报源源而来，包括大军区领导的组成及其背景，以及部队在有关地区执行的军事任务。调查人员如果在获取情报时遇到麻烦，就抬出蒯大富的名字，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抬出陈伯达的文革小组中王、关、戚的名字。随着其他红卫兵组织加入这一运动，一个总指挥部在清华大学建立起来，内有军用地图和分类档案，可以协调各地的反地方军队领导人的斗争。中央文革中的激进派（王、关、戚和林杰、穆欣）向全国发出了口号："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了7月底，这一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里。8月1日，《红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都刊登了林彪发表的与此直接"相关"的语录，为这一运动增加了权威性。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重新发表了这篇大字报，对这篇大字报的解释远比最初发表时具体得多，为的是使这一运动更成为官方的运动。由此掀起了对已被打倒的军内修正主义分子更加激烈的攻击。

虽然林彪从未公开参与这一运动，但他确实给人留下了同情这一运动的印象。例如，8月9日到11日，他曾讲到武汉事件从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反对地方军队领导的造反派并不一定全都是真正的毛派。所有大军区领导人（已经全被召到北京）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粗暴地对待造反派：

一定要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千万不能认为你理解了，不需要向中央报告了；千万不能认为情况很清楚，你可以自己解决。千万不能认为你自己很聪明，不必请示报告。你们不必担心会给中央添麻烦。不管大事小事，每件事都必须请示报告。总理和文革小组的同志日夜都在工作……你们还可以飞来，几个小时就能到了。你们千万不能采取想当然的态度，认为自己能干，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干。[1]

林彪的踌躇态度事实上有利于揪一小撮运动的组织者。这一运动逐渐蔓延到了全国。红卫兵突击队闯进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住所搜寻罪证材料。蒯大富本人赶往南京。那里，数十万人聚集在军区司令部外面举行反对许世友的示威已持续了数天之久，直到他们攻占了军区司令部。福州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运动，反对军区司令韩先楚。这一运动受到了王力和戚本禹的支持，但最终被周恩来缓和了下来，当邻近的台湾宣传媒介也大肆鼓吹支持这一夺权运动时，示威便突然出人意料地中止了。在沈阳，反对和支持军区司令陈锡联的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斗。反对派的领袖是蒯大富的一个亲信，他们得到了关锋的支持。

在全国各地，示威者集结在军营外面高呼交出"修正主义指挥官"。造反派砸开了军火库，以此向军队施加更大的

[1] 据作者解释，这段引文摘自1967年9月13日的一份红卫兵出版物——译者

压力。虽然军队一般都采取了尽量克制的态度，流血事件还是越来越多。周恩来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说，文化革命的前半期有成千上万的解放军战士死去。江青后来说：

> 你们不应该那样对待军队。当你们抢走他们的枪时，一些战士流了泪。他们知道你们要抢他们的枪，但是他们不能向你们开枪，因为他们象你们一样，也是革命群众。如果我是一个战士，如果有人想抢走我的枪，我一定会自卫的。

林彪的举棋不定使他陷入窘境。广州的情况尤其如此。自1967年初起，这座城市的政治混乱情况比任何一个地方都糟。军队的介入引起的愤怒反应使左派的宣传鼓动更加激烈。贝内特和蒙塔波托引述红卫兵的话说：

> 我们实际上已经成功地夺取了政权，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革命。现在这帮坏蛋把它彻底抛弃了……我受到了恰恰是我曾经为之献身的政权的攻击和压制。看来他们利用了我，然后在觉得我没用的时候把我甩到了一边。我真痛苦万分……

在8月和9月，形势陷入了彻底混乱的状态：抢劫和暴力事件到处可见；不断的示威和对抗导致大批人死亡。此外，在9月里，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显然是在忙于占领战略要地，如广州车站，并在城市郊区和与香港交界处的农村建立游击队根据地，与其他目的相同的组织合作，以准备武装对抗当地的军队领导。广州秋季交易会不得不推迟

一个月。直到11月初，极端分子才被孤立起来，另外一些组织被联合起来，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以便使形势能够再次正常化。

对"揪一小撮"运动的反应

在这些事件的发展中，负责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领导层中一些激进分子居心不良。那些人组成了自己的宗派，有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很多方面与官方政策相冲突。造反派完全可以组织群众去清洗党组织，但只有党才可以进一步清洗军队。武装冲突此时已把全国推到了内战的边缘；文化革命非但没有被最近的运动推向前进，反而因这运动而倒退了。8月7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声明。它实质上是在说，决不允许挑起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对抗。8月11日，同一张报纸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禁止人们拥有枪支弹药（即使为了自卫也不行）和使用其他武器，如化学毒气等。这样，中央文革中的上海派再一次开始为运动定调子，而北京派的年轻激进分子显然已使自己名誉扫地。看来，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的联络组织，与"三司"的左翼分子和8月初在北京出现的所谓"5·16"组织建立的新极左派"第四司令部"有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几乎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为此，北京派的这种活动使它注定要退出文革舞台。

十四、五・一六运动的发端：极左派对周恩来的攻击

极左派的形成及其对周恩来的不满

要了解极左派为何发展到这一地步，只有再次回顾文革初期的运动发展。

1966年秋，中央领导号召大中学的学生将他们的"一司"、"二司"和"三司"联合成一个组织，当时，有两派人拒绝加入新成立的统一组织。这两派人中一派是彻底的保皇派，另一派是一些造反派，他们担心蒯大富领导下的"三司"（"一司"和"二司"已并入"三司"）左翼会开始丧失影响，从而使聂元梓领导的中间派得利。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领袖，聂元梓是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副教授。

未参加三个司令部合并的"真正的"极左造反派主要从全国性大学的学生和政府机构年轻干部中严格挑选其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担心，如果运动变得过于温和，政府中的"修正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部长）就会逃脱。换言之，后来掀起五・一六运动的那个组织，其成员大多来自专科院校，如经济学院、贸易学院、财政金融学院、钢铁学院、林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航空学院，特别是两个外语学院。很多政府部门的干部就是从这些学院毕业的。这些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与北京和外地的"普通"中等学校及大学，与政府和党中央几乎所有重要部门中的高级官员都

有联系。显然，这种力量的集合能够发展成为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组织。

在文化革命中，造反派可以取缔所在单位的原有党组织，掌握政工部门。因而在文革期间，各单位政工部门的权力增大了。这有利于造反派的夺权活动。结果，在一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中，决策权落到了造反派手中。如果不是一小批造反派的铁杆人物在运动一开始就百折不挠地想使各院校各派组织联合在一个统一纲领下的话，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五·一六运动的核心源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受陈伯达的影响极大，并早已深深地卷入了意识形态的论争中。1966 年 10 月，那里的造反派开会讨论行动计划。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第四红卫兵司令部”，说是“我们比清华还早就抓住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清华是蒯大富所在的学校，蒯大富在“三司”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攻击部长，意在总理

与此同时，一个旨在推翻“旧”体制的秘密计划开始实施。斗争矛头将集中在副总理身上，从而对周恩来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1967 年 1 月初，按计划开始了一系列对副总理们——包括聂荣臻（国防工业和科学院）、陈毅（外交）、谭震林（农业）和李先念（财经）等——的广泛攻击。这些攻击不断暗示：周恩来是他们的“幕后老板”。

组织大批判的人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在 1 月 7 日组织了一次批判李富春副总理和余秋里领导的国家计委的大

会。余秋里在场做了检讨。李富春那时正因病住院，但这难不住大会组织者，李也被绑架到了会场。另有一次，一位部长被造反派押到北京郊外并加以连续拷问达数天之久。还有一位部长无声无息地失踪了。

到了1月底，国务院中一些领导开始团结在一起。他们坚持认为，应该制止红卫兵中那些过激分子的行为，军队被召来保护高级干部，为控制局势发布了严格的禁令。极端派分子在发现这种斗争方式受阻后，马上变换成另一种方式。1月15日，穆欣带领一帮人从中央档案馆抢走了一批机密的个人档案。他们随后销毁了涉及他们政治盟友的罪证材料，而将他们政敌的罪证材料广为散发。还有一些极端派出于同一目的攻占了公安部，但在2月初被军队驱赶了出去。极端派发出了批判副总理以打倒总理的指令，称他们为“异端分子”。周恩来据说处境困难，因为他出面保护他的朋友，而且据传他在表决工作组问题时投了弃权票。尽管如此，一些激进分子此时也开始担忧起来。“现在，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如果让中央知道了怎么办?”激进派领袖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忽视了中央对他们的疑虑。

一些早先同情极端派的红卫兵开始脱离他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的学生将一名与极端派有联系并攻击总理的成员扭送公安局。然而，此人后来又在别处露了面，最后成了外语学院“5·16”组织的重要头目。这一组织在外交部很活跃。一些学生就是这样转来转去：因“反革命行动”而被从一个组织中赶出去后，他们往往会成为另一个组织中的“极端革命派”。尽管人们不断抵制这些人，怀疑他们居心叵测，但反对副总理的斗争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功。第一个被打倒的是农业部长谭震林。由于大跃进中的表现，他早已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在所谓“二月逆流”中，他提出彻底停止文化革命，这更使他威信扫地。揪出谭震林进一步鼓励了极端派分子。他们发表了下列声明，暗示中央文革已向他们透露了秘密情报：

> 党中央最近准备揪出一批人。刘、邓、陶后面的第四个人可能也会被揪出来。你们听到他的名字可能会非常吃惊。他已经保护了一大批人。中央还准备公开批判四个副总理。他们是：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和陈毅。

极端派对他们的计划满怀热情，并决定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这样，在所有部委和大专院校便开始了大批判。迄今为止对周恩来的未点名批判从此更加激烈。

发表《五·一六通知》：

“炮轰周恩来！”

1967年5月16日是党中央发出发动文化革命的内部通知周年纪念日，也是公开发表《通知》内容的一个好机会。这一通知于几天后发表。现在还不清楚是谁决定发表《通知》内容的。不过，不管做决定的是中央委员会还是中央文革左翼，结果却没有什么差别。这一措词相当激烈的文件现在给人的印象与一年前大不相同。文化革命发展到

现今这一阶段，远不需要再进行激进的动员了——情况恰恰相反。然而，《通知》的发表对极左运动进一步发展却起了理想的推动作用。

极端派马上便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反对"旧政权"，反对周恩来总理，反对在他的努力下于4月初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此后不久，在革命委员会中形成了一小派叫作"北京运动小组"的左翼组织。这一组织与极端分子有密切联系。5月16日的新攻势是由外语学院学生首先发起的。他们贴出了大字报，上面写着大标语"戳穿大阴谋"。大字报还未点总理的名，但它的含义是明确的："有必要揭露另一个刘少奇，一个假装革命的骗子！他支持保守派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

另外一些极端派组织的措词则不这样谨慎。5月底，商学院贴出的一幅标语使人再也不存任何幻想了："炮轰周恩来！"到了这时，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开始越贴越多，言辞也越来越激烈。象当初批判刘少奇一样，对总理提出的问题也暗含讥讽。这一阶段的运动开始于5月底提出的所谓"10个为什么"。到了7月初，"为什么"增加到23个，运动从此扩展到全国。

文革领导禁止攻击周恩来

文化革命的领导层完全无意让这一运动失去控制，并决定进行干预。1967年6月3日，批判总理的造反派组织代表被召集到一起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中左翼的最著名代

表）和叶群（可能为文革小组中的军队代表，作为林彪的夫人在激进派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会议由陈伯达主持。从戚本禹的发言来看，中央文革显然对不断攻击周恩来深感不安："如果你们干得过分，外国人就会散布谣言，说伯达与总理分裂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很害怕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每天都在散布他们的谣言。"

谢富治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说："北京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居住的地方，是文化革命的诞生地。如果北京的形势发展得好，全国都会向北京学习；如果北京干得不好，全国都会受影响。你们现在制造了分裂，大大小小的分裂，造成的后果会非常大，也非常坏。总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工作。总理掌管的是重要的国家大事。当前的斗争是对刘、邓、彭以及各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他们是主要目标……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内战上，继续贴大字报攻击肩负国家重任的总理，我们就会瓦解我们自己的阵营。同志们，请好好想一想……你们的作法干扰了斗争大方向，偏离了我们的主要目标。今天的会上你们可以各抒己见。上一次我和你们'6·16'造反派（外交部外语学院的极左派'6月16日运动'组织）谈了六七个小时，但你们总是认为你们有理，是我错了。噢，陈伯达同志，请你对他们说说——我在大专院校学生中间一直是不太受欢迎的。"

陈伯达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理，但是，你们总是忘记了大的道理……（回答对周恩来一贯支持陈毅的指控时说）我是一个最大的保皇派。我保了陈毅好多次，总理都没有这样做嘛。我保护了陈毅，我就是最大的保皇派。干嘛把总理扯进去？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当

然，我并没有明确说过我想保护陈毅。但是，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不能当外交部长，因为那是国务院提名的。你们学校能任命他吗？（这时，场内显然有犹豫不决的肯定声）你们代表谁？你们难道连这一点革命性都没有吗？"

（场内这时可能有人反对）

戚本禹这时说："别再胡说了！你们太孩子气了！"

陈伯达说："我投戚本禹同志一票，但一票还不够。即使我任命你们当外交部长，你们也当不了，因为你们连话也说不清楚……如果你们不会讲道理，你们怎么当外交部长？你们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一个人不能靠错误情况来关心国家大事。如果你们不顾全大局，你们就不能说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你们硬说我没有保陈毅，但是我说我保了。现在，你们说，我到底保没保？"

（一些人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

"你们是胡说！保的是我。不许强加到总理身上！"

"今天，我准备好了让你们打倒！"

戚本禹说："总理没有保。但是我必须明确说总理可以这样做。伯达同志可以这样做，你们也可以反对陈毅。但是，你们不能因为总理保了陈毅就反对总理。你们反总理反错了。陈毅犯了错误，你们可以反对他。但是，总理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誉，所以，你们不能反他！这些我们以前对你们都说过，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的意见。"

这样的交锋持续了一段时间，看来没有得到什么满意的结果。尽管学生们并未被说服，但反总理之风在后来的几周中确实渐渐平息下去了。不过，这次会谈只是中止了极端派在一条战线上的进攻。极端派的煽动攻击范围很广

泛，出现攻击使馆、中南海围困刘少奇及“武汉兵变”后的一系列事件。这种煽动攻击已使文革的上层领导开始产生忧虑。

第 五 章

激进派的退却

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

毛泽东，1957年，引自《毛主席语录》

十五、“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文革领导层谴责五·一六运动

8月10日，公安部以“危及国家的活动、搞阴谋”为罪名逮捕了北京三名极左派学生领袖。这一行动可视为决定停止攻击周恩来的结果。次日，陈伯达和江青对安徽红卫兵代表团的讲话清楚地表明，文革领导对“5·16”组织的“第四司令部”发起了严厉反击。陈伯达更进一步，把反周恩来的运动与“揪一小撮”运动联系到了一起：

> 还有一个“5·16”……那是一个搞阴谋的秘密组织。它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而实际上是指向党中央，因为反对×××也就是反对党中央。

江青的讲话可能更加激烈：

> 我不准备重复我讲过的有关“5·16”组织的那些话。一句话，不能容忍它，你们这些同志一定不要受它的蒙蔽。在文化革命中，一定会有一些人混水摸鱼……一些人想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动摇党中央……我们不会容忍“5·16”这样的组织。这是一种破坏行为。

在这段时期内，被批判的极左派，只限于北京的某些人，他们是组织严密、半秘密性的红卫兵团体中的领导人。到了8月底，在批刘运动失去了控制，造反派与地方军队之间的流血事件愈演愈烈之后，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某一天，批判极左派的斗争上升到了中央一级，这一层中的极左分子逐渐被清除出去。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北京派年轻成员很多被撤职。他们有：穆欣、林杰、关锋及陈伯达的助手王力。很多报刊被改组，包括《解放军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8月28日，在第二次接见安徽红卫兵代表时，到会讲话的不是陈伯达，而是康生。这一变化意味深长。显然，陈伯达已不再被认为是谈论“左倾错误路线”的适宜人选了。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很多文革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江青在这次会上说：

> 五·一六运动表面上反总理，实际上是一些地区组织。它是一支爆破队，想从“左”的和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造成国家的混乱。“5·16”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补充说：“‘5·16’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一些人不自觉地受到了他们的蒙蔽，帮助了他们。必须坚决镇压这一小撮坏分子，立即逮捕他们。”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即反击极左的主要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文革小组上海派的江青、姚文元手中。同北京派一样，他们在左翼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但由于与极左派的关系和所犯的错误，他们的威望要低于北京派。姚文元在9月8日的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五·一六运动"与陶铸的关系"，并认为：它大部分成员和头目还没有被揭出来。他们的人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才出来贴大字报，刷标语。广大群众正在调查他们。事情很快就会搞清楚。

基层反击极左；周恩来讲话

中央的明确立场使对立的各派红卫兵开始了反"5·16"运动。这一组织的成员现在开始感到恐慌。8月11日，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与他们的保护者取得联系，但后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他们的联系。"5·16"的领袖打电话找他们在中央文革中的关系（林杰?），但却找不到人。两天以后，后者象穆欣和其他人一样，告诉他要暂时中断联络。在后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组织断绝了与"5·16"的来往，而首先这样做的是与它联系最为紧密的那些组织。为了避免和极左分子一块倒台，他们急急忙忙地宣布，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中的一个过早地声称："5·16'组织已经被揪出来了。它的主要领导人已被抓起来，我们已经胜利了。"

8月24日召开的中央会议批判了极左分子。一天之后，北京的大约100个红卫兵组织召开了一次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宣布"胜利了"。这一行动又为时过早了。正是在同一天，幕后操纵者通过他们的政治支持者穆欣，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报纸《光明日报》上用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光明日报》是极左派的主要舆论工具之一，它直到最后时刻才改变路线。

但是，极左派的联络体系很快便瓦解了。到9月初"5·

16"的问题公开化之后，一直与极左派竞争的激进造反派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下面是他们自己的记述：

1.年轻小将怎样在战前制定计划

经过长期侦察后，我们发现北京外语学院的"6·16"与罪恶分子有直接联系，也是"5·16"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我们北京外院"革命造反公社"和"红旗"的小将与其他兄弟组织在9月6日的早晨聚集在一间屋子里，研究袭击和摧毁这一重要据点的计划。

"6·16"的主阵地在外院主楼的五楼，那里有100多个凶恶的敌兵把守。主楼中部只有一条窄窄的楼梯通往五楼，把守得很严。楼梯的入口处堆满了桌椅板凳，还堵上了一块厚厚的门板，有几个人看守。他们还在五楼存放了大量的石灰、石头和棍棒，花了好几天时间备战。这些凶恶的敌人妄想坚守他们的阵地。

毛主席说："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小将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应该充分发挥政治统帅一切的作用。一个智取和强攻的计划制定出来了。计划还决定要迅速发起进攻。他们决定在午饭后开始突然袭击。

2.聪明无畏的勇士是怎样攻占据点的

满载勇士们的卡车驶向"6·16"的据点。当我们的梁山好汉坐车到达那里时，我们看到外院"红旗"战斗团、电院"井冈山"和经院"红旗"等九个兄弟组织的战友也按原定计划陆续到达了。

电院"井冈山"的一个战友先走上前去，装作去看望"6·16"，手里拿着一封介绍信；他登上楼梯，想给守

卫来个措手不及。我们的战士等在一边，门一打开就冲上去制服那两个守卫，从而冲破第一道防线。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6·16”的歹徒们反革命警惕性很高，识破了我们的伪装。那唯一的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他们把所有的器械和木料堆到门后。

在不能智取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强攻。电院“井冈山”的战友用10斤重的锤子砸门。门哗啦一声倒下了。我们的战士迅速地直冲上五楼。

楼上的那些坏蛋早就准备好了。突然间，整个楼梯扬满了石灰。我们的战士睁不开眼，看不到东西，连气也喘不上来。为了冲破难关，战士们用随身携带的消防水龙喷水，立刻就把灰烟压下去了。他们冲上去，又向那边靠近了一些。

看到情况不妙，“6·16”的打手们开始向我们造反派投掷石块，妄想作拼死挣扎。我们的战士早有准备，掏出了他们的近战武器——弹弓。头两弹就击中了正面的两名凶恶的打手。两翼的敌人看到形势不妙，开始边打边撤。我们的勇士冲上去占领了前沿阵地。

我们的主力部队迅速上去占领了五楼。以张××为首的15名铁杆分子被抓获，还缴获了大批罪恶材料、反动传单、袖章、图章、旗子和其他宣传用品，连天花板上藏的罪恶材料也没逃过我们英勇的战士们的敏锐眼光。在这次战斗中发现和缴获的重要阴谋文件，为我们彻底揪出这一阴谋组织和它的阴险后台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罪证。

刚好一周之后——9月12日，北京的红卫兵召开了另

一次大会。1万名红卫兵庆祝这一真正的胜利。但是，仍然有人把这次会议看成又一个伎俩：

> 在"5·16兵团"的大部分成员和领导人还未被揪出来时，这些跳梁小丑召开了一次10万人大会。他们在全城张贴庆祝标语，把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小头目揪出来审判，假装大吵大闹地欢庆胜利。他们想让人相信，"5·16兵团"已经被揭露出来了，某某就是罪魁祸首。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麻痹革命群众的斗志。真是妙极了！
>
> 但是，在"5·16兵团"的操纵者林杰及其一伙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来以后，这些不断宣称反对"5·16"罪恶兵团的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已经获胜的"造反派"们一反常态，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他们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保皇宣言，把揭露林杰和穆欣反党集团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逆流"，并想给以"迎头痛击"。

造反派出于狂热的革命激情而想互相压倒对方（注意：导致极端行为的就是这种现象）。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文化革命发展到这一阶段，激进派左翼已开始走下坡路。这正是摧毁这一破坏性的宗派主义的好时机。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重要政策声明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我们还未考察的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是文革中更为温和的现实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他是极左派的主要攻击对象。同时，他可能也是第一个认识到激进派左翼自鸣得意造成的巨大危险。8 月初，很可能是周恩来动员了激进派从极端派中脱离出来。不过，他深谙谋略，在这场运动中很少出头露面。直到风头过去，他才在 9 月 17 日的一次群众场合措词谨慎地公开谈论这一问题。他在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的讲话中说道：

> 这一组织（"5 · 16"）恶毒攻击党中央的领导……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负责人之一，我不允许任何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我本人之间捣鬼……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希望这样……"5 · 16"组织被揭发出来是件好事。

这样，周恩来是第一个直截了当地谈及问题实质的人。晚些时候，他又谈到另一个敏感的问题：要治疗"左倾共产主义幼稚病"，"缺乏经验的年轻造反派很容易受骗……现在我对你们说，所有的学生必须返校，不然就要被开除。"（引文中在此注明了江青的一句插话："政府也不会帮助他们。"）

这个从 1966 年底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可以总结如下：象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新群众运动中作为先锋起了重大作用，然而，在此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不能与大多数人联合起来，从而只好进行一场更加迅猛、破坏一切但却到头来徒劳无功的彻底革命。

周恩来对极左问题的分析中所谈及的领导层中问题以及有关社会基础的问题也很值得注意。主要领导人中一些较老的激进分子过于自傲，为年轻的极端分子采取粗暴行动提供

了机会。所以，他在9月28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问题并不仅仅是找出几个替罪羊："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该检讨自己。我们光号召揪出军内一小撮，这种宣传是错误的。它导致了群众与军队的对立，而坏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周恩来说"我们"时，不会是真指他自己，因为他在发动这场运动时不负任何责任。但是，领导层中的其他人，如林彪和陈伯达，情况便不同了。他们为自己的同伙留有充分的余地以进行这场运动。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江青起的作用虽小一些，但她也负有责任。不过，在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她的责任不那么正式，而且她和她的同事在较早时期就退了出来，最后还对中止这一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她和她的同事觉得可以接受周恩来对问题的分析，做出问题"还未结束"的结论。周恩来和江青这些人对领导层的缺点持批评态度犹如在领导层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炸弹在条件适合时便会爆发。

非法抵抗的尝试

事态的发展自然使极左分子更加坚信革命到了要被扼杀的紧要关头。他们要竭尽全力挽救形势，以使革命能够转入地下。10月1日国庆节，北京街头出现了一封"特别中央委员会"写的公开信。两天之后，仍然支持"四司"的人在一篇名为《战马嘶鸣》的文章中再次刊登了这封信的内容。然而，其他一些人却不甘只搞唇枪舌剑之战。在北京的所有"5·16"重要头目都被逮捕后，仍有人鼓励剩下的追随者说："准备好打游击战——地点已经选好了……10年后

再见!"直至1967年底以后，一些游击小分队仍然盘踞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地区。在中共九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些据点仍在顽强坚持，令人颇为棘手。

左倾运动在各省区的发展

虽然，北京看来进行了某种清除左倾的运动，但是在各省的很多地区，意识形态仍是乱得一团糟。直至1967年末，"天派"组织仍在鼓吹极左政策。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最初他们忽视了中央政策上的转变，后来则有意识地反对它。毛泽东于9月份巡视各地时，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他的老家湖南，都亲身面临这一问题。在长沙的中学生中，组织起来的极左派仍然活跃异常。毛泽东想使事态略微平息一些，但是，象他通常所做的那样，并未明确表态。一大批左翼组织联合成立了"省无产阶级联盟"，这看起来似乎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通常准备，因为成立革委会的首要条件是联合，但是，这一联盟几周后发表的纲领表明其政策目标全然不同。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还未开始。11月17日，他们公开攻击了省革委会筹备组，声称它尽管想要"改朝换代"，但却没有触动"封建体制"。在12月21日的"省无联"代表大会上做出的一项决议甚至说："……现在，在全国的每一地区都有一股反对真正左派的逆流。"

以同一精神写成的一篇分析整个文革的文章出现于1968年1月12日，题为《中国向何处去?》。据说，写这篇文章的是长沙一中的一个学生。文章后面还有一条附注:

这是一篇征求意见稿。你们觉得是否应该现在公开发表?是否可以当作"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改写?读后请在两边空白处写上你的意见，于20日送回。

这篇纲领是对极左派观点的最为系统、全面而有趣的分析之一。它包括下列几点:

1."科学的预见"

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是如何阐述关于新社会的"预想"的;他是如何用巴黎公社政治组织上的教训来告诫1966年6月的北京群众和1967年1月的上海群众的。未来"预想"的实现不能靠和平手段——只有用暴力手段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政权问题。

2."一月风暴"

在中央，造反派夺了财政部、广播事业管理局及其他部门的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被大大削弱。那时，革命成果落到了谁的手里?落到了人民手里。他们满腔热情，组织起来接管了城市的行政管理权，工业、商业、通讯和其他系统中的党权、政权、财权和文权……在那几天中，一些地方实际上——虽然还不十分彻底——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预想，象巴黎公社一样，社会是群众专政的社会。

3."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的实质内容是"三结合"。推行"三结合"等于让已在一月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僚官复原职。军队和地方官僚会在其中起领导作用，这一政权形式最终会被

资产阶级篡夺……时至今日，一月风暴还未触及所有革命的关键问题：军队问题。因此，我们会看到革命缺乏深度，停留在一个低级阶段。

4.“二月逆流”

周恩来——现时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陶醉于2、3月的胜利之中，急于在全国所有地方建立革命委员会。如果这一资产阶级的计划实现了，无产阶级就不得不退却，最终被埋葬。所以，不等所有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中央文革就发出了反击的命令。从此之后，在全国开始发动伟大的8月地方革命战争。

5.“八月国内革命战争”

8月是革命群众组织力量迅速增长的一个月，而官僚主义的权力再次被彻底打倒。再一次发生了“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虽然时间很短，也很不稳固。社会再一次努力实现“中华人民公社”的目标。人民再一次试图解决“五·七”指示中提出的问题，即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和学生都要学习军事技术。

6.“九月挫折”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已经大为增强，所以这次退却并未象2月那样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无法靠近并侵吞革命果实，象他们3月份所做的那样。炮轰了周恩来的湖南革命力量并未被消灭。相反，他们组成了“省无联”，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战果。

7.“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启蒙”

“省无联”实际上是在“文攻武卫”的战火中诞生的。文攻武卫司令部是一月革命中群众专政的一种形式。它是比1月和8月组织得更好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

当于俄国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篡夺政权后工人阶级成立的苏维埃，而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 相当于那时的资产阶级省政府……“省无联”是象苏维埃那样的新生幼苗。它是比 2 月和 8 月的革命更加成熟的“公社”形式的雏形。

8、9.“批驳反动的‘二次革命理论’；批驳一次革命的‘左倾理论’”

我们拥护不断革命，也相信革命阶段论。“极左派”公社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标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革命委员会的修正主义体制才能达到。让新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他们身上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明天的中国必将是“公社”的世界。

毛泽东主义万岁！

这一文章确实引起了反响。一周之后，群众(《五·一六通知》曾提到群众应该自己教育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开始发生了动摇。1 月 18 日，湖南党报对极左翼发起了激烈攻击。1 月 21 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中央在会上当着造反派代表的面严厉批评了“省无联”。康生、江青、周恩来和姚文元都在会上讲了话。

至此，湖南的极左派已在劫难逃了。革命委员会最终于 4 月 18 日成立，成员大多是“省无联”曾激烈批判过的“省革筹”中的组织。发起对极左派的反击的军队负责人成了革委会主任。

十六、“笔杆子”和“枪杆子”偃旗息鼓

疲倦的江青

当中央里面相当一部分年轻的激进分子被划为极端派以后，激进派左翼中较老的领导人现在开始迅速退却。鼓励群众无限制地动员、发动对官僚主义大批判的“笔杆子”和“枪杆子”们现在发现，他们被迫撤回原来的阵地上，以使政治空气降温。“笔杆子”江青和陈伯达尤其如此——尽管作为人所皆知的激进派，他们仍领导了对极端派的攻击。虽然此时对他们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清洗是必要的，但这种清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他们的一种打击。特别是江青，她看起来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沮丧”。在领导了对“四司”的攻击后，很长一段时间，江青差不多从公众场合消失了。在这段时期，只有一次她引人注目地在公开场合露面，那是她很难避免露面的场合，是接见文化团体的革命代表。与她以前的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然缺乏热情。她在结束时说：“我累了，这次讲话也没能做好准备。所以，不要把我的讲话当作什么最后的结论，我想和你们交换意见，如果我讲的不完全或错了，你们一定要批评我。”

在这次讲话之后，江青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在公众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而且，与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不同，她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未被选入常委会。

陈伯达重温农业知识

不管是否自己的责任，陈伯达也被贬黜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上。和陈伯达一样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界的北京的年轻同事们，曾控制了宣传部门的大众传播媒介。他们和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年轻北京派人物中，除一人以外，都由于极左异端而被打倒。受陈伯达影响最大的机构，连同极左派一起，全部被改组。《红旗》杂志在六个月中不能独自发表社论。实际上，陈伯达不仅因与那些后来倒台的人的联系而损害了自己的地位，他对有争论的观点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也对自己的地位造成了损害。他正是因为通晓社会主义运动史，才提出了巴黎公社的榜样，而这一榜样被他的同事和他本人四处滥用了。现在，他回到了他的研究专业：农业合作化。据克莱恩和克拉克的研究，第一个使用"人民公社"一词的就是陈伯达。在此以前不久，有人曾听到他说，北京变成了一个非常嘈杂混乱的地方，都不能清楚地思考问题了。现在，他退身到了农村，重又开始了他的农业研究。根据自己的新经验，陈伯达现在开始提倡农业进一步集体化。吉恩·伊斯曼写道：

> 陈伯达的正式观点，也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一篇评论，出现在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头条消息中。这篇文章可能重现了陈伯达为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内容。那次会议于1967年10月21—27日召开。文章的语调很激烈，批评了过去的主要政策，主张

由"新的人民"继续进行革命。它批判了中国的修正主义和"中国的赫鲁晓夫"进行的社教运动造成的恶劣影响。它号召无产者和贫下中农"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陈伯达坚持的进一步集体化使农村中废除了一度仍然保留下来的所有私人雇工形式。在现行的农村组织形式中，激进派四处夺权造成了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因此，陈伯达的意见受到"现实主义者"们的反对是很自然的。

全国农村还有许多需要首先解决的其他问题。在一些新的农村临时管理机构中，左翼激进派势力的增长立刻导致各种各样的极端行为：全部集体化，取消私人财产，收入均等，平均分配等。这些强制方式非但没有促进，反而损害了运动的发展。由于1966年以后红卫兵采取的过激行动（包括破除"四旧"，统一服饰和风俗等，以强行同化不同的文化），很多贫穷的农民早已怀有重重疑虑。他们虽然没有对运动进行完全公开的抵制，但却进行了暗中破坏，或者对新规定干脆不予理睬。同时，农业产量急剧下降，远未完成计划。

政府中的高级领导人无法不正视这些严酷的事实，激进的改革纲领也不得不被推迟实行，直到形势转入正常为止。然而，基层的辩论却持续了好几年。激进分子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条原理说，经济形势的困难不应该成为推迟经济改革纲领实施的借口，相反，应该立即采取改革措施。陈伯达很精明，没有公开用这一论点为自己辩护。据报道说，他在1967年12月间甚至做了自我批评，但是不清楚批评的是哪

一段时间的事。不过，有一件事很清楚，那就是陈伯达的激进北京派中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也在 1968 年春下台了。这样，“四司”事件以后引起的清洗浪潮刚好在波及陈伯达之前停了下来。

林彪在干什么?

这样，我们在原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林彪身上。林彪同陈伯达一样，也是在大跃进中被推上显著地位并从此越升越高的。没有人会想到批判他，更不用说让他检讨了。但是，清除“左倾思潮”也可能会削弱他的地位。虽然林彪确曾表明自己反对受到批判的错误政策（他自 8 月以后力图成为一个政治中间派），但是他无疑与这些错误政策的制定有密切关系。他对“揪一小撮”运动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即使是现在，他的头脑中还念念不忘他长期坚持的目标：如果文化革命想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一定要加强左翼对军队机构（特别是大军区）的控制。8 月间，他在军队领导中建立了一个政治工作组。这一工作组不象以前的军队文革小组那样由保守派任命组成，也不受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事实上，这一小组的组成人员全部是林彪在军队中央领导中的亲信：他的夫人叶群（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是中央军委秘书处事实上的主任）、吴法宪（空军）和邱会作（总后）。肖华在 9 月份被清洗后，这一工作组采取了一种可以较少引人注目的姿态，同时对毛泽东的计划表示拥护。这一计划的目的是用比以前更加策略的手段来解决军队问题。

这一政策制定了两条行动方针。首先，派军队去组织地

方学习班，并破除领导班子中要左右派平衡的一贯模式。其次，军队仍要支持“左派”，但不再支持任何具体的组织。这是为了避免过去错误地支持了“右派”或极左派的现象，恢复“三结合”革委会的最高领导。不过，林彪的支持者继续采取其他手段来控制各大军区。到1967年春，成都、北京、新疆、内蒙各军区司令和辽宁、吉林、河南、江苏及浙江省军区司令都由中央军队领导接替。据其他报道说，几乎半数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在1967年中被中央军队领导所替换。此外，包括安徽、浙江、河南、河北、湖南、内蒙、江西、山西、四川和青海在内的很多省军区领导也被改组。很显然，这一政策无法不招致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因为这种换班采取的方式很少讲究策略和区别。

在清除“左倾思潮”之后，一些被打倒或罢官的军队领导人看到了为自己恢复名誉的机会。他们在很多方面指责了林彪的最亲密同事。他们把这些指控材料送给了未被撤换的大军区司令、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是总理办公室，因为周恩来与老一代军队领导人的关系相对来说一贯比较好。不久之后，北京听到的不满意见越来越多。看来，讨论军队领导中的左翼激进派问题的时机到了。到了1968年2月以后，情形尤其如此，因为此时向“极左思潮”发动一次新的攻击不但必要而且可能。3月间，杨成武在大约三次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康生——在激进分子迅速失势的同时，他的影响正在急速上升——在3月27日谈到杨成武的“错误”时说：“这些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以后，随着我们的同志继续揭发他，我相信还会发现更严重的问题。”总起来看，杨成武所犯的“错误”被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他对极左派的蒙蔽性宣传负有部分责任，在与他的前任罗瑞卿的谈话中，他只是一味拔高毛泽东；

二、他在武汉事件之后鼓励了王力那样的左翼极端派攻击"信得过的毛派军队领导人"；

三、他在用直属中央的部队替换地方部队时做得过分，并用他自己的支持者替换了一批地方军队领导人；

四、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他起了分裂性影响，曾试图组织宗派，并夸大了自己在革命中的贡献。

显然，这些指责同样可以适用于杨成武的上级林彪。事后看来，有些指责的矛头是有意指向毛泽东的副统帅的。据林彪的传记作者埃本说，在这段时期，一些党报曾号召"揭露支持杨成武的人"。正如哈维·耐尔森所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林彪突然从他的隐居之地——在那里他过着和毛泽东一样的生活——走出来，并发表激烈的谈话，进行人身攻击，亲自加入了反极左运动。在这之后，他力图在领导军队时对大军区负责人采取相当和解的态度。规定的一条行动准则说："在我军的兄弟部队之间散布不满情绪是完全错误的……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会必须……发展其他大军区部队与当地武装之间的团结。"

此外，林彪还亲自出面去解决一些省的问题，如山西，那里的"左派"和军区领导之间，温和派和军队的中央领导之间仍有纷争。以林彪的地位和威信来说，这种作法是很不寻常的。

杨成武的继任者看来是军队的中央领导与"重要的"大军区司令之间妥协的产物——黄永胜。他是广州军区司令，也是林彪的老部下。当1970—1971年的"左倾思潮"在林彪和

黄永胜的军队领导中复活时，陈锡联和许世友是它的反对者。

在这段时期消失的第二个人是余立金。在武汉事件中，他以林彪的名义反对了地方的军队负责人陈再道。余立金是空军第一政委兼副司令。他的上级是吴法宪。吴法宪是林彪的人，而空军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清除了吴法宪后，陈再道于1972年官复原职。

第三个被搬掉的人是傅崇碧。据一些报道说，他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对那一期间粗暴逮捕政治反对派负责。这一问题似乎被告到了江青处。江青马上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联系，谢富治又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傅崇碧由郑维山接替。到了1970年，北京也开始了与军队左翼的对抗：那一年秋季清除了陈伯达之后，郑维山和李雪峰在冬季也被免职，林彪的影响下降，而周恩来重又成为中心人物。

由此看来，1968年3月是1971年9月的前奏。不过，中心人物周恩来这时的地位又如何呢？虽然他仍未公开指责极左派，但他无疑是支持受到攻击的大军区司令的。4月份，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在一些部队中当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我们不能说军队中没有走资派。但是，这些单位是少数，是孤立的……但是，走资派渗透了党和政府机关，所以相对来说那里的走资派比较多。”在7月份接见武汉的新任军队领导人时，周恩来和康生说过类似的话。就周恩来来看，形势还是不太令人满意。

十七、无产阶级领导一切

学生：从先锋队变成后卫队

如果说大中学生在文革开始时是突击队的话，他们现在则变成了脱离大部队的后卫队。1967年9月和1968年3月的纠偏运动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他们更加激进。北大和清华（特别是后者）在文革开始时起了冲锋陷阵的带头作用，而现在，它们却在顽固地拖运动的后腿。同时，清华的派系斗争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文革中央领导层怂恿下联合起来的组织又一次分崩离析。从1967年4月14日开始，清华分成了严重对立的两大派："井冈山兵团"（原）和分裂出来的"4·14井冈山兵团"。分裂是由所谓的干部问题引起的。"井冈山兵团"（以头号造反派蒯大富为首）认为所有党的老干部实际上都应被罢官，而"4·14兵团"站在官方政策一边，认为要打倒的是少数人。在1967年那个炎热漫长的夏天，这一分裂再次激化。两个组织都想通过极端的革命行动来压倒对方；"井冈山"在"揪一小撮"运动中尤为活跃，而"4·14"在冲击外国使馆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两个组织都同中央文革中的左翼保持着密切联系。当

极左派在9月份受到江青的贬斥时，“井冈山”的反应是一腔义愤（蒯大富问：“什么是极左政策?”），而“4·14”则看起来采取了合作态度，按照毛泽东制定的路线进行了新的联合，但新组织内仍是麻烦重重。

到了1967年12月底，秘密活动又开始了。当北京市革委会改选中再次讨论到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派中那时所剩下的唯一少壮极端派）的候选人资格问题时，蒯大富拉起手下的人支持戚本禹。同时，他利用戚本禹的名气在校园内重新发动了他自己的宣传运动。最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把对立的两派代表召到他那里，并要戚本禹谴责这种行为。谢富治说：“这一次，我当面宣读我的讲话，这样，你们谁也找不到一点理由把它当作建立派系的借口。”

与此同时，政治形势又一次变得象一年前那样混沌不清。一方面，文革的中央领导层划清了自己与“左倾极端行为”的界线，另一方面，它又面临一个新的“二月逆流”——有使整个运动前功尽弃的危险。还有一个担忧是军队在事态发展中的影响可能会过大，而同时，党内的群众运动继续停滞不前。领导层中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是红卫兵之所以在这时仍能非常自由地行动的原因。虽然大中学校的学生确实都已经返校，但他们的斗争却并不只限于教育领域。其实，斗争的根本不是教育问题；对学生们来说，重要的是坚持找机会在校内和校外重新发动斗争，一切重新开始。

清华的游击战和内战

1968年3月前后，戚本禹和杨、余、傅等人被清除。这并没有使蒯大富这样的激进分子停止行动。相反，因为这些身居高位的“右派分子”曾非常巧妙地把自己装扮成极左派，所以特别提高警惕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激进分子的推论。为了发现“4·14兵团”是否网罗了叛徒，蒯大富在“井冈山”分裂的周年纪念日那天指使人绑架了两个“4·14”的人。在“严密”审问没有结果后，那两个人被毒打了一顿。仍然没有结果，绑架者便用录音编造了一份“供词”。随后，这些证词被用在对“4·14兵团”的宣传攻势中，以证明“4·14”是由“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派”组成的。“4·14”也出于同一目的绑架了“井冈山”的一个头目以进行报复。

这场冲突的每个狂热参加者都有生命危险。两派的铁杆分子各自进入教学楼，并构筑工事，封锁了楼房，然后分别向对方发出了第一次最后通牒。开始的一些小冲突很快演变为突击队行动，小规模的游击遭遇战升级为正规战斗。两派在校园内的势力范围交界处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开始时，战斗是赤手空拳进行的，但很快便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刀剑。肉搏战被攻坚战所取代，在进攻中使用了弓箭和庞大的投掷器，石头和自行车轮胎都被用来发射。双方每一星期都有死伤。4月23日的战斗是为了争夺一辆救护车，4月29日是为了两辆运送大米的补给卡车，5月2日是为了有人破坏停火，5月16日是因为交换战俘没有成功。到了5月30日，战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进攻一个被围困的

"4·14"据点时，"井冈山兵团"先是在高楼之间搭了一个临时梯子（未成功），后来又动用了一辆由卡车改装成的坦克，最后干脆放火烧楼。由于附近居民的干预，结果才采用只用烟熏的战术，进攻被困的那个据点。

一方使用自制坦克，另一方使用自制的反坦克炮（还有真正的反坦克炮——从南方的一个军火库中偷出来，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运送到北京，原是要运到越南的），还动用了手枪、步枪、自动武器、"火箭"、一门"加农炮"、莫洛托夫燃烧瓶、炸药、手榴弹和地雷。

当然，几乎所有的中间派学生此时都撤出了这场战斗，所以实际上，这只是"井冈山兵团"的200名学生和仍坚守在被围困的一幢楼房中的"4·14兵团"100名学生之间的交火。大约100名外校各种组织的战士也分别在两方中参战。

在这期间，战火蔓延到了其他大学和中学，最后到了城内。在4月和5月里，街头流血巷战中的死伤有数百人。1968年5月巴黎发生的学生和工人造反运动显示了这两个阶层的团结；而对北京来说，在这一点上也不能落后。

没有人理睬文革中央领导层要求放下武器的号召。中央在7月3日和24日亲自发出了号召，但是造反派们宣称，那是对安徽和山西（那里正在组织革命委员会）说的，而北京进行的是反对"蒋介石特务"的战斗。

工人和士兵介入

在这之前几天，工人们已经去过北大和清华，呼吁学生停止武斗。不过，他们被武装的学生挡在了校门外。在和大

约 60 个工厂的工人磋商后，以政治觉悟高而闻名的新华印刷厂工人决定在校园外面组织抗议示威。学生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封锁了通往学校的所有道路。这一次，工人们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解放军战士一起组织了一次规模比以前大得多的示威。示威将坚持到学生们放下武器为止。7 月 27 日清晨，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分七路向清华进发，上千名、甚至数万支持者加入了这一队伍。他们手中只拿了《毛主席语录》和写着各种标语的旗帜，上面写着中央的号召和毛主席语录——如“要文斗，不要武斗”，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经过短时间磋商，学生们撤到了两座楼房内，而人群象洪水般涌进了校园。人们齐声向学生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

第一个响应号召的显然是“4·14”造反派，他们在被围困 100 天之后显得有些疲惫不堪。工人和解放军拆除了他们的据点，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带往较安全的地带。然而，“井冈山兵团”拒绝放下武器，而且向正在外面冒着倾盆大雨继续进行和平示威的工人和士兵们投掷石块。“长矛队”三次试图使用长矛突破包围。在这一天中，5 名示威者被打死，731 人被打伤，143 人被抓去。一些工人开始失去自制力，但被他们的同伙劝住了。示威继续进行，但只是不断施加道义上的压力。作为解决社会内部冲突的一种方法，这种表态是儒家传统和毛泽东主义共同采用的。到了傍晚，学生们准备谈判了。蒯大富本人亲自向毛泽东呼吁谴责“外部干涉”。那天晚上，毛主席同时接见了他和聂元梓及其他三个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光荣的造反派来欢迎，而是对他们的造反运动迷失了方向表示失望，并坚持工人和士兵有权介入。第二天一早，蒯大富回

到清华去谈判投降。但是，他给他的支持者造成了一个毛泽东认可了他们的行动的印象；并把一批人派往其他院校。那天上午，工人和士兵们进入楼房清理时，发现很大一部分罪证材料和很多贮藏的武器都被转移了。尽管如此，发现的东西也足以使他们吃惊：

5 枝半自动步枪
57 枝步枪
31 枝手枪
12 枝自制步枪
5 枝小口径步枪
5 枝汽枪
1038 发子弹
688 枚手榴弹
52 尊自制加农炮
9 袋炸药（反坦克用）
16 枚自制地雷
16 箱炸药

2 辆自制坦克（装甲卡车）
50 瓶毒气
185 瓶酸性和其他腐蚀性药水
15 把大刀和刺刀
1435 杆长矛
380 把匕首
9 条钢鞭（用精制链条打成）
25 发加农炮弹
2 枝 59 型步枪
1 枝 56 式冲锋枪（“玩具枪”）

一些房间中有完整的制造军火车间，完备的通讯控制室，配备了医院设施的病房和病人，关押了一大批受到虐待的战俘的牢房，甚至还有显然已死了好几天的造反派发臭的尸体。

教育无产阶级化

中间派学生返回校园时，见到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人和解放军——他们是来与学生们共同商议如何彻底改革教育的。已经自1967年开始在其他地方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现在也开始在大专院校中建立起来。它把意识形态教育和努力改善已弄僵了的关系结合起来。

在蒯大富宣称他的行动受到毛泽东赞同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恰恰相反，他赞同工人和士兵们介入大学。他在8月初通过送一篮芒果——巴基斯坦外长的礼物——给清华工宣队表示了他的支持。这篮芒果几乎被当作宗教圣物一般在清华展出。这件事颇为引人注目，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北京大专院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8月底，姚文元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一切领域行使权力，这自然也包括教育领域。全国发动了一场彻底改革教育体制的运动，把教育从培养“精神贵族”转变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运动涉及一系列根本改革：教育变得更加实用，课程更加精简。而且，培养“新的达官贵族阶级”这一可能性也受到了猛烈抨击。升大学将不再只靠考试（这种只靠文化水平的作法自然对一个特殊阶层的人有利），而靠当地和所在单位的推荐。按规定，将来所有高中毕业生都要工作几年；如果他们在工作中显示了适当的智力、实践经验和正确的政治觉悟，他们才可以进入大学。

官僚体制的无产阶级化

除了学校以外，工人们还接管了一些政府机构，并在其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大大简化了工作程序，精简了机构。北京的一些单位最后被精简到只相当于原单位的一个部门。

与此同时，1968 年 5 月 7 日，最早成立革委会的黑龙江省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原有的党校被“五 · 七”干校所取代。“五 · 七”是 1966 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著名信件的日期。那封信概述了将要解决的问题。除了老弱病残者外，所有重要干部都要每五年去一次干校，为期 6—24 个月，以改变他们舒适的生活，体验工人和农民工作和生活的艰苦环境。为此，干校建立了一套一切厉行简朴的制度，使干部的日常生活与内地贫穷的农民一模一样，一切事情都要自己动手（从砍柴、造砖、做饭、掏茅厕、锄地，直到安装电灯等等）。在干校期间还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和政治学习，以打破由于工作造成的与普通老百姓的疏远和隔阂。

在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另一运动是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由于 1966 年和 1967 年对巴黎公社的过分吹捧，很多地区实行了“西方化的选举”方式，“左派和右派”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反对极端民主和派工宣队的作法，意味着普遍选举要再一次和中央控制的革委会筹备小组磋商的作法结合起来。北京的控制在有意放松了一段时间后也再一次加强了。在新体制下，提出某一职位的候选人仍然很容易，但是，受政治操纵的选举委员会可以通过支持某些候选人、不支持另外一些候选人，通过

数轮选举而轻易地影响选举的结果。

这样，两个最重要的"左派"群体（学生和工人）再次被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并重新开始政治建设。运动的重点从"斗、批、改"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转向后两部。

第六章

中共九大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1969年4月14日）

十八、林彪的鼎盛时期

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夏，中国似乎又获得了政治均衡。经过一番权力争夺之后，此时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自审和重整的阶段。各种社会力量逐渐稳定下来。毛主义的群众组织也是如此。虽然这些组织以红卫兵的过激革命行动滥用广大人民的善良意愿，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在许多地方得到承认并进入领导阶层。老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多数人也恢复了名誉，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永远消失了。人民解放军在年轻的毛主义者和老干部之间充当公断人，进行调解，这使得安定团结的趋势尤为令人注目。在1968年夏季和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造反派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军方的冲突仍在继续，有时甚至是流血的，但这些冲突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了。在8月1日建军节时，为了加强人们对军队的信任而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这是一个明确的征兆，即恢复正常化的努力正在进行。中央和各大军区司令部之间的斗争表面上暂时消失了。

形势的安定还进一步表现在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上，尽管达到这一步不是没有遇到困难。1968年9月7日，最后的夺权变为既成事实。借此机会，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

话；强调说，尽管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做出了巨大成绩，但是运动的领导最终还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她也提到了军队，但仅仅是在谈论军队支持工人的作用时提到的。这与实际情况不大相符，因为她一定很清楚，在革命委员会中毛主义群众运动的作用在不断削弱，而军队的作用却在加强。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耗时甚长，使得原先公布在国庆节后10月10日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能如期举行。然而，在10月下旬，八届十二中全会终于召开了。虽然公报同往常一样空泛，但它证实了三点推测：一、刘少奇是“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把他永远开除出党；二、林彪成为新的党中央副主席；三、这两项决议将在几个月后召开的九大上得到正式通过。

九　大

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按原定应在八大之后5年召开，但却拖了12年半之久，然而，这似乎看来无足轻重：九大终于确认了毛泽东的全面胜利，他在长期斗争中得到了有广泛基础的群众运动的支持，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在暗中复辟”。

在1512名代表中（记录数字），有许多人是刚刚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代表们的文化程度平均较低，这说明普通人——农民和工人们的代表增加了，与前几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形成对照。而且代表中的多数成员并不是象以前那样由党来选择的，是由党

的领导及其下级组织——比如革命委员会——共同协商，“民主选拔”的。

这一步骤，以及与前一时期的“大民主”截然相反的形势，还有党组织在涣散状态中依然存在这一事实，都说明军队能够对九大施加不同寻常的影响。那时唯一还在起作用的党支部就是军队总政治部的党支部，他们还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国防绿，在九大开幕那天走向天安门广场的代表队伍中是最主要的颜色。大约在两年半前，正是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向150万红卫兵小将发出了走出校门到全国各地去闹革命的号令。而今，时过境迁，红卫兵在九大的代表寥寥无几。九大的召开表明，经过一番努力，法律和秩序得到了恢复，过分的群众运动得到了控制。

九大的议事日程仅有三项：林彪做政治报告，制定新的党章和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按计划前两项需要两周时间，第三项需要10天。然后，大会将宣布闭幕，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将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人数将少于九大。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将商讨如何贯彻实施党的方针、政策。

林彪的政治报告

林彪那年62岁，是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中最年轻的。虽然这一代领导人已经大量减少，但他们仍旧掌握着实权。林彪的讲话连篇累牍地引用了毛泽东语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不是非常先进的。然而，最重要

的是，此时他还未曾试图抢占毛泽东的位置。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时，他的报告追溯了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他的主要论点是：在中国，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在特定时期，这种斗争仍会是十分激烈的。虽然刘少奇一伙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已经被文化大革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形形色色的"左派"活动，林彪说："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

后来——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据说那些章节是姚文元以毛泽东的名义加上去的，而另外一些由林彪和陈伯达起草的章节，却从公开讲话中删去了，也有一些章节被林彪保留下来。另外，据说在开九大时，对于应当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就已经有了严重的分歧。

林彪在谈到将来的任务时，强调并高度赞扬了军队的作用，而且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在谈到上层建筑的改造问题时，林彪要求党的代表们"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免将来重犯"。他再次提到1966年8月公布的《十六条》，这个《十六条》曾严格规定，不得随意处置对立派，但他的注意力放在群众运动会破坏生产的理论上，他引用了《十六条》中的论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他还警告不要自满，并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话：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

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两年半以后林彪才会明白，他在九大政治报告结束时所赢得的热烈掌声也并非最后的胜利。

新 党 章

在九大召开前几个月，代表们就已经拿到新党章的草案了。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在矿山和工厂里，在人民公社和机关单位里，人们“逐章逐段地”在学习讨论着这些文件。讨论中产生的建议转达给代表们，然后再由他们提到九大议事日程上来。与老党章相比，新党章删繁就简，只有12条，而过去是60条。前两个党章分别是由邓小平（于1956年）和刘少奇（于1945年）起草的。毫无疑问，新党章和两个老党章之间的天壤之别与起草人的不同有关，也和清除了“苏修”在党内的影响以及清除官僚主义有关。

新党章中的规则部分包括党员、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以及党的基层组织五章。然而更为有趣的还是总纲，它占用了整整第一章。它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

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总纲很长，但以上所引的几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其中使用的许多套话就显得不完全正确了。

新的中央委员会

4月15日，九大的第三项议程终于开始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对此新闻公报陈述如下：

> 大会在4月15日进入第三项议程后，代表们认真地负责地进行了工作。根据大会主席团规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先由各代表团自由提名，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意见，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再交给各代表团，经过充分协商，产生出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预选。经过这样几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充分地民主协商，商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由主席团提到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

4月20日中午会议进行到这个阶段。代表们排着长队走过大厅前方的投票箱。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及其内部分工时，又出现了一些小的变化。总的趋势是：林彪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周恩来只勉强维持住自己的地位；虽然文化革命小组所剩下的五名成员都进入了最高领导层，但他们的代表作用却因丧失了一些最初的支持者而失去了一定的重要性。党的组织还没有重建，而林彪身后却有军队组织，周恩来仍享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文化革命小组的五名成员则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和红卫兵的紧密联系。虽然那时还有一些红卫兵组织零星分散在各地，还有若干地方性组织存在（既有军队的也有政府的），但他们的影响很小，几乎

不被认为是一股力量。

新的中央委员会由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比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人数多一倍。上一届中央委员中只有40%进入了新的委员会；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20%的委员有过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经验。最为有趣的是，新的中央委员会吸收了大批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他们从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但却因为官僚主义作梗而不能进入最高权力组织。现在，这些工农兵在中央委员会里所占的席位介于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委员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称赞。这种情形暗示着一个难以理解的批评：过去，选举大会代表在形式上要更为"民主"些，但是因为行政管理上的障碍，并没有象这次大会那样全面地代表了各界人民群众，尽管这次代表或多或少是由领导们指派的。

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构成

虽然在新的中央委员中军人占一半之多，但是人民解放军的实际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只占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人数可观但决非同一派系的团体。他们中大约只有一半人（总数的六分之一）才是中央的军队代表。另外，各军区还各有2至5名代表，他们也占总代表人数的六分之一。除此之外，有六分之一的委员虽然也来自军队，但受其他权力机构委派当代表，比如革命委员会。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治局由如下人选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分别由毛泽东和林彪担任；其他中常委委员有（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政治局委员中，除了中常委委员，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①]、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乍一看上去，这16个人可分成四五派。首先，是势力最大、关系最为密切的林彪在中央军队里的亲信：叶群（林彪的妻子及办公室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及空军司令）、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及海军司令）、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后来都参与了1970年的宗派和1971年的阴谋活动。

其次，是只有象征性重要意义的极左派，他们是江青（她虽然是毛泽东的妻子，但决不象叶群那样能帮助丈夫处理外部事务，充当“门将”）、陈伯达和姚文元。

然后，是周恩来和他在文革中千辛万苦保护过关的几名同事：例如李先念等人——但他们与周恩来的个人关系并不是象林彪和他的一伙那样子。以下派别之间的界限就不那么明显了，第四和第五派往往混在一起。这些人中有些是有地方军区作坚强后盾的军队代表，有些是政治态度不十分明朗的老帅和政府领导人。许世友和陈锡联属于前者；叶剑英、刘伯承、朱德和董必武属于后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曾受到来自中央军队组织的猛烈冲击，这使得他们后来较为屈从压力，采取一条比若干军区司令较为中庸的路线。

最后，还有4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和汪东兴。前两名后来支持了林彪；后两名支持了毛泽东。

---

① 带*者为原文所漏。——译者

了解一下这几个不同的派别是至关重要的。在九人和九届二中全会之间，以上所提到的几个派别之一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宗派，他们只是在其他各派联合起来之后才被遏制住。然而此时，个人关系还处于幕后。在几年相对动乱之后，各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做出实际决定上。



第　七　章

战争的威胁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林彪引用毛泽东语（*1969* 年 *4* 月）

十九、中苏边境冲突

在东北边境上

1969年2月16日，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发表了如下言论：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国内外政策失败越是惨重——其对外政策已经使得这个国家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他们就越是要拼命反苏。他们的领导越是背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北京的宣传机构就越是要一意孤行，大声叫嚣，说什么是苏联抛弃了那些原则，是苏联背叛了革命的利益并复辟了资本主义。随后不久，中国的宣传机构开始受到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他们甚至可以被称为是种族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以便进一步挑动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文化大革命，以及所有那些可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的后果，并没有使苏联对中国亲热起来。双方的注意力倒是愈来愈集中在边境上，而且双方的边防人员都被告知要加强巡逻，以防自己的领土遭到侵犯。然而，在许多地方，

究竟自己的国土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双方都没有十分的把握。在边境的两条河流——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有许多小岛，往往不过是一些较大的沙洲而已，而且随着河流的自然改道时隐时现。乌苏里江位于西伯利亚最东边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北面，中国黑龙江省的工业城市哈尔滨的东面。1969 年 3 月 2 日，在乌苏里江的一个岛屿上爆发了战斗；中苏双方都宣称那里是自己的领土。苏联人称它为达曼斯基岛，中国人称它为珍宝岛。过去，这类分歧从未招致严重的困难，但是，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因为双方的边防人员都处在互不信任的气氛中，监视着对方。3 月 2 日上午大约 11 点钟，在江中航行的一条小船在那个小岛靠了岸，一些船员登上小岛。江边一方发出了警告的枪声。片刻宁静之后，突然枪声大作，一场全面战斗打响了。几个小时以后，包括坦克和大炮的重武器也投入了使用。天黑之前，1000 多枚手榴弹在中国境内爆炸，死伤数十人。3 月 15 日，另一个事件导致双方相互炮击，损失可能比 3 月 2 日大得多。北京和莫斯科当然都相互指责对方侵犯边境并首先使用武力。苏联的广播宣传机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公开威胁中国说，如果中国的挑衅活动持续下去，苏联将使用它的全部战略火箭武器，成百万的中国人将会因毛泽东的鲁莽政策死于战火之中。中国方面的愤怒情绪也在增长：

> 中国人民任人摆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谁要是以为还可以用当年沙皇俄国的那种欺诈手段来对待中国人民，那他不是瞎了双眼，就是打错了算盘……如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 7 亿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

强大。任何胆敢侵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都必将被赶回去。打倒新沙皇！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分子！

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谈到那些事件时，林彪说：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19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1920年9月27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①

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

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

① 中略，下同。——译者

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然而，在中共九大之后，不仅仅在乌苏里江畔，而且在黑龙江畔（乌苏里江是黑龙江的支流），为了争夺许多小岛和沙洲的领土主权，又发生了进一步的摩擦，那些地方的管辖权在现存的条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若想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双方有共同的善良意愿，但在当时显然缺乏这种意愿。5 月，新的边境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于 24 日正式发表了对苏联政府 3 月 29 日声明的答复，但它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内容。然而，它还是建议把北方边境河流的使用问题同更为根本的争论暂时分开来。6 月 18 日，举行了关于国境河流航行问题的中苏双方代表会议。一番争辩之后，一个有限的决议达成了。看起来，似乎冲突的升级得到了控制，然而这是十足的假象。

维吾尔地区和原子弹基地

不久，紧张的气氛弥漫其他边防前线和更具重要性的地区。那些地区对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就有可能导致一场大战。新的纷争涉及新疆——中国西北最边远的行政区——靠近乌鲁木齐一带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自治区，居民是维吾尔人和祖先为土耳其穆斯林的游牧人。这些人的亲朋有些住在边境线另一边，也是在人烟稀少的自治州里。他们一直过着游牧生活，在边境线确立之后，仍然自由来往于其间。到 60 年代初，当中苏关系开

始恶化时，问题便产生了。中国政府指责苏联挑动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和民族情绪，反对北京并搞分裂活动。1970年3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报道说，一个"自由土耳其斯坦运动"委员会已经在苏联维吾尔人地区的首府成立了，锋芒直指新疆。这样看来，中国政府的指责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苏联的努力收效甚微，即使他们能够煽动起6万人非法越境，也无济于事。两国间措辞严厉的声明接踵而至。随着紧张气氛的加剧，在边境线上的武装冲突越来越多，仅七年内已知的冲突事件就有4000次之多——平均每天两次。这个自治区里有许多地带在以往的条约中都没有涉及，这就更为加重了双方的冲突。

乌苏里江畔和黑龙江畔的冲突显然对新疆的形势产生了影响，促使那里的事件剧增。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对中国政府极其不利，正如前一阶段的动乱一样。新疆刚刚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在那里，尤其是在那些思想更为保守的人当中，出现的困难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

造成冲突加剧、形势动乱还有另一个更为重大的因素。七年前，那一地区只是对苏联具有战略意义，因为他们在阿拉木图安置了核武器，这在军事上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不久，中国在罗布泊边缘地区也建立了核试验基地，而且中国最重要的（或者可以说是若干个）铀矿和与之相关的冶炼厂也坐落在那里。1969年初，中国即将生产能够发射带有核弹头的火箭了。是否能对中国的原子弹基地进行"有限行动"，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推迟关键的几年，在当时成为苏联军事刊物上的话题。北京对这些威胁并没有等闲视之。对苏联来说，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发动一场"闪电战"，再把它说成是维吾尔人闹事引起的边境事件失控，这并非一件难

事。5、6月份，在新疆边境地区枪声不断，苏联方面还首次使用了重型武器，包括坦克营和重炮。到8月时，战事不断扩大，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逝世，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苏双方又拉到一起来了。在临终遗言里，胡志明恳切地呼吁，中苏两党要尽释前嫌，共同支援越南人民。经过一些初步的接触之后——那些接触很可能是在去河内吊唁时进行的，柯西金在9月中旬中断了他返回苏联的旅程，来到北京，和与他地位相当的周恩来商定了谈判日期。10月20日，在中国的首都，中苏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库兹涅佐夫举行了谈判。到1970年1月时，形势已经明朗，谈判收效甚微，可能会打仗的说法再次开始流传，而且这次战争的危险比以前更为清晰可见。在许多城市里都进行了防空演习，民兵训练也加强了。1969年底，很可能是由于安置防空炮火和其他防卫设施的缘故，北京四周又被宣布成为外国人的禁区。人们已经挖了一段时间的防空洞，这些防空洞在连成地下网络之前就得到了安排，供平民百姓防身之用。疏散计划也制定了出来。12月1日，《时代周刊》报道说，中国正在挖掘地下掩蔽所，以备不时之需。类似的报道也从北京和其他城市发出。中国不得不对人民进行备战教育，以防战事再次爆发，同时努力向苏联指出：入侵一个社会主义邻邦，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国内动乱。但是，这方面的内部消息很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国内产生反抗的可能性。毛泽东本人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一年多以后，他重新调整制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虽然，官方的政策仍旧可以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

仅仅依靠人民战争根本无法应付海上和空中的机械化战争，更不用说核战争了。越南人民斗争的最后阶段已经再次表明：由于很多的美军基地已经从越南本土移到邻国和航空母舰上，只有美国及其盟国内部的反抗才能制止战争进一步升级。然而，这种反抗在西方还能产生一些作用，在苏联和东欧却是难以想象的。

二十、再次辩论战略问题

1965年与1970年之间的差异

苏联核武器干涉的严重威胁和中国可用来抵抗这种攻击的资源的严重缺乏，致使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重新开始进行“战略辩论”。于是，1965年那种偏见又出现了。那时，美国的威胁导致某些人民战争理论的形成。然而此时的情形与1965年不同。那时，越南战火蔓延到中国南部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那次威胁仅仅来自一个超级大国，而且那次威胁要有限得多。中国人难以对付的只是核攻击，高度机械化作战能力还没有发展到1970年的水平，这时美国若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只会落得个彻底崩溃的下场。美国人也许不相信这一点，中国人却是坚信不移的。中国人有十分的把握，只要准备好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一场人民战争就行了，而且他们的战备也完全是基于这种想法进行的。他们还考虑到，即使有可能受到核攻击，苏联也决不会袖手旁观，一任越南战争扩大，尽管它与中国的关系仍旧不好。1970年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战争威胁就来自邻邦苏联，而且遭受核攻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中国又几乎不可能期待美国给予任何支援；这不仅仅是因为两国关系很不好，而且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一些地区还有军事冲突，比如朝鲜、台湾和越

南。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意味着它从别的国家也得不到什么援助。

由于向苏联投降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不可能与西方联盟一样，剩下的选择就是准备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打仗了——或许甚至是孤军与两个超级大国作战。如果要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那么大规模的军备扩充就势在必行了。而且这种扩充不能只是走准备打人民战争的老路；考虑到战争威胁的性质，军备扩充就必须包括准备打一场“现代”战争。这就意味着，当时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核武器规划，必须纳入范围广大的军事工业计划之中。迅速集结可靠的核武器潜力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中国的核武器规划可以追溯到60年代，始于苏联撤走它在这方面的援助之后。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大大早于任何外国观察家们的预测。到1967年夏季时，中国看来已经是有生产氢弹的能力了。1970年4月，中国热烈庆祝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这支富于战斗性的歌曲由卫星播放，再由广播电台传送到各地。对于外界来说，卫星的发射表明，中国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中程火箭了。看来，中国很可能已经在北方边境地区安置了一些短程火箭，尽管未设防的发射台对技术上占优势的苏联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据外国观察家估计，如果中国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那么它在80年代中期就有可能建立很多防护良好的火箭基地。那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核大国。当然，这种预计是以假设中国现有的速度不会加快为前提的。

但是，中国的一些高级军事领导人力主加速发展国防工业。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自空军、海军和后勤部。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军队统帅——比如林彪和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还没有下定决心。一点不假，他们是提倡过要建立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为打人民战争做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当时的战略形势视而不见。实际上，按他们的观点，政治只最终起决定作用，军事工业如果不能发展两三倍，就无异于向两个敌国之一投降。

毛泽东强烈反对大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首先，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将会吞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的一大部分。其次，如果某些部门，比如最新的电子工业，获得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中国就会产生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政治和思想观念上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周恩来和其他一些经历相似的军事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斯大林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苏联的出现，就是因为苏联人把发展的次序弄错了。陈毅在会见一位南美记者时，曾经这样谈到斯大林："由于鼓励发展工业和技术……而没有解决农业问题，他对苏联的落后负有责任。"

他们在军事规划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周恩来和陈毅制定出另一个行动路线，以供选择。

对西方开放？

当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增大时，西方的舆论并没有采取隔岸观火或者幸灾乐祸的态度。相反，新闻界的主要报刊都对事态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这一定使中国持不同见解的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感到吃惊了。他们看到、中国人不能到"苏联人民"那里去寻求支持，倒是应该在"世界人民"当中，

甚至到帝国主义的西方那里去争取援助。那些国家的形势，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支持中国的舆论与其说是几个小小的毛主义团体鼓动起来的，还不如说是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们鼓动起来的。

看来，中国人确实应该试探一下，看看西方是否仍打算同中国保持距离，任其孤立。中国与西欧各国没有重大的分歧；在戴高乐的坚持下，欧洲共同体已经努力争取更加独立于美国。就连美国自身也不必坚持"等着瞧"的政策。前几个月，报纸上的评论已经明显地表示了对中国的同情。无论如何，建立两国之间的对话，看来是有足够的理由了。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当然还为时过早，因为美国仍在台湾和印度支那驻有军队。但即使是在那些地方，某些撤军的迹象也已依稀可见。现在，中国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分子已经从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机构中被清除出去了。如果中国努力摆脱自己的孤立处境，那么，军事行动对苏联的吸引力就会开始大大减小。正是为此，周恩来和他的支持者们才想在外交正策上试试运气，而不愿意支持林彪和他一伙的耗费资财的军备竞赛。

二十一、国内纷争的继续

军 与 党

显然，在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对中国的内部关系不是没有影响的。面临战争威胁这样一个危机，产生了对立的两派意见。第一派暂时只想达到其军事和半军事目标：比如训练民兵，这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开始松懈了；还有大规模征兵，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的动乱阶段，这项工作实际上停止了。与此相反，第二派则主张，进一步集中精力于非军事目标上：迅速全面恢复生产，补足耗尽的储备，以及加强行政管理，这在当时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军队的无所不入，人们也有反感，尤其是在那些军队还没有成功地应用他们的"领导方式"的部门。人们指责他们搞"命令主义"：他们在完全可以采取更为恰当的同志式的方式时，却对下属发号施令；他们不是解疙瘩，而是一刀斩断，有时比党的作法要僵硬得多，而且不肯让步。

1969年秋，由于两种对立的运动在有效地同时进行，这些问题曾几度变得尤为紧迫。一个运动是让平民百姓效仿军队的"四好连队"。但在搞这个运动的同时，那种工作作风却在军队内部受到了强烈的攻击。有人告诫要防止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复苏，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反对这些主义的建议。

在新的党组织内，也有这种争论。文革以来，只有军队里的党支部幸免于难。但是现在，新的、独立的党组织又建立起来了，其首要地位已由北京的领导反复阐明了。1970年2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刊载了一篇典型性的报道，表扬一些人民解放军在党委中的代表，说他们尽管有不同意见，仍贯彻执行了党的决议。这类文章在1970年间以各种形式持续不断地出现，这暗示着要让军官们接受文职党员的指令是多么困难。说到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难道还没有表明党有蜕化变质的趋势吗?难道还没有证明军队是毛主义的最坚强的支持者吗?为什么要允许旧景重现?另一个引起争辩的现象是，许多过去的党员干部又出现在新的组织机构里，并且严重错误总是新干部犯的。又有人争辩说，由于战争的威胁，应该继续实行一段时间半军事管制。实际上，相当多的军官不肯轻易地把领导权交给党的代表。自然，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经济动乱也被那些赞同暂时实行半军事管制的人用来作为有力的论据，因为人们已经看到半军事管制在国家备战状态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关于生产上的损失和储备的耗费还没有任何报道，但是毫无疑问，损失和耗费是有的，并且很可能在继续。让工业计划再次上马，补上生产的欠债，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但是农业的机制就微妙得多了：一次播种不好，或田间管理不当，其后果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农业形势的不妙还因暂时的恶劣天气而加剧。耐人寻味的是，在林彪的九大政治报告里，那些以往对于经济乐观的章节不见了。

思想领域里斗争的继续

与此同时，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革命同时还要增加生产的群众运动，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又开始了。从 1967 年初开始，人们就往往面对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不是继续搞革命而耽误生产，就是强调生产而耽误革命。有人曾努力表明：前者是"极左"倾向，后者是"极右"倾向，反对革命和生产都是错误的。青年工人中的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习惯于动乱时期相对的自由散漫了。现在，往往会因为纪律松懈（迟到或旷工）或采取对抗领导态度的作法（过去曾被反对权威的口号证明是完全合理的）而妨害生产。持续进行"抓革命、促生产"的运动说明了以上问题的普遍性。

广泛地下放权力，是控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经济恶果的另一个措施。地方的财力增长到 20 年来如此之高的水平，以至于要求公社、地区和省首先要力争自行解决他们的金融问题，而不要求助于中央政府给予解决。大规模的计划已制定下来了，以便地方政府能够比较容易地解决困难。这些计划之一就是更为平均地向各地输送训练有素的干部。由于过去合格的年轻人都想离开农村地区，所以那里的人民群龙无首，现在，情形颠倒了过来。然而，这却无法阻止另一场反对带有极左倾向较为年轻的干部的激烈运动，那些年轻干部在 1968 年以后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大笔一挥就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右派"倾向也同样受到阻止。思想

学习进入大众生活，成为反对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的有力措施；人们还用简化手续来反对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用轮换制来反对"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根据轮换制，三分之一的革委会成员处于领导岗位，三分之一的人处理日常工作，另外三分之一则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学习一段时间。

1969 年 11 月 5 日，《人民日报》以《注意工作方法》为题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为防止官僚主义复活，提出了 12 条措施，大致是：

1.抓好带头人的思想工作，抓领导班子的革命化。
2.抓点，取得第一手材料。要弄清政策。
3.抓三分之一，再及其余。
4.要考虑全局，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
5.要考虑群众，听取各种意见，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支持。
6.领导和群众直接见面，不要圈子搞得那么小，不要仅仅满足于层层听汇报。
7.8.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讲用会。
9.少而精。会议、文件和报表要大大精简。
10.留有余地。打仗要有预备队，不留一点回旋余地，容易使自己被动。
11.劳逸结合。既要紧张，又要从容。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
12.讲究实效。要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工作。不要做表面文章。

显然，这篇文章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学习的，这样就

会使以上列举的问题清楚地展现在广大人民面前。同时，那些本不应发生的事情和“左派”在宣传机构中的严重失误也就昭然若揭了，在这个问题上，九届二中全会将会有一番激烈的争辩。

革命委员会——就象军事委员会一样，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来改进“工作作风”，使其更为民主，更有效率。但他们面临着上下夹击的困境。一方面，象军代表（实际上他们在革委会里已占有相当多的席位）那样，他们必须接受新的党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着基层干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难以号令下属。恢复“安定团结”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在各省的年轻人中，大量的极左因素仍旧存在。

在一些农村地区，极左分子的专横行为仍然持续不减。比如，在太原，这个具有2400年历史的山西省省会，一支编制完整的突击队仍在同类似的组织进行武斗，并且与当局对抗。那里的局势如此严重，党中央不得不再次干涉。1969年7月23或24日，中央颁布了一条法令，清楚地点明了山西和其他地方的问题的严重性——指得这样清楚，在此最好抄引一下。

> 如同全国其他省市，山西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但是太原市以及山西中部和南部其他两个地方，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混入了各种群众组织，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把群众中的一部分引入歧途，使他们拒不执行领导发布下去的命令、指示、通知和法令。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这些人曾经：
>
> 1.组织武装别动队，打人，捣毁、偷窃并抢劫

财物，还扣押人财，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破坏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纪律……

2.拒不执行革命大联合与革命三结合总部制定的政策……

3.冲击人民解放军的单位和组织，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和装备，殴打、绑架、打死和打伤解放军指战员。

4.毁坏铁路、公路和桥梁；武装袭击火车，抢夺运输物资；偷窃旅客财物，严重地危及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5.强行占领国家银行、仓库和商店；私自设立银行，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6.使用武力占据地盘；建立武装斗争根据地；搞反革命兼并；任意践踏人民群众；欺骗和敲诈人民群众的钱粮……

7.煽动并威胁工人，让他们停止生产，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①

在九大结束以后很久，甚至在二中全会之后，仍然还有关于臭名昭著的“5·16”组织残余继续活动的报告，其活动形式甚至是打游击。

然而，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思想混乱。九大之后，在中国有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即把所有左倾分子都划归为“5·16阴谋集团”的成员；否则就索性把他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那样就会使人们相信，他们就是“蒋介石的代理人”，

---

① 此段引文系据英文直译——译者

或是普通罪犯——普通罪犯也会被说成是“蒋介石的代理人”。于是往往很难辨明所获得的消息是否可靠。但是，指责极左集团中混入普通罪犯和台湾特务，大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证明之一是，困难的局势总是持续在那些历来特务活动最猖獗的省份，比如与香港相连的广东，还有和缅甸接壤的云南——过去蒋介石的部队曾从那里撤到缅甸，至今还在活动。

然而，随着安定团结的发展，过激行动在减少，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只有一方面例外，那就是政权。只有在党的重建与恢复工作彻底完成之后，才有可能谈到形势的“正常化”。而现在，情况尚非如此。

二十二、重新建党的困难

部队领导担任政府要职，年轻的“左派”因行为过激而不受同事们的信任，这两种情形一直不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所赞赏。毛泽东每当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同意限制红卫兵的行动，并且允许军队随之扩大介入时，都防止了可能出现的片面情况。他的这种厌恶，在其重新建党的思想中尤为显见。虽然，国外有人说，毛泽东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完全取消党，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林彪和他的同僚们并不认为这个问题特别迫切（他们当然已经很认真地为军队扮演的政治角色做好了准备），而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却认为问题迫在眉睫。当毛泽东 1967 年 9 月谈到重新建党的必要性时，周恩来就已经在为军队从 1 月份以来在党、政、军内实行“一元化领导”而担忧了。菲利普·布里奇哈曼引用过有关陈述，但他又补充说，让新的党组织负起领导责任，直到忠于毛主义的人能够控制住这些组织，这种作法显然只是权宜之计。在当时，很多地方连这一步都做不到，而且新的革命组织往往处于大权旁落、受控于“右派”势力的危险之中，正是为此，重新建党的工作进行得小心翼翼，党高于其他任何组织的主导地位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

在 1968 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党的基层组织在一些地方开始恢复，但步子迈得很小。1969 年 4 月九大召开以后，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得到了鼓励。虽然，林彪的政治报告

关于党的内容甚多，而关于党组织重建则甚少。但在九届一中全会之后，形势就倒转过来了。

在纪念建党 48 周年之时，若干条新的政策制定出来了。这些政策很可能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商定的。同时，三家主要报纸联合发表社论，比以往更加直率地谈论新的党委应当如何组建。这时，重新建党的工作才真正开始。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吸收新党员。文化大革命前夕，党员的人数大约是 2000 万，或者说几乎是中国人口的 3%。完全有理由猜想到，这些党员中很大一部分在文革中已经决定退出政治舞台，在运动结束后也不再恢复党籍。所以党才要从人民中吸收新鲜血液。大量的新党员，从那些没有卷入过政治活动的年纪较大的农民和工人中，从中学生、军人、红卫兵、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吸收进来。当然，入党的严格规定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新党章关于党员条件的规定如下：

第一条：年满 18 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 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 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许多地方，第一批领导“核心”是由没有挨批的老干部、从革命委员会中提拔上来的新人物和大量来自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人组成的。这些领导“核心”负责吸收新党员。党员总数满额后，重建的党支部便可建议成立党委？党委将领导并代表所在的基层单位（生产或居住单位，教育机构或军队里的师）。这些建议再经过上级领导的讨论，同意后，党委就正式成立了。党组织就是这样从基层重新建立起来。基层党委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立，很快，最初的关于成立党委的报道传到了国外。大约半年后，更高一级的党组织才成立。形势已经变得很清楚，建党工作进展很慢，遇到了许多严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来自军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分歧，也来自恢复新老之间、“左派和右派”之间团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尽力好自为之，但也有一些左倾分子反对自己所不赞成的一切事和所有人。

形势愈来愈明朗，在进一步重新建党的路途上有各种各样难以解决的矛盾，人们在努力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以期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970年6、7月，报纸上越来越多地提到为成立新党委而开办的学习班。首先，在学习班，各个小组将获得机会，再次发表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下

一步的讨论中还会得到阐明。其次，这些学习班还起某种小组训导的作用；在学习班，所有的看法都将摆在军代表（往往是由一位总政治部的特殊军官担任）的面前。最后，这些学习班使得不同意见能够和“共同目标”联系起来，即服从派别以外的标准：新党章，林彪的政治报告，党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讲话等。然而，很快就清楚了，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人们的政治觉悟仍然很低。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各种宣传机构虽然努力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收效甚微。问题的严重性说明，某处肯定有某种严重的弊病存在。事实上，陈伯达的统一思想意识的宣传机构，在试图将文化大革命提到更高的政治斗争水平的努力显然是失败了。如今，陈伯达控制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左的教条主义之冠——不得不再次对搞派性的人进行轰炸了。1970 年 7 月 2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奋斗》的文章，署名是“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以下引文很能说明问题：

> 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地做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党内矛盾的辩证法还缺乏理解，不够自觉。他们认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应当“纯”。而又“纯”。这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糊涂观念。……
>
> 有少数人，在整党中违背毛主席关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原则，是同他们个人第一主义的立场分不开的。我们遇见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对待跟自己不同意见的党员，采取“一批、二斗、三搞臭”的错误作法，想通过整党发展一派一人之

"私"。这样的人，他们把个人和党的关系摆得不对，"老子天下第一"的迷信甚浓。他们的出发点不对，方针也就必定错误。他们口头上喊的是"吐故纳新"，实际上想的是"吐疏纳亲"，按照他们小团体的标准"吐一批，纳一批"。……

第八章

九届二中全会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

二十三、九届二中全会公报

1970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这个会是在前两个星期中秘密召开的。公报提到了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并为近期提出了宏大的计划，但却没有提到那些肯定还存在着的深刻的意见分歧；故作姿态的团结，仍因社会上的矛盾而不够稳定。在象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定期的全会可能相当重要。一旦根深蒂固的不同意见出现，就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领导们将分成人数相接近的两派，各持不同意见，并受到相应的党组织在程度上接近的支持。于是，政治工作的重心便迅速地移到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上来，用以解决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问题。第二，事态仍持续混乱不清，这样，全会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只是简单地通过一下上级领导做出的决定，而且还要决定即将采取的政策。

第二种情况肯定在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尽管公报的陈词套话给人一种团结的错觉。然而，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公报中的一些细节还是可靠的，比如，会议持续的时间和发表公报的日期。这次全会历时甚长，是10年来最长的一次，而且公报在9月9日晚才公布。根据公报，全会是从8月23日开始，9月6日结束的。

公报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没有提到会议期间的工作分配。所提到的只是有155名（自177名中）委员和100名

(自 109 名中）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公报还提到，毛泽东主持会议，林彪做了讲话。

全会的议事日程没有提，但是从公报的论点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实际上讨论了哪些问题。在公报的前言部分提到了若干运动的成就。

对《国际形势》的评论是这样的：

> 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庄严号召下，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

下面是军事上的敌对力量，依重要性排列为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其他各国反动派。这一次序意味深长，因为它反映了林彪本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公报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公报对经济问题做了如下论述：

>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八年丰收，今年也丰收在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也很快。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蓬勃展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全国物价稳

定，市场繁荣。整个经济战线形势很好。

这段话说得显然十分乐观。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量困难之后才取得的。然而，这一点并不是中央委员们讨论的问题，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与其相关的后果。根据后来发表的材料判断，在二中全会上很可能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意见。一派是由极端分子所组成，陈伯达最可能是他们的主要代言人。陈对农业改造在思想意识上具有形成力。他的观点是无论何时出现困难，改造的速度都不该放慢；恰恰相反，他倾向于加快改造的速度。他主张以更为全面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形式，使收入进一步平等，权力进一步下放——简言之，要加强国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一派人的意见在公报中得到了如下的反映：

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70*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①

然而在这最后一段中，强调的重点不知不觉地移到了第二种较为温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即周恩来在政府里的同

① 引文括号中语为原引文所漏；语序有误，末一句应前移。——译者

事们的方式，他们认为国内形势无需采取极端措施，会自动好转，而且中央的计划性还应该加强。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的对头是李先念，李自 1958 年以来就担任财政部长之职。

除了经济问题外，国内形势的另一个方面——政治关系也引起了不同意见。这主要是与恢复民主集中制有关，并且涉及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群众组织之间、军队和党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军队和党之间的确存在着某些方面的摩擦，这在以林彪和周恩来为首的最高领导层中有不同方式的反映。军队对社会各阶层的介入，使其已经发展成为与政府平行的统治机构，从而部分地摆脱了政治领导。正是为此，才一定要加速重新建党的工作，进一步重申“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条原则。

重新建党的另一障碍是陈伯达的宣传机构工作失利造成的：左倾的先验论和教条主义阴魂不散，妨碍了国家安定团结的恢复。对此，公报说：

> 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二十四、修改宪法的方案

公报中还有以下相当重要的一段:

> 全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①

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段中最后一部分的用词是在最后时刻替换上去的，用以含混本来打算明确宣告的计划。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不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四届人大将接受的新宪法草案。这个草案肯定曾引起了对于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而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弄得不可收拾。很有可能正是这个问题，先后导致周恩来和毛泽东对陈伯达进行严厉的批判，从而开始引起对林彪的不信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机构，在正常情况

---

① 引文语序有误，自"全会认为"以下两句应前移。——译者

下是由人民间接普选产生的。共产党草拟的决定，实际上都为一般的代表机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并由政府的行政部门来执行。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思想最先进的分子组成，而人民代表大会却代表一切被党认为不反对革命的人中的各个阶层。无论如何，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形式上的重要性。为此，全国各地的人民都期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更确切地说，在党的九大结束后不久，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做好必要的安排之后，便召开四届人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做的一些决议将会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刘少奇开除出党，这意味着他的国家主席职务已名存实亡，但这项决议还必须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共和国主席”并不是党的职务。

然而，人们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在公报上只剩下简短的、措辞含糊的那一句话。显然，在计划的最后时刻，在某个问题上出现了麻烦。但这是什么问题呢？当然，二中全会也可能不急于处理那个问题，而宁愿先着于重新建党的工作。但是，看来更有可能的还是在两个最为重要的必须做出的决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一是宪法问题，二是国家主席的继承人问题。

现行的宪法是在1954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它主要是依据若干西欧议会民主的思想观念（公民自由等）和东欧人民民主的思想观念（共产主义的政府形式等）制定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已经削弱了宪法里的大量先决条件：不是否定其政治内容，就是索性公开违反某些条文。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二中全会之前的一段时期，就传说在党内正传阅着新宪法草案。蒋介石的情报机构也上报有这样一个草案，他们很可能是在广东和云南窃

取到的。1970年末，有人还拿出一份文本（不可轻易全信）来证实这些传闻，并声称文本中的宪法草案已经被二中全会采纳了。此声称不乏证明，最明显的是其中的一些套话出现在随后几个月中印发的省级文件里。毕竟，台湾曾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成功地公布过中共的新党章。埃德加·斯诺，至今仍不失为外国人中最可靠的消息来源者之一，也曾断定有好几种草案在传阅。一般都认为二中全会确实讨论了修改宪法的方案。

正如1954年的宪法一样，这个草案也含有一篇序言和四个部分。序言总结了过去发生的事件，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好处和毛泽东的作用。最后，序言中还有专门关于国际关系的一段。在1954年的宪法里，相应的一段是这样的：

> 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见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

在新宪法里是这样讲述的：

>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基本原则。重要的改变在第一条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不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用这个套语的意图是要表明中国已经

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了避免误解，“依靠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加上括号，塞了进来。很有可能这是在二中全会上增加的，因为这是全文中唯一放在括号里的短语。显然，有人担心对这一段会产生误解，尤其是被林彪这样的人误解。另一句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进一步阐明了新的形势。意图很明白：一些左倾分子，比如陈伯达，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阶段已经开始了。

另一段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肯定曾引起过争论的文字是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在老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若干种私有财产的形式和许多私人收入的途径是受到国家尊重的。一些左倾分子，很可能又是陈伯达，一向坚持认为，在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个人剥削的形式都应予以取缔。这个观点看来仍有很强的反对意见，认为这种作法为时尚早。下面的话很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观点而来的：“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宪法修改草案的第二部分象以前一样，含有一段对国家机构的概论，但比起前一部宪法来，论述得不那么广泛。关于革命委员会的那一段特别显著——不是因为自1954年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是因为有些情况还没有变。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出现的，它取代了党，因为当时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它行使行政权力，因为那时政府机构已经无法正常行使其职权了。文化大革命后将会怎样，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党会被取消吗？会从革命委员会中重新建立党组织吗？革委会的双重职能会继续存在吗？我们已经看到党组织正在重建之中，但是还只字未提

革命委员会的命运。实际上，革命委员会的职能与过去的地方"人民委员会"的职能相同。换言之，革命委员会变成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领导的普通的执行和管理机构了。其职权范围和"人民委员会"几乎是同样的，只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即革委会就象巴黎公社一样，会遭到取缔。

宪法修改方案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老宪法这一部分很长，因为它保留了西方的传统程式。

最后，第四部分涉及国旗、国徽和首都，没有什么重要变化。整个文件在相当程度上简化和压缩了，原来的106条，现在只剩下30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关于国家机构的第二部分现在只包括四个小部分，而以前是五个小部分，删掉的那一部分与国家主席有关。在这一删节背后，隐藏着九届二中全会的重头戏和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关键。

二十五、陈伯达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阴谋

陈伯达的花招

令人吃惊的是，当前这种困难局面竟是由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造成的，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加紧为四届人大做准备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主席的问题。党中央当然已经先考虑过这件事了。最明确的解决方法是让毛泽东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但这个方案有严重的不利之处。首先，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正如他多次明确地表示过的那样。就林彪来说，在毛泽东去世后，他的任何权力扩张，都会毫无疑问地遭到反对。林彪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立即得到解决，以确立和保证他的地位——即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如同党章中规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一样。但是很少有人认为林彪是个合适的人选。当时，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为各派所接受并能够医治文化大革命创伤的候选人，而林彪不能真正做到站在各派不同利益之上。事实上，经过一番考虑，这个问题看来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党中央本身必须考虑这件事，而且林彪提交了一份修改宪法的草案。然而，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关于国家主席的内容，这很可能是事先和毛泽东商定的。在后来让委员们传阅的文件中，也没有关于国家主席的内容。然而，在现在的这份文件中有好几处都明确地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并总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含义是明确的。毛泽东后来

批评这几段文字时，声称是林彪自己加上去的，并且在散发出去之前没有给他过目。然而，当时并没有追查动机——至少没有公开这样做。可是当有人在二中全会上发难，要立即解决国家主席的问题，并迫切要求毛泽东接受此职时，对策就要变了。初看上去，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不过是向他表示敬仰的另一种方式而已，而且根据关于此事的那些众说不一的传闻，很难判明在二中全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一种说法，阴谋的主角是陈伯达。据说他曾要求在会上发言，并就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表了看来是未经准备的讲话。他的地位当然会使其听众聚精会神。然后，他“自发地”提议让毛泽东来担任国家主席之职，这样便可以将毛主席置于困境。提名由毛泽东当主席，就会自然而然地将林彪推上副主席的高位，即使有其他候选人，林彪也仍会是第一人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义，更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但对于林彪来说就大不一样了。恰恰相反，他当国家副主席将会破坏在文革的动乱后好不容易才达成的权力平衡。国家主席可不仅是个代表性的人物，他掌有全国最重大的决策权。当时仍旧有效的1954年的宪法是这样规定国家主席职权范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与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如果毛泽东去世，林彪就会成为党的主席，并且继续担任军队总司令，那么，任何反对都将无济于事。而要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林彪的地位还不够高。如果说毛泽东曾在是否接受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那么现在他对副主席的问题却拿定主意了。在迅速地协商之后，毛泽东坚决地驳回了那个建议。同时他一定曾纳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伯达这样专横地不顾他的反对，提出了那个建议，而且其方式是想让那建议一定能在欢呼声中通过。陈伯达是否想要将权力转移到主张强硬路线的林彪手中，以便加强他自己的激进派势力，削弱周恩来的温和派势力？他此举是出于善意，还是怀有阴谋？不管怎样解释，他显然已经使自己陷于困境，使人想到一个小人，对于自己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宣称自己是“百分之一百一十”的忠诚。或许他只是个隐藏在革命口号后面的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其结果是陈伯达受到了全面批判。他的全部政治生涯都被仔细审查了一遍，从而引起委员们指责他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极左倾向。作为宣传机构的领导，他还受到批判，为没有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从而妨碍了恢复安定团结和重新建党的工作负有主要责任。在二中全会期间，至迟不过会议结束后一星期，他终于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位。显然，这意味着他原来所掌握的宣传大权也随之旁落。在此后不久开展的一场纠正错误观念的深入的思想教育运动中，他非但不是运动的组织者，而且还成了批判的对象。他的名字与那个据说他曾与之进行过最坚决斗争的人联系了起来：他被说成是“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

林彪在搞宗派吗？

林彪仍处于挨批范围之外，尽管很可能有些人怀疑他在幕后怂恿陈伯达提出那个野心勃勃的建议；此时，他还未受指责。然而，令人注目的是，他坚持反对罢免陈伯达时间最久，好几个月以后他才勉强接受了。他在全会中的态度也激怒了一些温和派成员。更糟糕的是，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能力和用心了。林彪在全会中总是和其亲信凑在一起，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无论是争论战略关系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外交政策问题，经济形势问题，还是权力分配问题，林彪的小组总是在讨论和表决前就意见一致了。据说他们对改变原会议议程，使陈伯达能够在新的议事日程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负有责任。这些行为在后来指责他们搞宗派时都将提到。甚至可以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林彪和他的支持者们就已经偷偷地通读和讨论过那些问题了。

进而言之，还有重新组建国防部的问题。国外有消息说，林彪曾提出要完全重新组建他的部，就象其他一些已经重新组建起来的部一样。但他不是要精简机构，而很可能要以战争的威胁为借口，提出扩大机构的方案，在国防部下面增设一些部门，这样就可以使其成为与非军事的政府机构完全平行的组织了。过去这种平行的组织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此发端虽未成功，却引起了怀疑。这是否表明林彪打算把国家的中心角色确实无误地移交给军队，让军队再次扮演文革中的那种角色？

宗派的形成

根基上的裂缝现在已发展到房顶上了。虽然中共九大是在安定团结的旗帜下召开的，但在基层却很难这样宣称。摆在领导面前的难题是，在日常工作中激进分子与温和派无法和解，而且这种持续的紧张局面的原因也颇为费解。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想到非白即黑，决无不同浓淡的灰色。考虑到这些细微差别，一些"率直"的文革分子显然担心会失去其显要的地位，这种担心也出现在常委会和政治局里，而且势将决定最高领导层内剩下的四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康生的立场从来不明朗，多次长时期的缺席使人们怀疑他是否降级或下台了，但更有理由认为他病了很久。此时，他的作用很小。

毛泽东处于诸事纷纭之中。他的地位卓然突出，他高居各派之上，只是在"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时才积极介入。

毛泽东之下紧接着就是林彪。林自从飞黄腾达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代理人后，已经开始熟悉自己的新地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利用他的中央部队组织不断地保护激进分子的优势。

周恩来，在另一方面是个十足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能够当激进派跟随毛泽东的幻想前进，也能够当组织者帮助实现文革计划。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毫不走样地执行计划看来不可能，他就会修改计划。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运动在正确的道路上进展，防止过激行动

(林彪和陈伯达常常挑起过激行动)。林彪和陈伯达的作法清楚地表明，他们担心周恩来，虽然在一中全会上周的作用不大，但现在却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对手。陈伯达在政治局里地位最低，因而更加需要发动攻击，但他瞄得太高了。可林彪仍旧强大，足以保护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央军队组织。

共产党领导内部隐蔽的动机把各派成员团结得更紧密了，各派的区别也更明显了。常委会的成员努力加强与政治局里的支持者们的联系，反之亦然。形势显然很不稳定，人们在为终将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可能并非每个人都在同样程度上意识到了事态发展的方向，以及形势的严重性。于是，以各种团体为基础的派别逐渐开始明朗化。只要有适当的时机，某一派就有可能扩大成为一个宗派。寻求相互支持当然不一定就会导致形成宗派，那也是由形势的需要和团体的类型所决定的。比如，周恩来从地方部队司令员中也得到支持，尽管他现在不再真正需要这种支持了，他正在缓慢地但却是稳定地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唯一真正形成宗派的是那些围绕着林彪的人。

在此，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中国政治领导中各派的种类是十分有用的。大致说来，这些团体可分为三类：以政治见解和政治类型为基础的团体，以组织机构上的门户为基础的团体，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团体。换句话说，就是客观的、半客观的和主观的团体。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不同类型的团体的重要性也是按此次序排列的，但是在二中全会后那种情况下，各类团体都趋于同样重要。

就政治见解团体而言，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差别在目前的情况下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此时已没有

正式的右派了，因为他们已经被消除了。温和的左派、激进的左派和极端的左派之间的差别在当前也不大值得一提。比如，那些偏右的人往往会“坚定地”站在左边以补偿一下。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试图给那些人贴政治标签是极为不明智的；如果只是看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不同意见的比例，那倒是明智得多。政治类型上的差别确实能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比如，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的政治行为就可以以各自的特点分为机敏或刻板，圆通或鲁莽，民主或专权。重要性居第二位的团体是以组织机构上的门户为基础的，它包含利益上的认同和权力机构中的共同基础。以共青团和工会为例，他们是在文革前夕建立的，是附属于党组织的重要团体。政府机构也产生同样的影响，尽管他们划分为不同的战线：农业、工业、财政和国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的数量增加了，比如产生了革命委员会，一些人的利益和地位就在其中。另一种组织机构的门户是由各自同中央政权或省政权的密切程度形成的。有些是明显地代表某一地区的利益——此乃中国的一个重要传统，在文革动乱中就更为重要了，这对军队派别中划分势力范围尤其关键。

重要性居第三的团体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们性格相似或情投意合，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曾长期在一起愉快地工作。家庭关系可能重要，但婚姻关系比父子关系更为重要。有些中国领导人年轻时投身革命，结婚较晚，另外一些人将自己的爱人带入政界。还有以共同学习过的地方为基础的门户（比如黄埔军校，20 年代周恩来曾在那里当政治部主任）。一同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也可以巩固个人关系（比如，周恩来和陈毅都在法国学习过），正如同

乡也能起到这个作用一样。在蒋介石统辖的“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人和在“红区”工作的人，在不同的野战军作过战的人，都各有不同的观念与利益。

这些以及类似的门户往往经久不倒，研究这些门户派系是中国事物观察家们和北京学者们乐于从事的一项工作。这些人有时过高地估计了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忽视它在二中全会那种形势下的重要性也是愚蠢的。

第 九 章

毛主义者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反对毛主义者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那些呼毛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象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三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我（按：指斯诺）没有受这一套的骗是对的。

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1970 年 12 月

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

二十六、个人崇拜和极左教条

在批判陈伯达的运动中，“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含义比以往更有所指了。作为党的极左派理论家，他的上升和下降都与他当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主编密不可分。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一场批判极左的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也批判对毛泽东的过分崇拜。毛泽东本人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有些暧昧。在某些情况下，他认为个人崇拜是不可避免的弊病，而有时又认为它是阳奉阴违的原因，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在50年代他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就持有保留意见，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给斯大林“拍马”的赫鲁晓夫有资格来批判个人崇拜。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意识到只有依靠、运用他的个人威望，才可能捍卫革命的原则，扭转修正主义倾向，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最强大的党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0日[①]同埃德加·斯诺的那次著名谈话中详细地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

> 我们议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曾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此外，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因为我写

① 应为12月18日。——译者

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于是，他说我写过关于中国的"个人崇拜"又怎么样？确有其事嘛。为什么不写写呢？这是事实……毛继续说，在我们 *1965* 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当然个人崇拜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毛泽东在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使我们想到文革前后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态度。首先是陆定一，"修正主义的"文化部长和党内负责宣传的领导人。他曾强烈反对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那时正值毛主义者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1965 年秋，他反中国的潮流而动，同刘少奇一起支持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批判。六个月之后，他为此而倒台。陶铸在 1967 年初便被撤职了，并由陈伯达来接替其职务。陈伯达又把宣传机器的大量实际工作交给了王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便扩大了。王力的倒台并没有使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在陈伯达领导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在继续。

负责宣传的主要领导人在工作上这种不断的偏差，原因

之一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先验论（不是唯物主义）既导致左倾，又导致右倾，因而两者往往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些倾向还被认为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习惯。在反对刘少奇的运动中批判过他的“自我修养”观点，说那是受了孔夫子思想的影响，是在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重要概念。轮到陈伯达时，他的论述老子哲学的文章，以及论人性、党性和个性都受到了批判。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需要之时，刘少奇反对它；而当这种崇拜可能会发展成为危险的形势时，陈伯达提倡它。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先验论的迹象。

陈伯达在文革后期企图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但未获成功，这造成了双重的偏差。第一，他的方法不但无助于进一步理解其激进化的先后过程，反倒因为过激而使其过程变得毫无意义，这在思想上不断增加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中都有所反映。第二，由于个人崇拜搞得过火，产生了各种不好的副作用。将毛泽东抬到半人半神的高位，使毛泽东脱离了群众。后来据说陈伯达和林彪是有意这样做的，以便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这种“造神”活动也趋于扩大到其他领导人身上，比如林彪。然而，在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反倒使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再发展了。毛泽东的功绩恢复到比较实际的比例，这一点看一看《北京周报》上的半年文章标题索引就可以知晓——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六至七部分减至两部分。特设的毛主席语录摘要也取消了，在文章内容以外引用的毛主席的话也大大减少了。毛主席像在报刊中和公共建筑里都急剧减少。学习《毛主席语录》一类的形式主义活动开始从人们生活中渐渐消失。

新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开始大规模出版发行……出版界曾因飞速增加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而大受其苦。

不足为怪，形势的发展变化使一些人摸不着头脑。许多基层党员只知道上面出了事，但是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注意到在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冲突，陈伯达被撤职了，而且陈因"形左实右"而受到批判。但只是在较晚些时候一般人才形成这种看法，大家最初对这个问题都缺乏认识。过去的政治运动很少只涉及一个人，特别是近来的运动，结束时涉及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比开始时多，这种可能性简直难以想象。目前运动的发展方向，看来只好是批判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了。首先，这就可能把矛头指向康生。其次，江青和她的同事也可以和陈伯达联系起来。有一段时期，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左派潮流"最突出的倡导者。但她由于是毛泽东的夫人，不大可能会受到清洗，而且不管怎样，她和她的同事们毕竟较早地退出了过激行动。有些迹象表明她曾因同一些红卫兵组织的联系而受到批评，但这不足以动摇她的地位。

运动也可能朝着针对中央部队机关的方向发展。过去，陈伯达的最亲密的同事曾试图利用头脑发胀的极左派来达到国内外的一些政治目的，林彪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也曾利用过类似的势力来加强中央部队机关的权力。人们现在认识到了陈伯达在那时的个人作用。他的倒台同五·一六运动不无关系，因而当时人们都在猜测对五·一六运动的重新评价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二十七、加强周恩来的地位

再次争论"5·16"的问题，评判其意义，不应忘记周恩来曾在平息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一开始，他无形中在极端派、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冲突中起过催化剂的作用。他同一些地方部队司令员一道，成了极左分子"不负责任"的攻击目标。为阻挡极左分子的进攻，环绕着周恩来组成了一个联盟——成员首先是地方部队司令员，其次是文革小组中的海派。他总是说，出现偏差责任主要在上级领导，而不在基层工人身上。"5·16"问题的责任在陈伯达倒台时再次提起，在后来也一直是令人关注的事情。毛泽东在1967年8月同埃德加·斯诺交谈时曾泛论过"左派"的问题。斯诺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外关系恶化问题的谈话，报道说："……那些反对我在1967年和1968年重访中国的官员都是属于一个极左集团的，这个集团曾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都早就被全部清除了。"关于用武力反对"修正主义军人"这个问题，斯诺写道：

>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冲突发展成了打派仗——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话，是真的，武斗。主席很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

这次谈话很受重视，尤其是在北京，非常引人注目。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77岁生日之际，《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载了这次谈话，还刊登了一张两人谈话的照片，所附文字说明他们在讨论“最重要”的事情①。12月初，斯诺在和周恩来、毛泽东会谈期间，给新创刊的法文报纸《新中国》发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含义模糊的话：“此时创刊，时机选得合适，因为即将来临的一年看来是格外有趣的。”

只是在事后，人们才明白他为什么对将发生的事如此有把握。突然再次提起五·一六事件，意味着埋藏在领导人中的定时炸弹即将爆炸。这件事在澳大利亚记者威尔福雷德·贝却敌访问北京回国后变得更加清楚了。5月24日，他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标题是《反对毛泽东的阴谋》。我们可以认为，贝却敌的话大部分来自“消息灵通人士”。在谈到“5·16”阴谋时，贝却敌写道：“有些极左分子伪装得如此之好，以致能够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人。”看来这显然是指陈伯达，但令人吃惊的是，他提到“有些”——那么，他们是谁呢？贝却敌引用提供情况人的话写道：“已经知道阴谋的头子是谁了，时机到来时他们的名字无疑将要公布于众，而且他们已不再处于能够闹事的位置上了。”7月，其他类似的文章也发表了。最重要的一篇是法籍波兰记者K·S·卡罗尔写的，他是一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他说：“对五·一六运动的调查根本没有结束，因为未能证实谁是高级领导，谁曾控制过它。”

① 查无此照。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倒是登过毛泽东、斯诺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译者

再次追查五·一六事件，使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领导人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再次分道扬镳。一场大规模的批判极左的运动在基层开展起来了。这场运动不仅针对那些仍在试图通过暴力达到目标的人，同时也针对那些试图采取其他方式达到同一目标的人。下面的报道可以表明一些红卫兵组织仍决心坚持其传统的斗争方式。1970 年 3 月，曾有人企图在周恩来总理驱车去北京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路上谋害周总理，但失败了（这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柬埔寨宫廷政变之后）。还有些报道说，在其他一些地方出现了企图闹分裂的现象。另据一些报道，一个 26 人的红卫兵团伙因暗杀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而受审。同时，1967 年 8 月的事件在各地又成了重新评价的话题。威廉·享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报道（他的消息来源是录音磁带），那是关于 1971 年 3 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群众批判大会。挨批的人是著名的最早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他是 1968 年打派仗的煽动者，与五·一六运动有密切关系。

李某的 16 岁的女儿站在舞台中央，面对数千名与会者，毫无惧色和羞怯——

"是你，蒯大富，当我父亲在玉米地边站岗的时候，夺去了他的生命！是你和罪恶的'5·16'集团干的！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一看见父亲的像片，就好象他还站在我面前，跟我讲解放前我们的悲惨家史；他好象在干了一天活儿之后，都深更半夜了，还坐在那里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还象国庆节那天那样站在天安门广场，等候毛主席检阅。在我的耳朵中，回荡着父亲的声音。在我的眼前，闪动着父亲的面庞。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

满。"

会场后面传来一个女学生尖利的喊声："蒯大富，你欠工人阶级一笔血债！"

紧跟着，从每一个与会者的喉咙里发出了雷霆般的吼声："蒯大富，你欠工人阶级一笔血债，一笔血债！"

"但是，当我想起父亲是为革命而战斗，为人民而牺牲时，我擦干了眼泪，又坚强了起来。"小李继续说道，嗓音刺耳。"我越想就越恨'5·16'集团，它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

蒯大富坐在舞台的右侧，透过他那方架子眼镜的厚厚镜片，直盯着前方。他是唯一没有喊口号的人。他过去兵团里的两个战友坐在左边。口号越喊越多，越喊越激动，他们俩也站起身来更积极地加入进去。但是蒯大富仍旧一动不动。

"我要永远当一个忠诚的红卫兵。我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小李结束讲话时，双手高举起来。一个学生双手拿着死去的工人李某的血迹斑斑的裤子跑过来，扔在蒯大富的脸上。

"看吧，看看这条裤子！这难道还不是你罪恶的见证吗？"

"砸烂'5·16'集团！"人们喊道，"砸烂王、关、戚的狗头！"

蒯大富在他的检讨中表现了一种不露声色的缄默。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来不必费力就能显得比实际上更清白无辜（有好几次都很明显是这样），也可能是因为他了解某些情况，

使他相信形势还会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翻转过来。我们从其他一些消息来源得知，大约与此同时，林彪随从中的一些人开始准备一场“左派”反击。这次反击在几个月后遭到了失败。

同时，反对新老“5·16阴谋家”的斗争在许多地方又开始了。有报道说，1971年8月份在广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以剪除地下左派网的残余。运动的发展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直接的影响：宣布造反派有罪，有助于恢复老外交部长陈毅之职务，这样也就加强了周恩来的地位；同样，蒯大富的名誉扫地，加强了他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的对手谢富治的地位。这两位副总理的地位现在已变得十分重要：陈毅正要开展重大的外交攻势；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长，要在削弱国防部长林彪的影响上起重要作用。

随着反对极左运动的继续，林彪的地位削弱了，而许多一向与周恩来接近的军队领导人在几个月消声匿迹后，又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的明显位置。5月1日，军事委员会的三个温和派成员突然再次出现于公共场合：陈毅、聂荣臻和徐向前。现在看来，似乎批极左的运动已接近尾声，该对领导成员产生影响了。大约在同时，迈里·伯顿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如下的意见：陈伯达的下台并不是这件事的结束。

1967年“揪军内一小撮”极左运动的责任及其后果显然仍旧是一个中共领导内部潜伏的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整个有关“5、16”的问题可能还会在北京重新出现，而且更多的显要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可能会因为这个爆炸性的问题而被免职。

伯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这个组织那时还有进一步的理由要使自己时刻了解中国领导内部的关系：埃德加·斯诺应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要求，看来已同尼克松以及他的顾问基辛格建立起了对话。这种接触不仅将在国际事务中引起轰动，而且还将在国内事务中引起爆炸。

二十八、调整部队领导班子

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国家主席问题展开的阴谋活动，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五·一六事件得到重新评价——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林彪的。林彪自己无疑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尔后，他做出种种努力，以弥补他反对解除陈伯达职务的立场。1971 年 7 月 21 日，《人民日报》引用了林彪要求批判名为"小小老百姓"实为"大大野心家"的话。林彪这种嘲讽的说法实在是滑稽：他本人象陈伯达和其他极左分子一样，也是故作姿态、处处公开表示谦恭之情的。

此外，林彪的地位显然也在缓慢下降，排到周恩来的下面。与此同时，领导层还得到提示，想起林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发言中就"人性"和"天才"问题所阐述的观点，以及毛泽东的相应观点。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曾对林彪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并在私下里指出了林彪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在二中全会的一系列事件后，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一个稍大些但仍是严格限制的范围内重新回到这一题目上来：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

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但是，二中全会后林彪虽在小范围内已受到批评，公众却对此一无所知。1970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纪念日时，他依惯例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

然而，他的露面并不意味着就在此时此刻对其地位构成直接威胁的事态不复发展了。初露端倪的是，似乎二中全会刚一结束，就给军队中的党组织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监”。这一新任命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位新“总监”并非林彪嫡系；此人名叫李德生，原系安徽省军区司令兼该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作为一个独立人物，与其说他是中央军事机构的代表，不如说他是稳健的军区司令员们的代表。不错，他是在向该省“左派”提供支持后成为司令员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但是，只有他觉得有必要，他就不留情面地批评同一些左翼人物，毫不犹豫。党的九大之后不久，他曾警告该省干部的“联合会”要反对极端倾向，他说：“我们有的同志有宁‘左’勿右的想法，宁愿把人民拒之门外，不愿扩大我们的队伍，想要监督人民而不是‘解放’他们。这些同志不敢坚持原则，只是因为怕给人戴上右派的帽子。”

这样一种言论表明，任命李德生是那些想把林彪在军队中的政治影响降低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程度的军区司令部的成功。

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也主动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关于这些措施，他后来有如下说法:

>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着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
>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

他所谓"六号简报"包含什么内容，不得而知。有可能是指在二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会议的一份简报，在那次会议期间，李雪峰重提林彪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为陈伯达的提议——即毛泽东应当主席作铺垫。但我们知道，这导致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的彻底改组。司令员郑维山和李雪峰受到了严厉批判。人们认为，为做出这一决定而召开的会议（1970 年 12 月至 1971 年 1 月）对周恩来的稳健派和

林彪的激进派都是一次考验。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不久，周恩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军队对中国发生的事并不全都支持。他还说，他个人“很快”就能证实这一点。从毛泽东在12月底对斯诺讲的话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也是毛泽东全神贯注考虑的问题。根据后来逐渐得到的情报判断，林彪及其支持者显然把改组视为一次重大失利。

为削弱林彪在中央军事机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影响，还在其他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可能是作为中央领导层争夺军队控制权的隐秘斗争的结果，谢富治的公安系统逐步同军队脱钩。在军队开始积极介入文化大革命时，公安系统曾在1967年1月底隶属于军队。与此同时，各大军区的军事实力正在加强，民兵训练又一次开始，而这些都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之中断了的。

陈伯达声誉扫地也开始潜移默化地危及林彪在公众中的地位。这不仅是对陈伯达的批判牵涉到他（关于个人崇拜，为五·一六运动推波助澜），而且是围绕主席问题进行的阴谋活动的深刻含义不可能使批判仅限于陈伯达而不触及他人。那么，毛泽东对这些阴谋作何评价？

>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

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这些回合及随之而来的批判越来越逼近林彪了。1971年4月，为进一步揭批陈伯达，围绕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件，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和李雪峰（北京军区）的活动也再一次进行了调查。一个新的内容是，要求林彪集团的所有成员——林彪的夫人和秘书叶群、

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李作鹏（海军）和邱会作（总后勤部）都作自我批评。重要的是，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周恩来，出席的有99位专门选择的党的高级干部和包括两位总参谋部的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军方人员。据说，林彪对召开这种大规模的会曾持激烈反对态度。虽然毛泽东对自我批评表示满意并且事情似乎就此结束，但是，这次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内容的会议对直接受林彪指使的一大批人来说却意味着丢丑。可以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标志，它表明潮流的走向有了非常明确的变化。只有直接干预才能使趋势逆转。

二十九、打破外交孤立

1970年3月中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东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参加了比赛，其中包括西欧、加拿大和美国的球队。在这里，人们彼此发出了邀请，中国代表邀请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几个西欧国家球员在锦标赛之后赴华进行友好访问。正是在这里，第一次与美国有了接触。因为华盛顿当时撤消了禁止美国球员离开东京后赴华旅行的禁令，美国人现在在理论上可以成行了。在东京和华盛顿多次彻夜电话交涉之后，做出了允许15位美国球员随同西欧和加拿大人赴华的决定。

共同的目标实现了：打破了沉默的僵局。美国访问者带着对中国生活方式的深刻印象回国，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公众心目中几十年来存在的关于"黄祸"和"红龙"的怪诞幻影开始消失。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对一个新的(不可估量的）市场充满了希望。

当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机构以"乒乓外交"这一术语谈论中国外交政策的恢复时，没有一个人能够料想到这一开放会以多么迅疾的方式在中国自身、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均势中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感觉到需要恢复接触，尽管当时建立正式关系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积怨太深，建立正式关系还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冷战，美国干涉朝鲜以及随后中国介入，美国支持蒋介石介入中国内战并保

护在台湾的蒋介石，美国干涉越南、老挝、柬埔寨。呈半月形的美国军事基地始终包围着中国。因此，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主要不是彼此缺乏熟悉和了解的结果，而是根深蒂固的长期仇恨和侵略的结果。

然而，曾几何时，美国已被降为中国的第二号敌人。1968年，出现了尽早结束越南战争的希望。第二种相关的事态发展是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中国必须在两个敌人之间做出选择，中国人现在判定，美国的危险性要小一些。辽阔的大洋隔开了中美两国，而中苏之间却有漫长的共同边境。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似乎还在减少，而苏联的威胁日益严重。越南战争的过程表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存在一些可资利用的重要反对力量。但在苏联却没有这种可能性。最后，中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接近于苏联，但这也包含着"第五纵队"的更大危险；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被罢黜的许多人难道没有搞一种"维希政府"① 的可能吗？假如北京要扩大它同美国的关系，这种需要总会使外交考虑和战略考虑保持一致；实际上，直到当时，中美之间并不存在外交关系，但中苏之间却有着各种规模、各种方式的联系。

就美国方面而言，尼克松在1969年已经改变了他对亚洲事务的看法。美国宣布它将按预定时期撤回它在亚洲的全部地方部队。在发生冲突时，盟国所能指望的"只是"后勤支持和来自空中的"有限"援助。1970年1月，根据美国的要求，中美之间传统的和唯一的外交接触（两国驻华沙大使的接触），在自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译者

1968年中断以后，第一次得以恢复。曾经有过更广泛接触的设想，但在中央情报局支持柬埔寨政变、试图靠摧毁越南解放军在中立地区建立的供给基地和藏匿地点来扭转败局之后，事情毫无进展。然而，美国人并没有如愿以偿：西哈努克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华沙会晤被取消了。中国举行了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反美示威。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罕见的对外政策声明，重申了中国的立场：

>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
>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从毛的宣言中引出的如下一段话概括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要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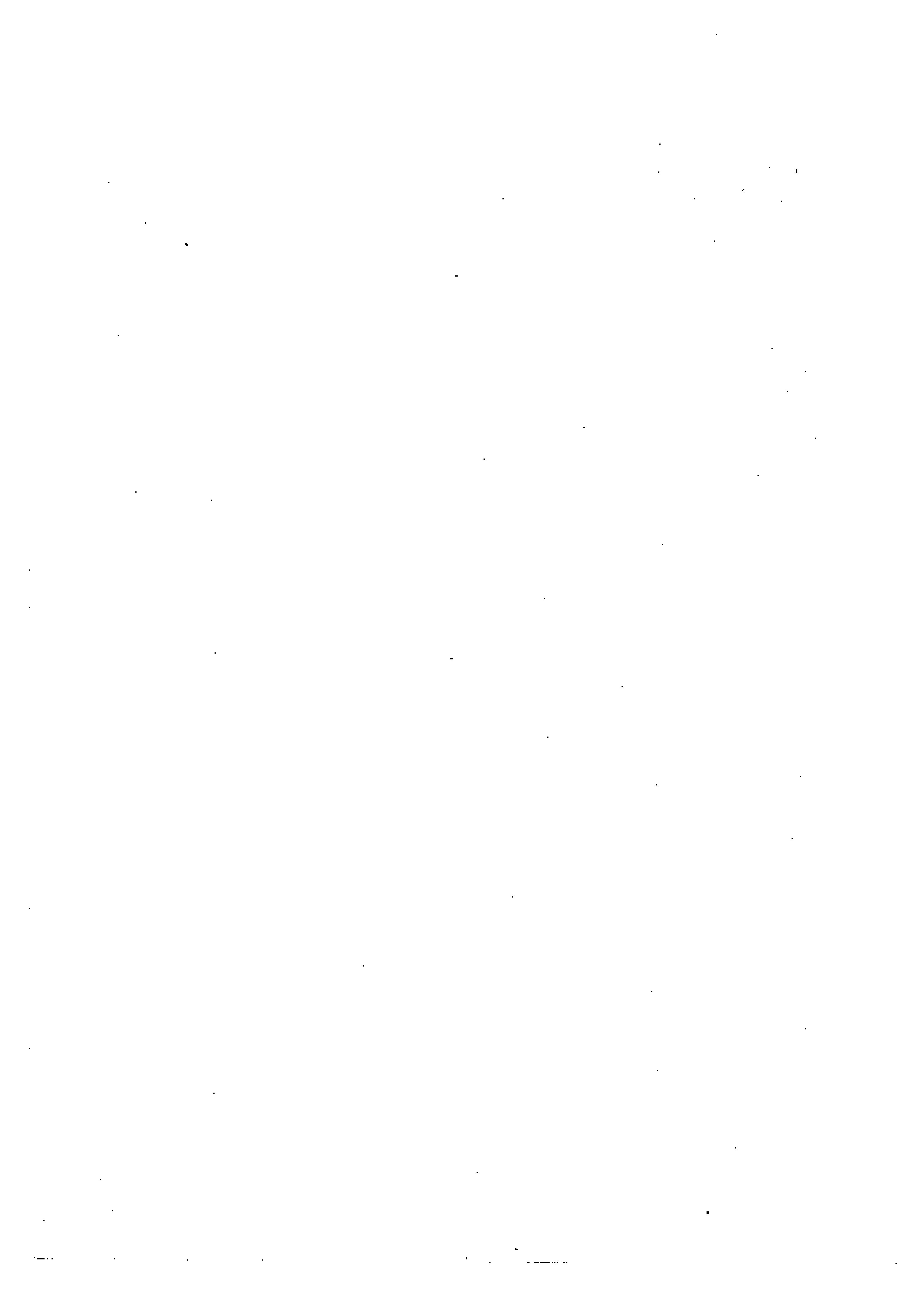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毛泽东显然对美帝国主义内部的重重矛盾和打

破僵局的要求仍然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在这方面，虽然林彪依然持反对态度，但毛泽东却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讲还是从外交上讲，利用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都是大有好处的。正是因此，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在1971年初逐步由模棱两可变得明确起来。在继续大声疾呼要以武力反对美国干涉亚洲的同时，埃德加·斯诺和其他几位西方的中间人正在探听华盛顿是否愿意进行正常对话。1971年初，当老挝和柬埔寨受到新的侵略时，《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出了如下警告性的大标题：《尼克松不要头脑发昏》。

对印度支那革命者的援助显然增加了，出现了准备做出“巨大民族牺牲”的宣言。

这就是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抵达北京时的形势。这个团体受到了只有要人才能享受的接待办法，这样做的不仅是西方新闻界，而且还有中国政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接见了他们，他抓住这个机会明确地阐述了接待这个球台对手的意义。他说，过去，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曾有过频繁交往，但后来这种交往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们受邀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这种友好交往将会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乒乓球运动员之后，其他一些美国人的团体接踵而至，访问中国。美国新闻界和公众对此极为关注，普遍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也全然一新。首先，美国大多数人声称他们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次冒险中博得了头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国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有了明显的起色；美国自己也被迫放弃了与中国保持距离的政策。



第 十 章

冲　　突

有人可能捣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就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林彪讲话，1966年5月18日

三十、对外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基辛格患流感

1971 年夏季，世界注意的焦点从中国转向了印度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又一次走向了战争边缘。巴基斯坦的大选使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关系全面恶化。占全国面积绝大部分的西部巴基斯坦人口较少，消费比率高，生产比率低；但是，西部支配着东部。在选举穆吉布·拉赫曼的联盟过程中，东部的更多自治权要求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巴基斯坦的军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否认更多自治权的要求。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后，起义爆发了，人数众多的难民象一股浪潮涌入印度，随之给印度造成极大的困难，于是，印度以此为借口开始介入这场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美国人始终举棋不定：在印度，他们与苏联是对手；在巴基斯坦，他们与中国是对手。这就是尼克松总统决定派他的顾问基辛格担负调查事实真相使命的背景。基辛格到达伊斯兰堡后不久，在赶赴内地的途中不幸患上了轻微的流感。正式的官方发言人告诉随行记者，感冒不重，但总统顾问将卧床休息数日。7 月 12 日，基辛格露面。他结束了会晤，飞回华盛顿。三天之后，尼克松宣布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他的顾问数日不曾露面不是因为流感，而是因为他负有

一项重要使命。实际上，从7月9日到11日，他根本没有呆在巴基斯坦，而是去了……中国，在那里，他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了交谈。与此同时，他为尼克松访华扫清了道路。

在同一时间，北京也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新闻，尽管语调要冷静得多。《人民日报》写道："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一宣告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动。在美国，反应不一，但大多数人支持这种开创精神。美国的大多数盟国不那么积极，因为它们事前没得到通知。台湾的国民党人和西贡政府害怕失去美国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其维持现有地位的唯一基础。在与美国多年合作共同对抗中国之后，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觉得被出卖了。对美国大使们来说，其后果是仓皇出动，做出他们的解释。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向他们自己的盟友做出某种说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全国人民解释这种开创精神时并非毫无痛苦。这至少是领导层中激烈讨论的焦点。但是，使意见分歧扩大的主要原因不是实际步骤本身，而是它给中国整个国际战略造成的后果。

中国领导层中矛盾的结论

中国领导层始终维持着他们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的抨击，一再宣称中国自己绝不想成为超级大国，并希望继续显示它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团结。这种宣言本身肯定不是国

家意图的担保。在变成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利他主义动机作为它们确立自己地位的借口。"使世界其他地方开化的职责"的说法，论证了西欧列强搞殖民化的合理性；日本的扩张是"为了把亚洲兄弟国家从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美帝国主义的活动则是"抵御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保卫西方自由世界"；苏俄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托辞是"为防止颠覆、保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体化"。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反超级大国的观点可以成为达到那种地位的一种理想姿态。

诚然，周恩来总是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但这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这只是"他的"外交攻势，这种攻势使中国能在这个领域中居于与其他国家有本质差异的地位。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宣称人民战争战无不胜，他借此把自己打扮成第三世界各国的战略家。然而，由于他热衷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先驱角色，人们往往把他视为中国的沙文主义者。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有一大批人觉得，邀请尼克松是中国向着超级大国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尽管各种信誓旦旦的保证给人以相反的印象。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上无疑也提出了这种观点，与会者正在讨论这些问题。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现有的超级大国，它们各自构成威胁的程度以及对付它们的最合适的政策，不同的集团持有迥然不同的意见。就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而言，林彪及其支持者无疑更为正统（也许仅仅因为"他们从未到过西方"）；周恩来及其同事则不那么正统，他们都比较了解西方政治现实的各个相互矛盾的方面，此外，还不得不考虑对苏联的态度。几乎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它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但说到中苏关系，并非人人都持相同的观点。

如果需要的话，每个人都要求继续进行与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但在林彪看来，同时也要反对美国。假如要在两个敌人中确定主要敌人，那么首先必须是与帝国主义斗争：坏的社会主义也比好的资本主义好。林彪及其同事就是这样推理的。另一方面，周恩来和其他官员则认为苏联修正主义是一种更现实的危险，无论如何，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总是比较容易利用一些。

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决定选择周恩来提出的路线，否决了林彪的路线，转而认真制定对外政策。他说：我现在象个学生，每天读两大本参考资料，因此，我对某些国际问题比较熟悉了。

从 7 月 23 日以后，林彪对各军区进行了巡回视察。在他看来，这是对军队意愿的考察，但是按照后来的指控，这实际上是要弄清楚部下是否忠实。现在，只要可能，他尽量避免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虽然关于一项特殊政策的决定已经做出，但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

三十一、在国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整　党

1971年8月中旬，最后一个省的党委建立了。党的九大代表和新中央委员会委员虽然都是自上而下互选产生的，但以后的选举却是基层的事。首先进行的是最基层党支部的整顿（农村的生产队、企业中的车间，村镇和地区），然后是吐故纳新，成立选举委员会，选举上一级党的机构，先是公社，然后是地区，最后是省。在文职和军事机构中、在新老群众团体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时这一工作就已全面展开。尽可能快地进行整党工作的一个原因是，在此期间深刻的意见分歧已经显露出来。人们希望整党能在党的50周年（1971年7月1日）时结束，这样，就可以做出许多重要决策，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主席问题上的决策。实际上，整党工作是在党诞生纪念日后的六周才完成的。与此同时，各种意见的分歧已日益深化，从而使建立新党委成为极为重大的事情。

乍看起来，新党委在建立过程中，最近一个时期似乎得到了强化。在29位省委书记中，来自军队系统的有22人，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则只有4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是纯粹的军人；在这22人中至少有8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或期

间作为政治委员加入军队系统的。而且，就这种情况而言，一片国防绿军装所蕴含的意义同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情况相比，也非常之不同。新省委中军方代表的人数并不是有利于林彪和中央军事机构的标志，而是有利于已在新体制中构成了一个最大集团的大军区司令员们的标志。在已知是新体制成员的10位大军区司令员中，至少有7人是省委第一书记，其他3人是省委副书记。在27位省军区司令员中，有5人是第一书记，22人是副书记。林彪在1967至1968年间虽然对一大批大军区和省军区司令员实行了某种有效的控制，但在现在，由"实力雄厚"的大军区司令员们组成的支持周恩来的稳健集团已开始形成。这在新一轮的对抗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重提宪法和国家主席问题

据未经证实的报道说，8月18日，在外地某个地方召开了一次党内领导人会议，据推测，此次会议是为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做准备。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将于1971年秋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而这里讨论的文件将成为宪法的母本。然而，最可能引起激烈争论的议题还是是否设置国家主席，谁来出任国家主席。因此，这次会议面临的任务实际上是处理二中全会的遗留问题，尽管此一时彼一时，形势已全然不同了。在林彪、黄永胜和其他中央军事领导人看来，这已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可以理解，他们并不过多地把这视为个人命运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事关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对这种成就构成威

胁的是重归老路。另一方面，周恩来、中央国家机关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同样深信不疑的是，一劳永逸地明确告之林彪及其支持者他们不可能实际控制政治生活一切部门的时机已经来临。国家主席问题再一次使这次讨论充满火药味。诚然，提名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由林彪自动递补）的动议已被搁置，但是谁也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直接任命林彪为国家主席的可能性也已不复存在了。从林彪嫡系中提出一位候选人担任这一职务——如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也许是能使大军区司令员们感到满意的理想的妥协人物。凡是相信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人不久就体验到一种幻灭感。在会议期间，人们开始觉察到一股取消带有个人色彩的国家主席职务的运动，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希望以集体领导的形式取代国家主席。对中央军事领导人来说，如果这还不算重大挫折的话，那么，与此同时出现的反对在宪法中把林彪的名字列在毛泽东名字之下的意见肯定就是一股强劲的逆风了。周恩来说过：把林彪的名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 1969 年的党章，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兄弟党的嘲笑，九大党章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如果再把接班人写进宪法，必将给反华、反共分子以更多的口实。

象前一年一样，争论仍然非常激烈。毛泽东又一次站在周恩来一边。但是，会议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在紧张的气氛中告终。据局外观察者所知，会议所取得的唯一成果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日期又一次推迟。会议结束时，领导层中不存在亲密无间的情感。

毛泽东的远见

领导中国的三巨头现在似乎真的濒临分裂边缘了。周恩来返回北京，投身于政府事务。他几乎每天都要公开露面——如出席招待会等，言谈举止一如既往，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三人领导班子的其他两位成员却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毛泽东的做法同他以往在遇到政治危机时一样：退隐到上海一幢重兵把守的舒适住宅之内，召唤支持者和反对者到此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时，他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做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六个月以后，这些谈话被整理成提要，在党员中广为传达。

毛泽东首先再一次提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在7月1日党的生日时，全党都研讨了这个问题。他概括了党的历史中9次最严重的危机：从1927年的陈独秀到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和饶漱石）和彭德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然后，毛泽东提到了第10次危机，这次从撤陈伯达的职开始，延续到1971年4月批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小集团，其终点是对林彪所起作用产生了怀疑。按照以往惯例，对政治危机中核心人物的活动以后都要进行审查。但毛泽东说，这次不同，为了保护林副主席，这次不做任何个人结论。

考虑到1971年8月的事件，这种状况的存在似乎不再有充分理由了。毛泽东说：

他（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

毛泽东还批评了林彪夫人叶群的不得体行为：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显然，毛泽东是在借此机会暗指以前对他自己的夫人江青所提出的批评。但是，江青与叶群不同，江青始终对自己的活动负全责，并且从未充当过自己丈夫同外界接触的唯一渠道。同样明显的是，毛泽东肯定已经清楚地知道，在创立和组织以林彪及其四员大将为核心的派系方面，叶群是个工具。毛泽东甚至通知共同负责他的安全工作的南京和上海当

局，发生冲突的危险增加了。他谦虚地说：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但他又补充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南京军区部队的指挥权），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他非常自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在说这番话的同时，他以一种显然暗含警告的口吻对他的总参谋长（尽管不清楚当毛泽东说这番话时他是否在场）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对黄永胜本人（总参谋部），对他的死党（总后勤部）和他的对头（改组后的总政治部）来说，这种暗示是再清楚不过了。直到一年前，总政治部在林彪主宰的独立王国中还是他手中最重要的武器，但是在二中全会前后，它的控制权已经易手，现在由显而易见的稳健派、地方部队司令员李德生掌管。虽然这段话在公开出版的文本中看起来完全没有什么威胁，但它实际上是对林彪集团一次深谋远虑的警告式攻击。既然毛泽东充分意识到林彪—黄永胜集团掌握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足以酿成一场动荡，那么，这段话也就包含着敲山震虎的意思。在 8 月 18 日的会上，由中央军事指挥机构提出、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于两天后发表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这份由广州军区（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大本营）司令部起草的文件建议军队继续介入非军事领域的活动，这种介入最初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或之间进行的。毛泽东在南京和上海告诉他的听众说：在留给中央正式答复的空格里我加上了“慎重研究”几个字以引起注意。

如果当时他的疑虑充其量不过是有所保留的话，那么，这种种疑虑很快便发展成了猜疑。这份文件提到的事项如下：

第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口号广泛流传，但在"解放军"后面，还有下面一句话："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毛泽东同意把原来的这句话加上。

第二，在同一段话中保留了1967年提出的军队"支持左派"和"实行军管"的任务，但毛泽东在这里做了一些修改：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第三，文件里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也许是某些军事部门搞的政治积极分子特别团体正在以"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培训。毛泽东对搞这种东西也产生了怀疑，他想要知道这些团体是在谁的领导之下，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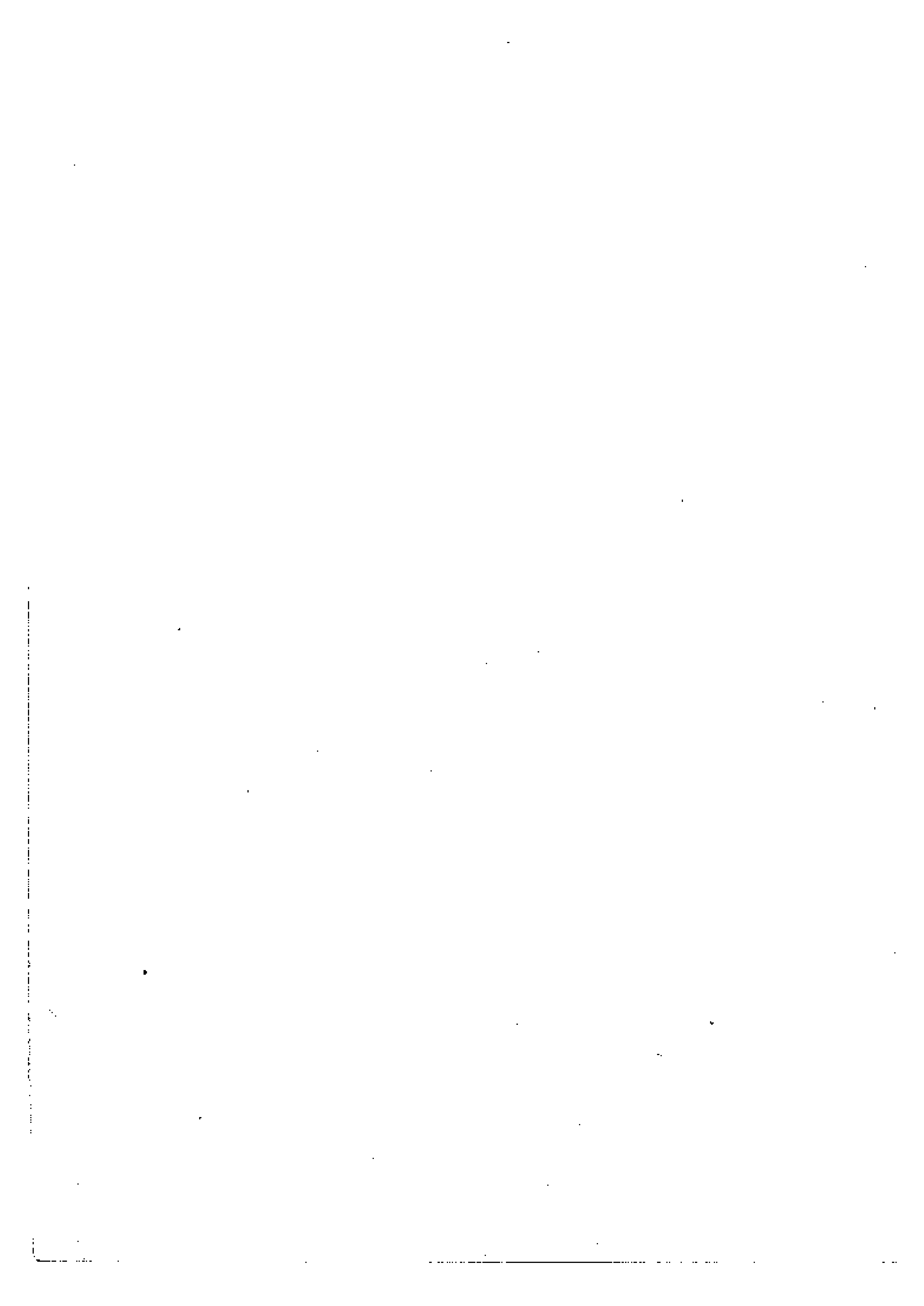
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他显然担心这些团体会象过去的总政治部那样，成为军中之军。

毛泽东的忧虑似乎越来越有根据。在北京，周恩来收到情报部门的报告，内称黄永胜在某些军事单位建立的政治积极分子特别团体的领导是不值得信任的。此外，报告说林彪集团在8月中旬的会后全都奔赴广州，正式的说法是去进一步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但实际上是去分析形势，讨论可能的措施。毛传唤多年来曾是黄永胜亲密战友的刘兴元到上

海来见他。根据广州流传的小道消息，谈话是这样进行的：毛泽东问，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样？蒙在鼓里的刘兴元回答说，我跟着黄永胜同志十几年了，他意志坚定，是个好领导。毛泽东马上严厉地说，黄永胜是个政治骗子。刘兴元背上顿时冒出一股冷汗，内心悔恨不已。他马上转变话头，接着说道，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我在有生之年一定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象服了一片镇静药，脸上有了喜色，然后对刘兴元做了一些秘密指示。

虽然就细节而言，经广州和香港流传出来的故事不足为信，但是，这时显然正在酝酿着某些戏剧性的事件。



第十一章

幕后阴谋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毛泽东词《和郭沫若同志》上阕
1963年1月9日

三十二、暴动阴谋暴露；林彪出逃

林豆豆和林立果

林立果和林豆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可能都在受教育，准备到空军服务。不幸的是，对林立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活动，我们一无所知，但林豆豆的情况却了解一些。她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的成员，在运动的最初几个月间，这个组织从“老保”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了“左派”。起初，它同那些组成所谓“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的组织有密切联系。在这些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党的首脑人物的子女，因此，这些组织尽管规模不大，但其骨干力量在北京却拥有各种便利条件，其中包括藏身之地、汽车、油印机、扬声器等。以后，该组织又同“第三司令部”和新成立的“第四司令部”——即“5 · 16”集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个“红旗”组织的“路线”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什么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其补充形式是极端革命。他们在同刘少奇的支持者密切合作一段时间后，又变成了指责他们的人的先锋。他们对待陶铸和其他很多人的态度也是这类行径的实例。这个组织还间接地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内战”。

尽管不清楚林立果属于哪个组织，但可以肯定，差不多也是这类组织。然而，他比林豆豆年长一些，学业也即将完

成，所以他能够沾父亲的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跻身空军极左派领导人的行列；当与他属于类似派别的人开始从重要岗位上被撤换下来时（如1968年撤了余立金的职），他却身居要职。但是，他暂时还只是一位重要的年轻军官，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和驻扎在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一支空军部队的代理首领。

几个月前，林立果到处奔波，如果只是为了执行公务，似乎没有这种必要。他不辞辛苦巩固与老朋友的友谊，广泛结交新的朋友。他还以自己为中心网罗了一批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的激进空军军官——这些作法确实象是在为政变做准备。他身边的军官分属两个集团：一批人在空军总部，另一批人隶属驻华东空军各部队。后者主要由南京（江苏省）和杭州（浙江省）的人组成。这些省份与上海毗邻，上海是中央直辖市，工业中心；上海也是毛主义者的权力中心，是毛泽东最愿意居住的城市。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正是在这里，一批标志不明的飞机和（或）突击队在9月8日和10日带着劫持或杀害毛泽东的明确意图实施了攻击。

林立果的核心圈子共由六人组成。除他本人之外还有：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设在北京的空军总部内）副处长；周宇驰，也是空军党办副处长；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王维国，空军第四军政治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李伟信，空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

最后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听说。

“571”工程

李伟信供认：“‘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已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主任’那里。”上海附近的袭击是林立果身边的集团搞的，这种猜测似乎有充分的根据。如果我们看一下工程纪要本身对准备工作的叙述和李伟信的供词，这种猜测就进一步得到了证实。搞这个计划的念头最初是在二中全会后生出的，它的进一步完善是在年初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些事件有：1970年12月召开的动荡不安的华北局会议，1971年1月全面改组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系统。2月底，林立果在苏州见到了他的父亲和继母。他们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大概也不想对此加以掩饰，但他们是否曾鼓励儿子实施其政变计划则不能肯定。林立果又赶赴上海和杭州，召集他的朋友第一次讨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 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
>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3月底，他和于新野、李伟信从杭州回到上海，在那

里，他们同两天后从北京赶来的周宇驰碰头。3月22日到24日之间，他们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共同制定了可能举行的武装起义的方案：

>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
>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
>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这伙阴谋家以“571”作为其方案的代号（正如“5·16”阴谋集团被称为“5·16”一样，这个代号可能是指1971年5月），这个代号的发音同“武装起义”这个词相近，在北京话中也与专指过去军队中激进力量和保守力量冲突的“武汉起义”发言相近。工程纪要的文本以一段令人迷惑的话开头：“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据此可以假定，这一密谋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活跃一时的某个地下政治俱乐部一系列活动的继续。这六位主要阴谋家虽然始终在接受训练，或者在四五年前一直是低级军官，但他们现在在最重要的一个军种——空军中都身居要津。

从他们的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核心虽小，但“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在所有类似的军事政变中，空军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

这方面，该计划做出了阐述：

>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
>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上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空军各单位建立“政治积极分子”小组。有关人参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作法就可对此提出正当理由。但是，教育主要不是文化教育，而是思想教育，训练也主要不是普通的军事训练，而是“特工”训练。不明确的是，成立这些突击队是否只是有关军官的责任，或者说，成立这些突击队是否只要空军首脑吴法宪批准就行，抑或由于它们遍及全军而以后要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以宣传广州军区报告的方式）批准才行。明确的是，在一段时期内，在诸如北京、上海及附近城镇等许多地方，都必须抓紧建立特别小组。这个计划继续写道：

> 教导队：以培训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的干部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袁著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枪。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副部长”的感情。

据说，这个阴谋集团开始时的目标是把毛泽东、他的夫人江青，以及江青最亲密的同事张春桥和姚文元隔离开，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面对既成事实，被说服站在反叛者一边。李伟信说：

> 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我记得好象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我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

当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在上海被软禁起来后，就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逮捕周恩来及其在政府、军队和党系统中的盟友。另一种可能性是利用党中央领导开会的机会，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考虑到那些在1967至1968年间反对林彪、支持周恩来的大军区司令员们的情况，这一点可能尤为重要。这些阴谋家希望能够清除那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如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的陈锡联等。至于其他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司令员们，其中有些人可能一时还不愿卷入旋

涡，而另一些人则可由地方或军队中的左派软禁起来。不论怎样，空军将获得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这样一来，林彪及其在中央军事系统的派系就可以势不可当地确立其核心地位。

假如一切准备就绪，不发生紧急情况，看来3月份拟定的计划草案万无一失、势在必成。但实际上，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而且愈来愈紧迫。4月份，对陈伯达的批判触及林彪派系的其他一些成员，到5月和6月，范围进一步扩大；在7月和8月，在国内国外政策问题上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对此，李伟信说道：

> 于新野1971年7月、8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 一般谈一下，(2) 整到军委办事组，(3) 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 (1)、(2) 可能性大。

现在，这个小团体开始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在8月中旬危机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工程纪要”的最初草案就已经预见到了事态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
>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
>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现在看来，后一种形势正在出现，参与这一密谋的所有方面都将被迫加速运转。因此，全国各地的突击队小组经过精心策划统一行事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只能搞一次军事政变：对毛泽东实施突袭可以使党和军队的大权一下子转移到林彪手中。如果此举不能奏效，那就要以其他方式除掉毛泽东。1971 年 9 月 11 日汪东兴将军在人民大会堂记录在案的，就是这种为采取行动而搞的紧急措施。

林彪是否参与了他儿子的计划？

在什么时刻，在多大程度上，林彪开始参与了林立果的计划和空军中的政变集团？可以肯定，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的政治地位就已开始下降。似乎也可以肯定，他由于在二中全会上为保证自己的影响不致下降而组织了一个派系，他也受到了批评。在 1971 年 1 月、4 月和 8 月连遭败绩之后，他决心尽力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相对来说难以肯定的是，他是否很久前就知晓儿子的计划。危机爆发后他仓皇出逃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事先明确知道这个计划。然而，北京的人们未必对这一细微的差别感兴趣：痛斥林彪就足以把他扫进“历史垃圾堆”了。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林彪是否迫不得已接受先由他儿子后由他夫人搞出来的

既成事实，倒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571工程纪要》的两个版本

要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所能得到的情报资料。这种情报资料是不完全的，而且自相矛盾。对于最为重要的一套文件，即所谓《571工程纪要》——“四号文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份文件包括四个部分，上述引文皆出自此件。据说，这套文件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案调查组编纂的，并发给了党内的重要干部。1972年4月，台北截获并出版了一个不完整的版本。以后，在8月份，又出了一个版本，据台北方面说，这是个全本。后来，北京方面证实了它们的真实性。第一本和后来所谓的“全本”都包含许多非常不可思议的条目，后一本尤其如此。然而，如对这些版本做认真的对比，就会发现，它们根据的不是同一原件。

第一本提到，有一个核心团体，他们依靠空军的配合就能击败任何可能的军事反扑；这个团体还认为，中央军委能够同情他们的发动，苏联即使不公开支持，也不会干预。

但比较完整的版本却提到，可能使用细菌武器和其他秘密武器——这与讨论的问题似乎并不相关，还提到中央军委、空军和苏联可能全力以赴，直接参与，共同举事。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第二个本子不仅内容比第一个本子多，而且似乎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两个本子对计划的叙述表明，它们依据的是不同的原件，有不同的背景和观念。

既然第二个本子很可能是对第一个不完整本做了事后的补充，我们在叙述人民共和国1971年9月事件时就将主要

根据第一个本子。

对《571工程纪要》术语的评论

这份计划选用了各种代号，从而使它具有一种奇特的色彩：毛泽东被称之为“B52”，用“我们的舰队”和“他们的舰队”指阴谋集团及其敌对力量，而舰队的配置是以“主力舰”等为单位的。如果“舰队”是指空军编队，“舰只”是指“飞行器”的话，人们就会想起，“B52”是臭名昭著的美国飞机的名称（在林彪集团看来，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一些代号都把人们的视线引向那伙年轻的空军军官，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这些人对他们的计划都表现出一种天真幼稚的作法。

这一点如成立，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我们研究的中心问题做出回答了：林彪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家，但他会写出这种东西来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虽然在《571工程纪要》的第一个版本中有几个迹象表明，林彪、叶群和黄永胜曾唆使林立果集团起草这个计划，并曾参与9月发动的准备工作，但任何地方也没有能证实这些迹象的具体证据。

叶群的作用

在关于《571工程纪要》的“四号文件”中虽然没有可以直接归罪于林彪的引文，但关于在这个计划之前的准备工作的记述和后来李伟信的供词，却不是这种情况。当然，有一

些引文，它们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1971年2月林彪会见其家庭成员未必不是一次正常的家庭聚会。所有其他表明林彪参与此事的证据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推论——林立果可以据此说服其朋友参加这一阴谋。

然而，还有我们应当注意的另外一个方面：表明林彪夫人叶群参与此事的证据。

事实上，关于叶群我们所知无几。她大概比林彪年轻22岁，1959年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后，她曾是林彪在总政治部的秘书。他们也许是在1960年前后结婚的。大约是在40岁时，叶群才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她表现出惊人的野心却是在婚后不久。在林彪论人民战争战无不胜的文章发表前几年，叶群的文章——没有注明时间——就出现在1962年的《人民日报》上了，它占了整整一版，谈到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战争，也涉及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看法。重合之处显而易见；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发言中引证了同叶群以前文章相同的历史实例。这就令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叶群是否实际上是林彪的灵感的源泉？不仅在理论方面的情况似乎如此，在实践方面，叶群也似乎是林彪与总政治部之间的联络官，而总政治部的作用在1962年以后越来越重要。在林彪之后，叶群最容易与之认同的人物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叶群对江青赞不绝口，称颂江青一马当先支持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位外国记者报道，在江青发表讲话的群众集会上，叶群充当了带头欢呼鼓掌的角色。但是，不能肯定这种赞扬是相互的，无论如何，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她们彼此分道扬镳了。

1968年，叶群被提名在中央军委这个重要机构中担任秘书要职。翌年，她在中央委员会初次亮相，并和林彪的几

员大将一起出现在政治局中。此后，她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这是别人认为很难接受的职位。相对而言，林彪是个不好交际的人，他乐得通过叶群与外界接触。

1971 年 4 月，当林彪的四员大将因在二中全会上结成帮派而被迫作自我批评时，叶群也被迫表示认错。

她还按照林彪的授意去试探林彪的总参谋长的意见。

林立果对他的朋友们说叶群（特别强调不是林彪）早就知道这个计划，而且，其他资料来源提到父母二人中的一人，这在重新整理过的事件年表中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提到的也是叶群，不是林彪。根据我们已知的林立果政变计划的性质、林彪的想法、叶群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叶群似乎可能是在林立果集团和林彪集团之间被忽视了的一环。参与者可按介入时间和程度分为四类：

> 一、林立果和他在空军的年轻军官朋友，他们在 3 月份就已自动开始拟定政变计划了；
>
> 二、叶群，她最初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的计划，但越来越感兴趣；
>
> 三、林彪，他长时期内不知道正在搞什么东西，也许到最后才看到这个计划，把它作为摆脱危机的最后手段；
>
> 四、四员大将和其他高级将领，他们只是作为集团的成员间接地参与了此事。

这种解释未必没有吸引力，因为整个"林彪阴谋"案中很大一部分前后矛盾之处可由此得到说明。

第十二章

安　定

独立寒秋……

毛泽东 1925 年一首词中的一行

三十三、报　道　战

由于军事上的危险似乎已不复存在，领导层中的政治危机也正在得到解决，于是发动了广泛的报道战和宣传战，以便告诉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也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总结思想教训，并把它传达给人民。以一种或多或少谨慎的方式将情况通告全党，至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至少在六个月后，国内才逐条发表了一些重要情况。在9月11日和9月13日之间，可能只有政治局和部分中央委员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9月30日种种事情发生之后，全体中央委员才得到消息，那可能是10月1日或3日（这时，北京已证实确实发生了飞机坠毁事件）。此后才通知到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大军区和省军区司令、主要政府部门的首脑。10月3日，湖北省广播电台还提到"林彪的光辉榜样"，但此后他的名字便销声匿迹了。

但是这一阶段所作的传达始终处于绝密状态，文件都由武装通讯员亲自送交有关机构。

人们显然担心国内外各种力量会利用这种局面大做文章。10月后半月，关于实际情况的第一个报告开始向外界泄露。然而，香港、台北或东京报纸上所载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在当时并未引起谨慎的西方观察家的认真注意。10月底，中国出版物上开始出现第一批涉及这一事

件的材料，但即使是这种东西也受到严格限制。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能看懂。

象以往一样，宣传性的抨击仍然以那些已经声誉扫地的个人或集团（刘少奇和陈伯达）为对象，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矛头已经愈来愈指向林彪及其集团。在中国，通常的作法是，一次新的抨击实际上总是以前一次战役为基础，因为后者已为党内和人民中大多数人所接受。对陈伯达的批判（它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警告性的出击）已逐步波及林彪。1971年秋季发动的对刘少奇和陈伯达的批判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许多内容是对林彪的间接批判。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例子。第一个是10月底出现的对刘少奇的新一轮激烈抨击。

这次抨击强调刘少奇的"地主出身"。他实际上出身于富农家庭，而他自己的父亲则是位教员。不言自明，挑剔出身是为了进行当前的清洗。许多观察家甚至认为这是针对周恩来的，因为他是在一个有文化的官僚家庭中由祖父带大的。但是，说这是针对林彪的似乎更有可能，因为林的父亲拥有一家纺织作坊。这次批判还对刘少奇的"家庭观念"作了夸大其辞的强调：他作为一位高级官员，让自己的老婆在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子女还是可疑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这里的矛头所向很可能也是林彪：他的老婆和子女也身居要职。

这种批判隐晦曲折但也确实有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以这种方式对林彪进行的指责可以拖延到每个人都充分了解事实之时。另外，它的基础是有关文章的读者早已熟知的批判战役。这种批判的内容和形式会使人自

然而然地产生联想，把实际上想要批判的人同已经声名狼藉的人联系起来，最终使实际对象蒙受耻辱。虽然在大多数外国人看来（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把“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罪名加在曾是刘少奇不共戴天之仇敌的身上，迹近有意的欺骗，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作法却有充分的根据，因为在他们看来，使中国革命放慢速度或以一种过于激进的方式使之加速进行，都有可能使中国革命偏离正确道路。

为说明这种批判方法的隐晦曲折，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1971年底，《红旗》杂志上出现了对胡风的猛烈抨击。这在中国大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人们对胡风其人早已淡忘了。但是在这种抨击中，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胡风却是另一副形象：自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两面派、极左派。这分明是一个陈伯达的翻版。这里需要指出，陈伯达虽然已被罢官一年，但在出版物中从未提及他的姓名（可与几年前刘少奇的情况比较一下）。此外，这篇文章中还有如下一段话：

> 一切反革命两面派，不管他们隐藏得多么深，伪装得多么巧妙，手段多么狡猾，他们终究不可能逃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洞察，不都能逃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人民的天罗地网。也不管他们的内部反革命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和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总有一些人是可以分化出来的，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走的人没有几个，他们最后必然变成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落得个可耻可悲的下场。当然，

反革命两面派暴露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革命人民透过假象认识他们的本质，也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一段让他们隐藏着的反革命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在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以前，可以暂时迷惑一些人，欺骗一些人。然而，当他们的真面目被揭露了之后，人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庞大的假象中看出渺小的本质。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它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胡风引向陈伯达，同样也引向林彪。它对1970年和1971年的整个危机做了几乎是毫不掩饰的全面概述，其中包括对“毛主席明察秋毫”的令人感兴趣的暗示。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重新对胡风进行的批判包含着许多历史类比，可将其明确的暗示列举如下：

一、胡风曾是毛泽东推崇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的得意门生，但在鲁迅于1936年逝世前不久，他们曾因“左翼作家联盟”中的“托洛茨基倾向”问题发生争执。在林彪和毛泽东因陈伯达异端问题发生争执而分裂之前，林彪同样也是毛泽东最忠诚的学生。

二、1954年高岗事件时胡风被清洗，因为他坚持要求在文化部门有较大的自由，就象有同样想法的知识分子以同样的方式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发生偏离一样。与此类似，极左派也想使文化大革命偏离它的最初目标。胡风被打倒后，毛泽东指名道姓地抨击他，说他是伪君子，笑里藏刀。

三、1967年时，"左的倾向"已被指斥为"胡风式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标签因此有了后来的含义。

在这个特定时刻拿出胡风作为靶子，背后隐藏的是一整套以林陈事件为目标的历史类比。在这一背景中，毛泽东于10月底在《人民日报》上为读者刊登了鲁迅的一段话，意味深长。鲁迅的这段话是："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11月初，报道战已渗透到各级党委，包括那些极边远省份的党委；于是，整个事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1月7日，第一次出现了对林彪"本人"的抨击。这种抨击虽然还没有公开指名道姓，但已不再披着批判别人的外衣。11月7日，《人民日报》在一篇转载自《红旗》的文章中说，"一小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妄图扭转历史车轮"。就在同一天，浙江省广播电台播发了一篇据说是一位在阻止林立果军事政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当地战士写的文章。浙江的省会杭州是制定政变计划的地方，该地的空军基地可能是上海袭击的出发阵地，这里或许还是整个事情开始出现差错的地方。这家电台播发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大意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说，党内斗争在党内造成极大的痛苦。这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的幸福就在于消灭剥削阶级的剥削。刘少奇所说的痛苦，是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和这类反革命分子的痛苦。当这些人被挖出来时，他们就

会狗急跳墙。他们说感觉痛苦，就是要使他们痛苦……在党内50年残酷斗争的过程中，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和刘少奇，都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被粉碎了，我们的党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强大。党内斗争是好事。如果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犯下的罪行不能得到惩罚，那才是真的痛苦。当这些恶棍被揪出来时，他们就露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党内斗争充满痛苦。他们想避免最终灭亡的命运是徒劳的。他们的垂死挣扎毫无用处。

三十四、清　洗

与此同时，清查林彪集团、林立果集团和所有看来同他们的活动有关者的行动也开始了。林彪及其夫人、儿子已经死了，林立果六人小集团的成员大概也已被捕。此后，就该轮到所有参与此事的其他人了。林彪的“四员大将”很快就被逮捕。几十位高级官员也被捕了，他们主要是空军、海军、总后勤部和其他“技术”兵种(包括铁道兵部）的军官。在这第一个回合中，撤掉了总计 60 多位高级官员的职。除了北京总部各单位的人之外，他们主要是东部各大军区的：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和武汉军区。从政治上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领导人受了一次严厉的打击：在一年之间，5 位政治局常委中有 2 人（陈伯达和林彪）消失了，在 21 位政治局委员中有 6 人不见了，在 279 位省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中有 16 人无声无息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四川省的领导层中，众所周知非常左的那一部分人也被撤职了。但是非常清楚，清洗运动不会在 40 天内结束。12 月 26 日，《湖南日报》提出：“对这些人必须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路线斗争决不能放松。”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调查工作全面铺开。数以百计的人被捕，嫌疑分子的人数现在总计有数千人。据国外

估计，在1971至1972年间，有数十万人因其行为与1970至1971年间的左倾思潮有瓜葛而受到批判。除了文化大革命外，这在党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次最大的清洗。

1971年底至1972年初，报道和指责的活动开始接近尾声；在这个时候，向全体人民传达了关于这次斗争的正式文件，几个月后，包括所有细节的背景材料才最终面世。下一个阶段是动员所有人投入大批判运动，批判已被清除掉的集团。大批判的作法非常之不同——从重提久已淡忘或隐而不露的宿怨到撰写理论文章分析那些受到指责的言论和著述。在批判运动开始时，不确定成分之多，混乱程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唯一能与这种局面相比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但是，当时批判刘少奇和彭真的运动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右倾”，这比批判林彪和陈伯达左倾异端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且，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彭真，都没有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内被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受到连篇累牍的颂扬。可以想象，对相当一大批人来说，要理解这种变化是极为困难的。2月份，对在云南省会昆明举行的一次由军区司令王必成主持的批判大会有一则报道，大意如下：王必成同志发现，少数同志对批判林彪反革命活动有某种畏难情绪，他们担心，有些干部“文化水平低”，因此“问题说不清，搞不了大批判”；他们担心，群众“觉悟低”，因此“不能清楚地把不同事物加以区别，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王必成同志还指出，另一些同志则没有恰如其分地认识到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活动的困难，因而表现出某些“松劲情绪”。结果是他们没有花足够的气力搞大批判。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从

而满足于表面的讨论和一般化的批判。

其他省也有类似的报道。黑龙江省部分党的干部不愿意参加斗争的情况也曾见诸报端："他们很多人口头上同意所采取的行动，但只是在口头上。实际上，他们并未投身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超然物外。他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在广东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阶级斗争、捍卫正确路线的斗争——首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又一次爆发这种尖锐激烈的斗争，这使我们感到太突然，因此难以理解，这怎么可能呢?"

在"左倾"的省份四川，疑惑甚至更大。有关报纸做了如下报道。有人说："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这个害人虫挖出来?"对此，党委书记回答说，这个问题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方法之间的矛盾，未必都是对抗性的。矛盾变成对抗，只有在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固执错误并达到一定程度时。在党内代表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有一定的过程，他们的自我暴露也有一个逐渐的过程。"

"刘少奇一类骗子"就是如此。"他们抬高革命的标准，但私下里却在策划反革命阴谋。为了保护他们自己，把他们今后的活动隐藏起来，不到出现合适的气候，他们绝不会跳出来。在这些丑类的反革命嘴脸暴露出来之前，揭露他们的工作本身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肯定是逐步深入的。阶级敌人自然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跳出来，但他们不可能隐藏得很久。这样一来，党内埋下的定时炸弹就是一个接一个被挖出来的，隐患也是

一个接一个被排除的。”

罪 名

直到这时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用毛主义的术语来说，这是个党内非对抗性对立发展成对抗性对立的过程；用更带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这是个量的或渐变的意见分歧发展到质的或实质性的意见分歧的过程。由党的领导在事后就有关问题进行长期的“教育”，这是基层党组织做出的反应，这样一来，自上而下的传达就能与自下而上的批判互相补充。

在过去几个月间，使用了各种各样贬低的说法，如“封建余孽”、“机会主义者”、“反革命伪君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阴谋家”、“帝修反特务”、“修正主义者”、“卖国贼”、“叛徒”、“野心家”等等，这些说法正在逐步规范化。象以往一样，现在，形形色色的罪名渐渐集中起来。其要点是：

> 一、林彪所犯“现实的”错误（如组织派系、军国主义、野心家）要由林本人及其将军们负全责；
>
> 二、据说，林彪同样要对陈伯达的先验论宣传方针（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低估人民群众的作用，意识形态中的教条主义）负责；
>
> 三、指责他参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极左活动。

最后这一点变得异常重要了，尽管在1971年夏季的危机中它实际上并非主要因素。这样一来，矫正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不再限于批评极端派小集团的过激行为，已经扩大到讨论整个运动主流的一些重大内容。束缚住稳健派，使之不能与极端派抗衡，其框框现在已经被冲破。但是，这只是为矫正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并重新恢复团结奠定基础的一种方式。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到年底或第二年年初，划清界限的战役才开始初步成形，这一战役是以提出比中央委员会总结的“十大罪状”多得多的罪名而告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归纳的“十大罪状”是：

一、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要把他自己的名字作为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写入党章。(1966至1971年)

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对抗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66至1971年)

三、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枪指挥党。(1969至1970年)

四、自从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试图谋害毛主席。(1966至1971年)

五、在庐山会议前后，利用批判“彭黄反党集团”的机会篡夺军权。(1958至1959年)

六、无视党纪，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招降纳叛，结党营私。(1970年8月)

七、打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红旗反红旗，个人野心膨胀，大搞政治阴谋。(1969年以后)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成员，清洗了大批不应清洗的领导干部和"我们的同志"。(1967至1968年)

九、反对毛泽东的正确外交路线。(1970至1971年)

十、里通外国。(1971年)

林彪的这些罪行已相当可观了。他不仅卷进当时所犯的错误，而且他过去的错误现在也被拿出来示众。在这一背景下，2月25日的《北京周报》转载了1971年《红旗》某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论毛泽东1930年以"批评党内某些悲观思想"为目的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显然是为当前形势服务的：

悲观主义是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坚持这种世界观的人，总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总是不相信群众，也不依靠群众。不相信党，也不依靠党。他们一遇困难，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就动摇、逃跑、叛变，或搞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在革命顺利发展、处于高潮时，他们又往往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贪天之功为己有，推行极"左"、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坚持这种反动世界观，必然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阻挡历史的潮流，成为妄想停止地球转动的反动派。

但是，《北京周报》和《红旗》的绝大多数读者所不

知道的是，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最初就是针对红四军中某些“悲观主义者”的，原来的标题是《给林彪同志的信》。只是在以后，当林彪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上升为党的一名重要领导人时，这篇文章的标题才做了修改，它与林彪的联系才被淡忘。与过去历史有关的另一个插曲是，力图表明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并不象过去所说的那样总是成功。现在对他的批判宣称，东北解放前夕所发动的成功的进攻，不应归功于林彪，而应归功于毛泽东本人。

在这个搞臭林彪声誉的阶段，周恩来的表现与众不同，他仍然是温文尔雅，恰到好处。在其他人不遗余力拼命“展开和深化”对林彪的批判时，他依旧告诉外国观察家们，尽管林彪犯下种种罪行，但他曾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外国观察家们逐渐明白了这次危机的性质。1972 年年中，事情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毛泽东可以向两位外国客人——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证实林彪的倒台了。7 月 28 日，北京终于决定对这一事件做出公开陈述，这实际上等于证实外国新闻机构已经获悉的事情。

1972 年 9 月 22 日，即坠机事件一年以后，《人民日报》第一次公开提到了林彪丧生的情况。在 10 月 13 日的同一报纸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批判路线，它把林彪同不久前所有极左罪行——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政府主义”——挂起钩来。

三十五、外交政策的有限突破

让我们暂时先回到 1971 年 10 月 25 日。即“林彪事件”真相大白之后的第三个星期，此时，周恩来已经可以收获其外交政策的第一批果实了。这一次，舞台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

1947 年，当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始终拥有一个席位，但一直为蒋介石的代表所占据。1949 年后，西方各大国坚持认为台湾的国民党人是中国人的唯一代表。应当回顾一下，只是由于美国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国民党人才保住了台湾这一孤悬海外的弹丸之地。

在随后的 10 年间，人民共和国越来越与外界隔离，尔后，又引人注目地同世界其他部分建立了友好关系。最初，这在联合国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亚非集团的发展壮大使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中有了日益增多的盟友。1970 年，第一次出现了多数国家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局面，但是，在美国的操纵下，以改变会员身份是“重要问题”为借口，把接纳中国的条件提高到三分之二多数票同意。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预见到，要不了多久，问题就会解决。

事实证明，反华阵线的崩溃比预期的更为彻底。到最后一刻，美国再一次试图用程序问题保护它在台湾的

盟友。然而，这次“重要问题”也不管用了：只有45个成员国准备追随美国，其他15个成员国弃权，而宣布反对这一程序的中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却有59个。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决定；最后几天收集意见的结果表明，赞成把中国席位交给北京的占微弱但却是足够的多数。中国的盟友阿尔巴尼亚和其他22个不结盟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这一议案。当人们一旦认识到这一议案无论如何也会通过时，多数派就以压倒优势取得了胜利。只有35个亲西方国家宣布反对这一动议，17个国家弃权，而投票支持中国的则有76个国家。中国新闻机构新华社提到了10月26日和27日的事件；28日，《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并指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妄想建立“两个中国”（即一方面承认中国，另一方面保持台湾的席位）的阴谋遭到了彻底失败。次日，官方的正式声明进一步阐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中国派出了以乔冠华和黄华为首的代表团，赶赴联合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两位人物都是周恩来和陈毅的最亲密同事。陈楚将任安理会的中国常任代表。11月11日，中国代表抵达纽约。虽然在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上依然在同美国进行激烈的争吵，但11月15日，乔冠华就联合国接纳中国问题做了正式发言。他以重申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为结束语：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我们坚决反对有的国家以“援助”为手段，企图控制和掠夺受援国家。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7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希望，今后能逐步改变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

这种政策阐述使一部分人欢呼赞成，另一部分人则怀疑观望。无论中国是否把自己看成一个超级大国，它被其他国家视为超级大国这一事实，对它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随后的一个月中，中国不得不在印度次大陆事件中采取某种立场。它发现，自己同美国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即对巴基斯坦的反革命政府提供政治支持，这个政府刚刚以暴力击溃了该国东部地区以争取更大自治为目标的起义，现在则面对着苏联支持的、同样反动的印度的军事干涉，印度人抓住了这个搞垮宿敌的机会。印度在整个次大陆的霸权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为保障的。中国发现，它被迫在联合国第一次投否决票——不同意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因为印度和孟加拉拒绝了要求释放全部战俘的决议。中国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虽然非常谨慎，并总是阐述其在各方面的政策，但很多观察家带着赞同或厌恶的心情，把这视为北京迈向超级大国政策的第一步。当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抓紧进行时，这种看法进一步得到加强。

三十六、尼克松来访；新关系趋于形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座机“76年精神”号在北京的机场着陆；乘员有尼克松及其夫人，基辛格顾问，国务卿罗杰斯，其东亚问题助理马歇尔·格林，以及其他十几位官员和尼克松个人幕僚班子的二十几位成员。同机到达的还有九十几位记者。中国方面出席欢迎宴会的有：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不久前去世的陈毅的继承者），国防部代部长叶剑英（林彪的接替者）及其他许多人。然而，最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在当日下午，党的主席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显然，毛泽东希望向他的追随者表明，他本人对“革命外交路线”负责。

在宴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致欢迎辞。在一番表示友好的话之后，他所谈的仅限于说明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原因。他提到了在万隆会议时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

尼克松总统改变了话题，发表了一通更富有戏剧性的言论：

> 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

在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中，他忘了越南的儿童。在越南，狂轰滥炸正在升级，河内的报纸注意到了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尼克松为他本人的这种蛊惑宣传所陶醉，在发出“让我们共同开始长征”的呼吁后，他援引了毛泽东一段讲继续革命的词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感情充沛地接着说道:“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如果说中国人感到为难，那他们肯定没有表示出来。

但是，在以后的四天中，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人并不打算在政策上做出让步，而美国也不准备放弃它在印度支那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整个气氛显而易见地冷落下来。

>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

接着的一段话是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段话与周恩来在2月21日的致辞几乎完全一样。

>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
>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
>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
>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

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前两条显然是美国提出的；第一条是与倒数第二条相对应的；第二条是与上面概述过的一段话相对应的，即“和平、自由、进步”（“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后一条显然是中国提出的，针对印度支那问题。然后，可能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坚持，声明第一次把台湾问题当作“内政”而不是对外政策问题来处理。到这里又分别阐述各自观点：先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然后是美国方面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关于后一个问题，后来的解释有分歧。据说周恩来曾“非正式地”允诺，即使这是内政问题，也不会使用暴力手段去解决。与此同时，据说他还以如下事实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只要美国人呆在越南，他就不指望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会缓解。从印度支那撤军是实行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因此，倒数第三段肯定令尼克松大失所望，他本来满怀希望，准备

就此恢复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声明的结尾是这种场合似乎必不可少的客套话。

当尼克松、基辛格和罗杰斯一行飞回华盛顿时，罗杰斯的助手马歇尔·格林却离开大队人马单独行动，赴亚洲几国首都旅行，向美国的盟友重申它的保证。尔后，周恩来也为同样的使命前往河内。尽管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但与美国开始对话，为迅速增长的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希望奠定了基础。就亚洲而言，在一年内，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这一举动所造成的后果：

一.在朝鲜，北南双方就本来可能的重新统一开始了讨论；

二.紧步美国后尘，日本也重新开始与中国对话，随后迅速恢复了外交关系；

三.国际社会明确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第一次加深了台湾的痛苦感，后来，这似乎为将来可能的和平政治解决方案创造了条件；

四.在长期拖延之后，美国人自己现在也感到他们不得不从越南撤出其军队并在巴黎协议上签字了，尽管他们目前还在东南亚留下了足够的人力和物资以进行武装斗争；

五.在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改良派政府执政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了孟加拉国的独立之后，中国和印度也开始了谨慎的对话。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周恩来促成的明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突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迫使亚洲其他国家重新开始

在10年或20年内已奄奄一息的交流。这本身就是世界这一地区的引人注目的发展；这个地区居住着世界的一半人口，但至此之前，它的所作所为就仿佛是最大的国家——中国并不存在似的。

尾　　声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政策宣言

在“左的倾向”做出让步之后，使每个人都感到不安的大问题是：中国政策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否有再一次“向右转”的危险？是否会象一直预言的那样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外交政策也开始引起国内外左翼势力的怀疑。从任何一个方面看，中国在关于孟加拉国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是可以理解的。尼克松的来访并未在印度支那、朝鲜和台湾这类根本问题上造成妥协。然而，国际关系方面所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从支持其他国家内的进步势力逐渐转向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正常化，而不管这些政府的政治倾向如何。中国人的说法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未必是矛盾的。这种立场招致海外“同情者”越来越大的怀疑。人们担心，中国将会发现，它将面临苏联人在几十年前所面对的艰难困境：或是无条件地支持国外的革命者，甘冒外交地位被削弱的危险，或是尽可能加强外交地位，寄希望于这将使支持各地革命力量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尤其是西方的左翼势力，部分是由于发自内心的怀疑，部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妄自大，显然正在分化。作为一种并不伤害反对派的合逻辑的外交步骤，人们接受了承认希腊法西斯政府的举动。但是，在与西班牙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人民日报》上一篇讲西班牙历史的文章却闭口不提西班牙内战及其背景，这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涉及法国议会选举时，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对（亲苏的）法国共产党在左翼人民阵线中的突出作用讳莫如深，不置一辞。对与苏联有关

系的西欧进步势力（如正统的共产党人），北京不仅越来越疏远，而且对那些致力于东西方缓和的进步集团（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或与之类似的集团），也越来越采取冷眼旁观的姿态。另一方面，中国人却一反常规，同那些反对多边裁军的保守集团（如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建立接触。在我第二次访华期间，周恩来坚持认为，西欧国家应当增加国防预算，“即使这不是个受欢迎的选举纲领”，因此，在我与之结伴同行的荷兰议会议员团中，他得到了保守分子的拥护，而进步分子却耿耿于怀。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蓬皮杜和其他一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为什么在中国人看来苏联竟然成了最可担忧的敌人，这一点很清楚。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相信在西方实行的缓和会增加俄国在东方进行侵略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的进步力量能够理解中国干涉旨在与西方实行缓和的运动的企图。北京领导人的大量言论势必导致“误解”，即在遥远的将来会变成超级大国政策的东西现在已初现端倪。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过去几年间在所有对内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发展。这次大会持续的时间显而易见地短，大会结束时，它的决议才公之于众。会议显然认为，已经不存在更大的危险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以往，曾两度过早地宣布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是，仓促召开为筹备全国人大而必须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工作会议，而这些会议最终只是给召开全国人大制造了障碍。这一次有所不

间，在盼望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先召开了新的党代表大会，这样一来，毛主义队伍的清洗和整顿工作肯定可以结束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有近200万党员，在运动中党员人数有所下降，而现在，党员人数增加到280万。在九大时，由于当时的形势，代表的人选不得不以指派的形式确定，而十大的1249名代表则是基层党组织挑选的——尽管有所谓“征求群众意见”，但实际上党的领导在选举中仍然可以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显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人口集团，现在以超过以往历次大会的优势出现在会议上：代表的三分之二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军事干部的人数显著下降；妇女代表占了五分之一；青年代表的数量显著增加。少数民族代表依然拥有很多席位，而且“台湾省”的代表第一次出席——这自此以后成了所有全国性会议的通例。自从在联合国从道义上战胜了台湾之后，北京现在谋求和平统一这个海岛，允许它保留相当大程度的内部自治。党的领导层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也反映在大会主席团148位成员的选举中，反映在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和秘书长（张春桥）的提名中。他们的背景非常之不同，以致不可能把其中任何两个人归于一类。

象以往一样，大会议程包括如下内容：宣读政治报告，建议修改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是由周恩来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基本上分两大部分：国内形势（肃清林彪和陈伯达反党集团之后）和国际形势（涉及苏联的战争威胁）。

关于国内形势，周恩来有如是说：

>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
>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批判林陈集团运动背后的政策往往给人造成误解。例如，当人们说林彪、陈伯达夸大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时，这种指责听起来同他们早些时候对周恩来的指责非常相似。但是，这必须根据1970年时讨论参加军备竞赛和军事工业发展的情况做出解释。所谓修正主义的罪名也是这种情况，极左派总是以这种罪名攻击周恩来。这也应当按照1970年的政策问题进行考察。在这个报告中还有一种倾向，即不再把实际上搞右派活动的陈伯达——特别是林彪称作极左派，而是干脆把他们叫作右派。这对于熟知有关人士历史的中国人来说非常好理解，但国外的读者却很有可能被这个报告搞糊涂了。在论述对外政策的一部分里，情况恐怕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是稳健派的周恩来，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苏联，使之成为头号敌人？他是要在极左派的指责前保护自己吗（实际上他当时正在建议关系正常化）？或者说他是

中国最大的“沙文主义者”？或者说他干脆是位“亲西方派”？一般说来，要对隐藏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复杂因素做出判断，这样一种分类是太笼统了。在前几章里，我们对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已经进行了讨论，而现在或许是更准确地评价周恩来对西欧和日本地位的想法的合适时机。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

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6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正是在这种对国际关系发展的错综复杂而又并非不合逻辑的观点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在70年代的外交。

王洪文在十大上论述了修改过的党章。这个党章与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很大的变动，修改的大部分都是以此前征求意见过程中各级地方党委正式上报的41份正式修改稿为基础的。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在总纲。原党章中的某些条文作了更改，但关于组织结构的具体规定实际上没有改动。有趣的是，新党章中不仅与林彪有关的一段话删去了，而且不厌其烦重复毛主席名字的现象也停止了——这显然表达了这位共产党主席本人的愿望。理论上强调的重点从“毛泽东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因过去成功的革命实践而对毛泽东个人的赞颂，现在变成了对党和人民的赞颂。较之以前，对文化大革命的赞美变本加厉，但重点也从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转变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还明确规定，进行新的文化大革命是始终必要的，不允许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

第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日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清除了林陈集团，原来的中央委员会人数显然不足了。最后，中央委员会大概增加了四十几个成员，总人数达到319人。在195位正式中央委员中，有75人（其中有17人是原候补中央委员）是新人。在124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64人是新人。在代表大会人员构成中已

清晰可辨的趋势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很少有发言权的集团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了更多的代表。尽管除 84 人的出生年月（他们几乎都属于老一代人）之外我们对新老成员都所知无几，从而难以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年轻人数量大大增加是首先可以肯定的。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大大低于以往各届，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还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后党的领导层重新恢复了活力，其他信息似乎证实了这种印象。在这一方面，大量公开出版物中出现了要求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宣传，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央委员会中人数不断增加的另一类人是妇女。她们在代表大会中所占的百分比虽然不高(13%)，但就全党党员人数而言，这一百分比已经相当高了。还应当指出的是，前解放军“英雄”的比例降低了（主要是士兵，而已居于显要位置的集团——尤其是工农模范人物——的比例却提高了。中央政府机关（部长等）出席的人少了，而地方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却增加了。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解放。

当然，比中央委员会构成更重要的，是实际上负责做出绝大部分决策的中央政治局的构成。它的人数固定为 21 位正式委员和 4 位候补委员。就其年龄构成而言，显然，清除“极左派和右派”后，必然要召回一些年事极高、行动不便的人作成员。因此，和毛泽东在一起的，除周恩来和康生外，还有一批 19 世纪的人身居要职：叶剑英（他现在代行林彪的职权）、朱德（现在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董必武（他暂时代行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权）、刘伯承（现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与这些七八十岁的人相对应，政治局中第一次有了三四十岁的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王洪文和姚文

元。说到妇女，一位模范纺织女工吴桂贤现在有了一席之地，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平起平坐了。此外，还有几位工农劳模在政治局中占了席位，例如陈永贵（来自著名的大寨农业生产大队）和倪志福（一位农村家庭出身的工人模范）。清除林彪的七人军事集团，显然减少了政治局中的军方代表，尽管始终是"强硬"稳健派的大军区司令许世友（南京）和陈锡联（沈阳）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李德生（总政治部）和汪东兴（中央警卫局）在清除林彪及其集团中起了重要作用，现在从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只有周恩来的副手李先念保住了他的席位。另一方面，几位以往一直处于边缘的人物现在迅速崭露头角：来自湖南省的华国锋，来自广西的纪登奎，来自新疆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赛福鼎；接替已故北京市负责人谢富治的是吴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三人团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未经触动。如此看来，这个新政治局是异质性的，同时也比上一届更有代表性。政治局常委的情况亦如此，现在，它的人数从 5 人增加到 9 人。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政治活动有了明显的复苏。1973 年秋，一场新的文化批判似乎正在兴起——主要在教育和艺术领域。1974 年年初，所有重要的大军区司令员都进行了重新调配。1974 年春，大字报卷土重来，某些地方领导受到攻击。很多人预言，这是新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入夏以后，这些因素又销声匿迹了。显然，运动被导往另一方向。突如其来地强调成立群众性的工农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小组。其论据是，如果说林彪和陈伯达能用假马克思主义到处招摇撞骗，那是因为孔孟之道没有被斩草除根。因此，开始宣传那些阅读、研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业余学习小组”。1974年年中，大众传播媒介推出了一个这类小组的模范——一个由北京友谊商店日用百货部八位年轻妇女组成的学习小组。她们开始研究林彪走上歧途的根源，但是，18个月后，她们才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最后，她们可以把资产阶级的先验论同真正的唯物辩证法区别开了，并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发动了对商店中大男子主义的批判，还批判了青年节对年轻人的错误引导。最初，她们所作哲学分析的价值不为人们所承认，但现在，这种价值已被承认。她们中有一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人加入了共青团，其他人在店里成了先进工作者。在1974年下半年，成千上万的人一哄而起，纷纷仿效她们的榜样。这种群众性的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小组的成立，成了政治舞台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向，对今后的运动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我第二次到中国旅行。1975年1月13日到17日，人们望眼欲穿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这次大会的2885位代表中，72%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妇女占22%。他们中间，有12人是“台湾籍同胞”。在大会开幕前的1月8日至10日间，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全会任命了一个新政府班子，至此宣告结束。外国观察家们极为重视周恩来的突出地位和邓小平的复出——他被任命为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后来甚至成了总参谋长。这些观察家肯定忽视了另一事实，即张春桥这样一位激进的“左

派”在所有这三项职位上都被任命为邓小平的副手：他成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此外，所谓上海帮的另一些成员继续在党的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王洪文是副主席，姚文元是首席意识形态权威，江青是文化改革家。因此，没有理由把对邓小平的任命视为“向右摆”。而且，新一届政府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其中有些人是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代表。

为了强调激进派的突出地位和他们对所做决策的支持，专门选择了张春桥去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从总体上看，这份文件同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在这次会上想使林彪被任命为国家主席）讨论过的文件是一致的。重大修改是：取消国家主席职务，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最后，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并讨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75年）的工作。他对政治发展情况和经济发展情况做了总结，提到了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提供了关于经济增长的资料。此外，他对1976至1980年期间的任务做了含蓄的论述，到那时，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甚至还提到了2000年的任务，到那时，“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许多国外观察家根据强调生产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再也不能指望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了。然而，代表大会的余音未绝，毛泽东和激进的“左派”就发动了一次攻势，以便从“林彪事件”中得出最终结论。如果周期性地发生偏离“正确路线”的情况是顽固的“资产阶级先验论”的结果，那么，势必要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姚文元和张

春桥的两篇文章对此做出了回答：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特别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始终存在着大量不同性质的不平等：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表现在八级工资制和不平等的商品分配上），集体之间的不平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还包括富裕的公社和贫穷的公社之间）。有些不平等逐步扩大的趋势，是城市和工业中心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形成一个新阶级"的基础。这些东西通过三种异化反过来促成"右倾（即使常常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政策"，这种政策归根结蒂导致"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因此，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毛泽东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语录，为这个最后的阶段做好了准备。开始发难是《红旗》第3期上发表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4期上，刊登了一篇也许更为重要的文章，这就是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但是，1976年伊始，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又一次打破了微妙的平衡。副总理邓小平显然要成为他的接班人。但认为邓小平"重犯老毛病"的激进派们发动了阻止他被任命的猛烈运动，这使邓小平又一次下台。但与此同时，明争暗斗并未就此罢手。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最富有戏剧性的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将在一段时间内始终影响着中国的领导层。